

學術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社會科學類國際交流刊物 JOURNAL FOR WORLD EXCHANGE

廣東懷集縣城鎮建設綜合開發公司寫字樓



總第111期 1992 · 2

廣東懷集縣

城鎮建設綜合開發公司

竭力為振興懷集作出貢獻

懷集縣位於廣東省的西北部、北江支流綏江的上游，東接陽山、廣寧；南連德慶，西界封開和廣西賀縣，北鄰連山、連南，是廣東西北隅通桂達湘孔道之一。縣內有豐富的森林、水力、礦產以及旅遊資源。改革開放以來，懷集縣的經濟建設、社會各項事業均取得新的成就。

懷集縣城鎮建設綜合開發公司願為懷集縣的經濟建設添磚加瓦，竭力為振興懷集作出貢獻。

懷城新貌





学术研究

主 编：梁 钊
副主编：张硕城
刘斯翰
范汉英

主办单位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辑者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市越秀北路222号 电话：3345916 邮政编码：510050
出版者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	广东新华印刷厂
发行者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订 阅 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	BM268 北京399信箱

代 号：46—64 国内定价：每册1.5元

国内统一刊号：CN44—1070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0—732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粤工商广字01044号

本刊每逢双月25日出版

学术研究(双月刊)1992年第二期(总第111期) 目 录

· 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 ·

-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促成中华民族新崛起雷洁琼(6)
- 论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郑 群(7)
-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研究及其方法问题张难生(10)
- 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文化精神周大鸣(12)
- 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物质基础方志钦 朱新镛(17)
- 汉唐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发展章权才(21)
-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多学科、多视角的综合开拓
——广东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概况凌 峰(27)

· 珠江三角洲研究 ·

- 试论珠江三角洲经济增长的双重特征及其转型前景
.....王光振 张炳申(31)
- 珠—港经济技术合作的回顾与前瞻路 平(39)
- 论珠江流域的分工与协作何应欢(45)

· 经济学 ·

- 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建设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理论研讨会综述文建明(51)
- 宏观经济:理论、态势分析与政策操作中的几个问题
.....朱明春(55)

· 精神文明学 ·

- 文明观若干问题初探邹永图(61)
- 把商品经济意识的精华上升为全民意识张秀玲(66)
- 智慧新说石 松(70)
- 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讨会综述(75)

责任编辑 黄荣显

· 文学 · 语言学 ·

-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选萃李顺刚 李建中 王济民(78)
再论社会心理是文艺反映现实的中介陆一帆(85)
改造国民性与鲁迅文艺观的独立特色张硕城(92)
探讨汉语的民族文化精神
——第二届全国语言与文化学术研讨会述评苏新春(100)

· 历史学 ·

- 武昌起义后犬养毅来华的活动段云章(106)
略论徐继畲与《瀛环志略》李鸿生(114)
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学研究方法姜建强(118)
中华书局本《汉书》校议曾宪礼(124)

· 企业研究 ·

雄心·才略·实干

- 记汕头经济特区物资进出口总公司陈海伦 陈波(128)
梅州汽车工业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兼析梅州汽车配件厂的经营之道曾超麟 曾小勇(131)

· 书评 ·

- 伦理思想发展史研究的新成果郑维铭(133)

· 书海酌蠡 ·

- 越为“少康庶子”试析殷伟仁(134)
句骰与乐府李文初(74)
苏轼确知“周郎赤壁”的位置吗刘家钰(38)

ACADEMIC RESEARCH

No. 2, 1992

Contents

- Increasing the Cohesion so as to Further the Resurg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Lei Jieqiong (6)
- On National Culture, National Spirit, and the Increase in the
Cohes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Zheng Qun (7)
- The Research on the Cohes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oretically
ConsideredZhang Nansheng (10)
- The Core of the Cohes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ultural
Ethos.....Zhou Daming (12)
- On the Material Basis of the Cohes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Fang Zhiqin, Zhu Xinyong (17)
- The Growth of the Cohes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during the Han
and the Tang Dynasties.....Zhang Quancai (21)
- A Summary of the Opinions Exchanged at the Second Symposium
on Increasing the Cohes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 Ling Feng (27)
- A Tentative Discussion on the Doub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conomic Increase in the Pearl River Area, and a Prospect of
Its Changing Pattern.....Wang Guangzhen and Zhang Bingshen (31)
- A Look Back upon the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Pearl River Area and Hong Kong, and a Look
Forward to Its Future..... Lu Ping (39)
- Divis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Valley Economy
..... He Yingqin (45)
- The Problems of Founding a Socialist Market Setting
—A Summary of the Viewpoints from the Symposium on the
Socialist Market SystemWen Jianming (51)
- Macro-Economy; 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Its Theory, Phases,
and Policy Execution..... Zhu Mingchun (55)
- Some Problems of the Views on Civilization; A Preliminary Approach
.....Zou Yongtu (61)

Let the Ideas of Commodity-oriented Economy Penetrate All Sections of Our People.....	Zhang Xiuling (66)
Wisdom in Its Modern Context.....	Shi Song (70)
Main Points Set Forth at the Guangdong Symposium on the Theory of the Perfection of the Socialist Ethic	(75)
Three Passages on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ry Theory	Li Shungang, Li Jianzhong and Wang Jimin (78)
A Further Consideration of the Question of the Social Mind as a Medium for Reflecting Reality in Literature and Arts	Lu Yifan (85)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Idea of Remolding Our National Character and Lu Xun's Distinctive Views on Literature and Arts	Zhang Shuocheng (92)
An Exploration of the Cultural Ethos Embodied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A Summary of the Statements from the Second 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guage and Culture	Su Xinchun (100)
Inugai's Activities in China after the Wuchang Uprising	Duan Yunzhang (106)
A Brief Discussion on Xu Jishe (1795-1873) and His <i>World Geography (Ying Huan Zhi Lue)</i>	Li Hongsheng (114)
On Spengler's Concept of Historical Morphology	Jiang Jianqiang (118)
A Critical Collation, with Comments, of <i>A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i> (by Ban Gu) Published by Zhong Hua Publishing House	Zeng Xianli (124)
Enterprise, Expertise, and Industry—A Report on the Goods Import And Export General Company of the Shantou Economic Special Area.....	Chen Hailun and Chen Bo (128)
The Practice and Rationale of the Development of Meizhou Motor Industry—Analysis of the Management of Meizhou Motor Fittings Factory.....	Zeng Chaolin and Zeng Xiaoyong (131)
Recent Findings in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Ethics	Zheng Weiming (133)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促成中华民族新崛起

雷洁琼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第二次学术讨论会暨广东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广州隆重召开。我谨表示热烈的祝贺！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一个很重要、很有意义的课题。中华民族是由汉族和数十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伟大民族。中华民族有近四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极为丰富的典籍文物。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华民族在数千年悠久历史中，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曾经对人类文明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中华民族不仅以勤劳智慧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中，饱受天灾人祸，屡经内忧外患，而中华各族人民为民族振兴、国家统一、社会进步进行了英勇顽强、前仆后继的斗争，产生过无数仁人志士、民族英雄，使得百折不挠、坚韧不衰的中华民族始终昂首屹立在东方。

在我们中华民族创业、奋斗、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以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为核心的强大民族凝聚力，世代相续，坚韧弥坚，经久弥新。即以近一百多年的近、现代中国历史而论，在每个历史转折关头的重大历史事件中，中华民族凝聚力都显示了伟大的威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以及新中国的诞生，都是因中华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奋斗、海外华人输诚响应支持而取得胜利的。传统的民族凝聚力一旦与先进思想和时代使命结合，就汇合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推动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促成民族振兴。

今天，我们面临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历史任务，传统的民族凝聚力更有了新的意义和新的内容。我们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社会体制基础上继承、宏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和优良的民族道德精神，把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和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结合起来，和把祖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强国的宏伟事业结合起来。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伸张民族大义，振奋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大团结、大统一，促成中华民族的新崛起。

论民族文化、民族精神 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郑 群

关于中华民族凝聚力，以及如何增强这种凝聚力，涉及一系列的基础理论问题、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它包罗的内容非常丰富，涵盖的范围很广。但我们既然立意要开拓这个新的学术领域，就势必要逐步明确其特定的对象和范围，明确其研究方向。这次会议，我们提出“弘扬中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主题，就试图从长远出发，从根本出发，揭示今后研讨的基本线索和主攻方向。下面，我谈一些个人看法，供大家参考。

(1) 这是一个具有内在因果联系和完整统一性的主题。“弘扬中华文化”，是这一完整主题的出发点和前提，“振奋民族精神和增强民族凝聚力”，则是基本的落脚点和归宿。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凝聚力赖以生发形成的最重要的基础。对文化范畴的界定，我以为不宜只局限于观念形态的层次。中华文化也不仅指传统文化，它包含了发源于中华大地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构建于现代、当代的民族新文化。今天我们都承认中华民族具有非常坚韧和强大的凝聚力，中华文化作为培育它成长的土壤，其肥沃深厚的程度，其可资开发的巨大潜能，是不应该低估的。什么叫民族精神？学术界对于它的界定不尽一致，我比较赞成这种看法，即认为它是民族文化的主导思想，是一个民族表现于民族文化中的卓越的伟大精神，是民族文化中较抽象、较深层的部分。可以说，它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民族赖以生息繁衍、延续发展的精神支柱和最重要的精神动力。只有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振奋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的发扬，对构建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又必然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民族精神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升华，因而它对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起着主导作用。例如我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在优秀文化基础上经过凝练、升华而造就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就培育了无数英雄儿女，形成了我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宽厚兼容的传统美德和独特性格，我中华民族才具有如此强韧的内在凝聚力。民族感情、民族认同心理等感情因素对民族凝聚力的巨大激发作用固然不容忽视，但民族精神等理智因素对民族凝聚力的主导作用更是必须充分肯定的。要使民族凝聚力不断地增强、持久地发挥作用并保持正确的方向，离不开民族精神的积极引导。这就是我们所提出的这个主题本身的内在逻辑。

(2) 这是一个具有时代紧迫性的主题。这里所讲的时代紧迫性，意思是要用积极

的民族忧患意识来考虑问题,大家都知道,过去我们对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的内在关系,讲得太少,宣传得不够,特别是对于如何振奋民族精神,以达到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振兴中华的目的,研究得更少。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又受到过错误思潮的干扰。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几乎被彻底否定了,造成了许多人在民族文化和历史知识方面的虚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真正地接触了外部世界,发现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物质文明方面的巨大差距,那些没有真正受过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熏陶,缺少民族苦难斗争史教育的青少年,就产生了似乎西方什么都好的思想。他们容易接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为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所迷惑,产生了无所谓民族精神,无所谓民族意识,无所谓民族尊严的心态。这不能不看成是我们民族意志、民族气节、民族精神在他们身上的失落。为此,我们应当有现实的紧迫感,大力宣传这一主题,并决心以更强的历史责任感去推动我们的研讨!

(3) 这是一个对于民族前途命运具有深远影响的主题。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人类从无民族差别过渡到有民族差别,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预言,人类民族差别的消失和民族融合的实现,还得经历漫长的历史时代,只有到了全世界进入文明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成为可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振兴和建设,自然是关系民族前途命运的带根本性和长期性的主题。回顾我们民族悠久的文明发展史,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不断变革演化,社会形态几经更替,历史上积淀传留下来且最具生命力的东西,莫过于民族的文明成果和文化遗产。我们今天四化建设的成就,无疑能为我们民族的进一步振兴奠定物质基础,但同样的也将作为文明成果和文化遗产留给民族后代。而我们探讨的这个主题,则是贯穿民族历史发展全过程,要到世界大同之时,民族消亡之日才能完成任务的。从现实意义来说,它与研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致的,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此外还要看到,这个主题所涵盖的时空范围和跨度又是很宽阔的。最近,薄一波同志在《资治通鉴》今译本出版的祝词中说到:“人们常说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要挺然屹立在世界上,并且为人类多做贡献。从长远看,或者说根本之点,就是要大大提高我们民族的素质”。他指出,“不能忽视祖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教育”。他认为,“一个没有教养的民族,前途不会很光明”;“民族的优秀传统,如同我们党经过多年艰苦奋斗形成的优良传统一样,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我们只有不断增强这种力量的义务,绝对没有削弱这种力量的权利。不懂得这一点,就要犯大错误,为历史所不容”。我认为,这里提到的提高民族素质的问题,与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研究是直接相关的。民族凝聚力的强弱就是民族素质好坏的重要体现。薄一波同志的精辟见解,正好深刻揭示了我们的这一研讨主题的价值和意义。

最后,我还希望,在我们的探索和研究过程中,能始终坚持科学态度,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科学研究,自然有各门学科独特的方法和手段。但一切有价值的科研成果的产生,都离不开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影响和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它从概括各门具体科学的成果

中，揭示出客观世界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为具体科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正确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问题的研究，如果今后可以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构建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素质，振奋民族精神，塑造时代品格，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中华的振兴作为基本思路的话，这里面就存在二个始终需要认真对待和处理好的问题。一是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二是如何正确对待外来文化。我们要充分地认识到其中的复杂性。首先，对精华与糟粕都需要作出历史的具体的分析，离开了特定条件下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我们就很难得出正确结论。其次，要看到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中常常存在精华与糟粕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因此，如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排污不排外”，要作出科学的鉴别。再次，任何要弘扬的优秀传统和要吸收的先进文化，都需要和当前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因而需要解决处理好继承与创新、吸收与消化的关系。以上问题的正确解决，都要求我们切实掌握和运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方法。

作者单位：广东省政协

《生产力研究》欢迎投稿、欢迎订阅(1992年)

《生产力研究》杂志是中国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会刊，也是中国学术理论界唯一的专门研究生产力（生产率）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全国性学术刊物。受总会委托，由山西省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办。

《生产力研究》热诚欢迎研究生产力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论文，以及生产力经济学专著书评、学术通讯等稿件。不发表与本刊学术特色不相符合的其它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时评、政论、漫谈、零讯一类的稿件。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惠赐文稿，推荐佳作。

《生产力研究》的主要栏目有：生产力经济基础理论、经济学“热点”、名家述评、生产力发展战略、区域生产力、企业生产力、生产力发展与体制改革、生产力理论史、生产力发展史、国内外生产力理论评介、文摘、索引等。

《生产力研究》为16开本，双月刊，每期80页码，约12万字，逢双月20日出版。国内统一刊号：CN14—1145，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2768。

《生产力研究》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人，国内读者可在全国各地邮电局（所）订阅，邮发代号：22—102，全年定价：人民币10.80元。

国外读者可向北京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订阅（北京399信箱）。

如已误邮局订阅时间，可向本刊编辑部直接订阅，订阅手续如下：

① 邮局汇款：请寄山西省太原市文源巷8号《生产力研究》编辑部 邮编：030001。

② 银行信汇：请寄山西省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帐号：08089874，开户行：

太原工商银行大营盘办事处。

《生产力研究》编辑部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研究及其方法问题

张难生

对刚刚结束的学术讨论要立即作一个小结，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里我只是受大会的委托，就会议的概况和个人的意见作一个发言。

这次研讨会以“弘扬中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为主题，它所涵盖的内容，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较前有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概括来说，会议有如下三个特点：第一，有很强的时代性。我们这次会议是在这么一个背景底下召开的，从国内来说，是进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关键十年，从国外来说，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严峻的急剧动荡的国际形势。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一堂，讨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这么一个重要命题，它就具有深刻的对内、对外的时代内容。第二，开拓了多学科研究新途径。这次研讨会反映了当代科学发展的总趋势，显示出多学科、跨专业综合研究的特征。提交大会的论文中，大体上属于哲学学科的有17篇；政治学的12篇；历史学的9篇；社会学的7篇；文化学、文化人类学包括文化史的20篇；其它还有文学、文艺学、教育学、华侨学、译文等。这些论文都是从本学科出发，运用了本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结合在、交叉在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这个课题底下，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形成了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的新格局。这种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新格局，对如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这个专题，将产生深远的理论意义。第三，具有较强的学术探索性。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这个命题，本身就为我们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学科研究领域。而在提交的论文和大会、小组的发言中，许多专业工作者都从本学科的角度，向这个命题注入了新的思维并提出了新的观点。譬如说，在首次学术讨论会上，有同志就曾经提出过，作为评价综合国力的指标之一，对民族凝聚力应该如何来测量呢？这次会议上就有年青的学者对此作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指标量化的标准。有关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内涵、表现、特征，等等，从事哲学、历史、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的理论工作者，都提出了一些他们在本学科研究上不大可能提出的新的理论观点和理论设想。应该说，这次会议不仅深化了中华民族凝聚力这一主命题的讨论，而且也为各自学科的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

以上三点，是我们这次学术讨论会同首次学术讨论会比较起来所具有的显著特点。这次讨论会涉及了许多理论问题，关于要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关于批判、继承传统文化、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问题的讨论，共识还是比较多的。但是，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什么是中华民族凝聚的核心、内涵，对此如何作科学的界定，还未取得完全的共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命题第二次讨论会仍然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除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主题以外，由于理论的深入所必然触及到的方法论问题成为讨论会的热门焦点之一，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应用科学的方法探讨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看来已经成为这一命题深化研究不可逾越的一个问题。关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是不是应该引入如下几点考虑：第一，当我们谈到民族凝聚力的时候，我们的视野应该首先看到，世界各个民族都有它客观存在的民族凝聚力，因为民族具有凝聚力是一种具有普遍真理性的普遍现象，因为形成民族凝聚力的基本要素就是民族形成的基本要素，它包括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活动、共同的文化素质，等等。承认民族都具有凝聚力这么一种普遍现象，要求我们在研究如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这个问题上，要注意横向的研究，要加强比较的研究。第二，民族存在凝聚力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是，各个民族的凝聚力的强弱又是大相径庭的，不仅如此，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民族凝聚力的表现强弱也有不同，就是说，凝聚力的强弱是起伏不定的。这说明，在形成民族凝聚力的诸要素当中，必然有主次之分，这种主次因素，地位既有相对稳定的一面，也有受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所影响而产生变化的一面。同时也说明，各个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除了具有共性之外，它应该还存在特殊性，而且这种特殊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会起决定作用。这种观点要求我们在研究如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时候，除了需要横向的比较研究之外，也需要加强纵向的比较研究。只有加强横、纵向的比较研究，加强了形成、影响民族凝聚力的诸要素的地位变化等原因的研究，才能够使我们在应用研究、可操作性研究方面，有明确的目的性，有准确的科学性。第三，不同历史时期民族凝聚力的内容与表现的形式是辩证统一的，在形式上是高度凝聚的时候，它的内容不一定是历史的进步，这种例子在世界上、包括我国历史上，都屡见不鲜。因此，当我们在探讨如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时候，应十分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注意历史与时代的统一。如果我们承认，民族凝聚力的基本要素是民族形成的基本要素，那么它是一种内在的客观存在，具有自发的倾向。现在提出要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问题，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每一个民族的个体，如何主动地自觉地表现出整体的力量。这里面就有一个提高自觉性和强化吸引力的问题。所以，如果简单地归纳所谓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内在的客观存在加主观的组织调动，这种组织调动当然就有它丰富的、深刻的内容。我认为这次大会上所提交的许多论文和同志们讨论过程中对民族凝聚力的方法论提到相当重要的地位，应该说是我们这次讨论会在理论研究方面一个长足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文化精神

周大鸣

文化精神，英文为“Ethos”，又译为“民族精神”、“国魂”、“民族魂”等。自1906年W.G.萨默提出“文化精神是使一个群体不同于其他群体的那些特质之总和”^①的观点以来，引起了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对这一概念的重视及研究。社会学家K·杨提出一种理论认为每个社会都建筑在那些使他们最不同于其他社会的文化模式上的一种文化精神、或“社会特性”。^②人类学家G·戈尔指出文化精神是“一个社会群体的各种行为观念和目的总和”。^③

1940年以后，一些学者将文化精神这一概念赋予了新的意义，把注意力从行为上转向影响规范行为的那些根本观念和概念上来。即把文化精神视为基本的整合的价值系统，一种文化的内在品质。^④著名人类学家克鲁伯曾说过：“文化精神是用客观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主观价值系统”。“文化精神弥漫于整个文化的特质紧密相连（如风格）、与组成其外部特征的诸成份的整合形式相对比，文化精神包括文化的发展取向及其所追求的、珍视的、认可的、终归有些成就的事物。”^⑤

从上述看，文化精神既反映一个群体的特征，又是一个群体内部各种行为观念的总结。我们知道，每一个社会中都有一套由群体成员接受并影响其行为举止，是非判断的价值体系。文化精神正是用来解释和描述价值体系整合性的一般模式和方向，并说明诸如经济、道德、审美价值之间的一致性。由此可见，文化精神既是社会群体中成员所接受的，并受其影响行为方式的整合性价值体系，又是一个群体不同于其他群体的根本所在。

从文化精神的内涵可见，文化精神在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是明显的。一个民族从本质上看仍然是一个群体，只不过是规模较大，结构较为复杂而已，国内学者基本上把文化精神视为与民族精神相通的概念。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从实质上看，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特定价值系统、思维方式、社会心理以及审美情趣等方面内在特质的基本风貌”。^⑥

那么，什么是中国的文化精神呢？根据前面文化精神的定义，中国的文化精神应该从如下几点来界定：（1）是根植于中国特有的物质环境和文化基础之上、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发展而成的；（2）文化精神已为中华民族广大成员所接受，构成了文化深层结构的一部分。就群体看文化精神透过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反映出来；就个人来看透过外显行为表现出来。（3）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及行为特质的集合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特有模式。

为什么说文化精神，或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呢？

一、从民族构成的特征来看

关于民族的概念，目前学术界大都赞同斯大林这个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⑦这四个特征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特别重要的，尤其是在形成的过程中更是如此。但是，在一个民族形成后，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共同心理素质这个特征却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我们审视一下历史上的或者当代的民族就可以看到，一些民族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其共同地域、语言、经济生活等三个特征或原来就不齐备、或已经部分地、全部地丧失、或在本民族生活中已无足轻重，唯有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共同心理素质依然顽强地保存下来。它一方面成为团结本民族成员的重要精神纽带、有力地维系着民族的生存；另一方面使别的民族的心理、精神影响难以渗入，有效地对本民族的生存发展起着护卫作用。

旅居海外的千百万中国人不易被同化，正是民族心理素质在起作用的一个显著事例。海外华侨没有共同的地域；不少人同时使用所在国语言和汉语；经济生活与所在国人民相同；甚至不少侨胞已经改变了国籍。但是，广大的侨胞一方面在生活习俗（饮食、礼仪、节庆）方面仍然保持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特点，另一方面仍然自视为炎黄子孙、关心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荣辱得失，支持祖国的正义斗争与建设。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侨胞就出谋献策、出钱出力热心家乡的建设和祖国的富强。这一切，只能从民族感情和共同的心理素质方面寻找到根源。

所谓共同的心理素质，斯大林解释为结合成一个民族的人们在精神形态上的特点，或说为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精神形态，或叫民族性格。共同心理素质、实质上同于民族精神，它是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它同时可以通过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爱国热情，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审美观与自豪感。这些就构成一个民族在共同心理素质上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才使一个民族有别于另一个民族。

从民族的构成特征来看，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即民族精神，是维系民族发展、民族团结、并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最重要的因素。共同心理素质，就一个民族与成员的关系来说，具有“内聚性”、“向心性”和“自识性”这三个特点。^⑧这三个特征正是民族凝聚力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说，民族精神是民族凝聚力的核心。

二、从凝聚力的定义来看

凝聚力的涵义目前尚无一致见解。该词最初是指对生物体聚合的观察，现在则是指

一种将个人吸引或联结到群体中的社会粘合剂。这种把个人吸引或联结在一起的社会力量则称之为凝聚力。W·杜尔凯姆在《论分工》和《论自杀》两书中把社会凝聚力的程度视为群体组织和社会的特征，是一种对行为产生广泛多样影响的事物。目前，一般把社会凝聚力归于社会心理学的范畴，学术界也趋向同意L·费斯廷格的定义：“凝聚力是使成员保留在群体中各种力量的合力”。社会凝聚力有这三个特征：（1）个人对共同的规范和价值准则的信奉；（2）从共同利益中产生的相互依存性；（3）个人与群体的认同感。^⑩

近几年曾发起过增强企业凝聚力的各类活动。综合有关企业凝聚力概念的讨论可概括为：（1）企业对职工的吸引力；（2）职工对本企业的向心力；（3）职工与职工之间的亲和力。企业凝聚力属于观念形态的范畴，是一定经济基础和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⑪

有的学者将企业凝聚力的定义借用到中华民族凝聚力上来，即也包括了三个层次：（1）中华民族对其成员的吸引力；（2）成员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3）成员与成员之间的亲和力。并且认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⑫这一定义的好处是：把对中华民族凝聚力漫无边际的讨论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此外也没有违背凝聚力的原意。

当然，民族（尤其是中华民族）作为一种群体类型，其规模、内涵比起企业或其他群体要大得多和复杂得多，因此民族凝聚力的内涵也丰富得多。但无论是什么定义，都必须对中华民族凝聚力作限定，使我们能够去观察、测量、比较，只有这样才有学术上和实践上的意义。

中华民族凝聚力虽然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本质上还是一种观念或精神范畴，如果从文化结构来看属于观念文化系统。国内有关文化的定义虽多，但一般都赞同文化是由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系统构成的，精神系统就是人们常称的观念系统，它包括人们的宇宙观、权威观、财产观、是非观、道德观、审美观等。正如前面所讨论的文化精神是整合的价值体系、是观念文化中的核心，文化精神在民族中表现为民族精神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所以说，无论是从民族特征，还是从中华民族凝聚力本身来看，文化精神都是其核心。无怪乎，有人把文化精神称之为“民族魂”、“国魂”等。

三、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内涵来看

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内涵看至少包括了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华民族和各地方群体在共同利益中产生的相互依存性。笔者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内容。目前，中华民族中包含了56个民族，此外，还有尚未识别确认的民族集团，在汉族中也包括许多操不同方言的地方群体，如客家人、海南人、闽南人等。中华民族之所以形成这种多元一体化的格局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疆域、共同发展了祖国的文化、共同抵御了外来侵略和压迫，才形成了同呼吸、共命运的相互依存的局面。这种相互依存性的核心就是基于共同地域、共同经济、共同文化、共同斗争基础之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文化精神。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中的包容性，促进了多元文

化、多元民族的融合，其重德性成为多民族价值体系的整合方向，促成中华民族“礼义之邦”的形成。

二是个人对中国文化中价值准则和规范的信奉程度。个人对价值准则和规范的信奉程度高、群体凝聚力就强。那些离散力较强的个人，主要是缺乏对中国文化价值和规范的认同。目前，中国文化中道德至上的价值准则受到西方文化中利益至上的价值准则的冲击。因此，我们如何在变革时期建立起一个使广大人民乐于认同的价值准则是当务之急。

三是中华民族对离散成员的感召力和辐射力，离散成员是指“三胞”，以及那些留学不愿归国的成员。对离散成员的感召力和辐射力虽与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稳定相关，但核心还是中国的文化精神。前面曾谈到“三胞”对祖国建设的贡献，主要还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认同，以及中国文化对他们的感召力。使他们感觉到祖国的命运与自己密切相关。

四是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这是一项便于操作的内容。目前，在群体凝聚力研究中，通过一些具体的指标（如个人对生存需要、相互关系需要、成就需要的满足感）来测定个人对群体的归属感，以测量群体凝聚力的强弱。在群体凝聚力中，个人的成就需要的满足是首先因素。而一个文化的价值准则就规定了个人成功和追求的目标。如果用中国的文化精神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功，那就是不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有利于人民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因此，归属感的测定仍然离不开文化精神。

五是中华民族对各民族、各地方群体的制约力和调适力。我们知道，每一民族、次级群体可能自身有较强的凝聚力。如果这种凝聚力与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同向的就有积极的作用，如果这种力是反向的，就会形成离散力。这就需要一种制约力，这包括经济、政治等手段，但文化精神是主要的制约力，通过这种制约力化离散力为凝聚力。此外，各民族集团、各地方群体会由于各自的利益发生一些矛盾和冲突，这就需要进行调适。中国的文化精神在调适中发挥重要作用，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和为贵、道德为上、利在其次的价值准则都有利于调节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

我们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内涵来看，中国的文化精神既是最基本的内容，亦是增进中华民族凝聚力最重要的因素。

三

已经论述了文化精神的概念，在文化体系内称为文化精神、在民族体系中称为民族精神、在民族特征中又称为共同心理素质。这几个词虽然外延有所不同，但其本质是一致的——是价值体系的具体表现，是维持一个群体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是群体凝聚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

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性质过去有种种偏见。有的将民族精神视为民族文化精华的表现，而用局限性或糟粕性将民族文化中的消极面排除于民族精神之外，有的则对中国文

化精神大张攻击、全盘否定，用其消极的一面等同于中国的民族精神。笔者认为文化精神与文化一样，本身并不存在什么优劣。因为文化精神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在一定的时空内它可能是进步、积极的因素，而在另一时空中则又成为落后、消极的因素。所以文化精神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问题只在于我们如何正确认识它，选择它和把握它。在我们讨论如何宏扬中国文化精神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时，尤其要注意这点。

-
- ①W. G. Summer, Folkways, Boston, 1906.
 - ②K. Young, Anu Introductory Sociology, N. Y. 1934.
 - ③G. Gorer, society as Viewed by the Anthropologist. in the Cultural Approach. of History, N. Y. 1940.
 - ④E. Sapir, Selected Writings of Edward & Sapir in Languag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Berkeley any Los Angeles, 1949.
 - ⑤A. L. Kroeber, Anthropology. and ed 1948.
 - ⑥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
 - ⑦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286页。
 - ⑧刘伯鉴《关于中国民族学科学体系的探讨》《民族研究》1981年3期。
 - ⑨“Social Cohesion”, in 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The Mac-millam company & The Free press N. Y. 1972; 《心理学》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九册，“群体凝聚力”，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新社会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 ⑩《关于企业凝聚力的探讨》《南方时报》90.12.19。
 - ⑪郑群《从华东水灾看民族凝聚力》香港《大公报》1991. 8. 6。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上接第65页）

- ⑧ 参阅《列宁全集》第17卷第497页。
- ⑨ 参阅同⑧第19卷第388—389页。
- ⑩ 参阅《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395页。
- ⑪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页。
- ⑫ 参阅《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9页。
- ⑬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6页。
- ⑭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
- ⑮ 同⑭第3卷第154页。
- ⑯ 同⑨第8卷第96页。
- ⑰ 同⑬第443页，第323页。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处

责任编辑：范英

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物质基础

方志钦 朱新镛

民族凝聚力，应分为物质凝聚力和精神凝聚力。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观，可以认为，在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民族凝聚力的物质因素是第一性的。而民族凝聚力的精神因素是第二性的，它来源于其赖以生成的物质条件，反映物质运动的趋势，服务于物质运动的过程。但当精神凝聚力一旦形成后，就有相对的独立性，有时精神凝聚力还可以超越物质条件的限制，而对民族运动起巨大的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民族的产生、形成的论述中，无不贯穿上述的观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恩格斯在这里表明了一个十分明确的观点，即人类社会由血缘群体——氏族、部落演进为民族，是受“劳动发达”的程度，即社会经济发达的程度所支配的，在论及西欧资产阶级民族形成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也清楚明白不过地指出了物质力量的决定性作用。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正是资产阶级一天天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等的分散状态，从而形成了统一的关税民族。列宁在论及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发展时，形容北美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经济为一个“大磨坊”，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把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欧洲各国各族的移民，“磨碎和混合”成为新的民族共同体——美利坚民族。在论及民族内和民族外的相互关系时，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取决于每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的整体内部结构同样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李维汉在谈到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形成发展时指出，因为消灭了剥削制度，确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才得以形成；同时，社会主义制度进而把各民族组成一个统一的经济机体，在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日益扩大中，民族的闭塞性日益消失，民族的融合因素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得到进一步发展。

诚然，我们在肯定民族凝聚力中的物质因素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并没有把其中的精神因素视为消极的、被动的。正相反，在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正确反映民族运动客观趋势的精神因素，一经产生，即会反作用于民族凝聚力的物质的因素，对民族运动

的进程起着极为重要的组织、动员、改造作用。如以“大一统”思想为主要特征的古代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无疑是巩固和发展古代中华民族的不可缺少的精神因素。又如中国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正是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运动的先导。而中国共产党的关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革命纲领，则是中华民族大团结和社会主义民族形成的精神基础。

当然，在我们谈及民族凝聚力的精神因素的反作用时，我们必须首先确认这样一个前提，即这些在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精神因素乃是民族的物质运动的客观趋势的正确反映。也就是说，只有正确地反映民族形成发展过程的物质运动的规律，并随着这种物质运动的变化而作相适应的变化的精神因素，才是真正具有凝聚力的精神因素。反之，那些与民族运动的客观进程相脱节，甚至相悖的精神因素，归根到底，有损于民族的发展，只能是一种消极的、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精神渣滓。这种精神渣滓的能量愈大，则其消极作用就愈大。总之，民族凝聚力的精神因素，必须与社会的经济形态，即物质条件相适应，因时而变，否则就是抱残守缺。

总而言之，我们在研究民族凝聚力问题时，一定要遵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对民族的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的辩证发展过程的综合考察去正确认识民族凝聚力中的物质和精神因素的辩证关系。这一辩证关系，即民族凝聚力的物质因素是“源”，而精神因素是“流”，“源”足则“流”畅，反之，则塞。因此，把民族凝聚力及其本质，只归结为一种精神的力量，并以此去考察民族凝聚力的运行机制，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是行不通的。而把民族的凝聚力看作是传统文化，那更是本末倒置了，我们知道，历来中华的志士仁人，都把国家的富强作为奋斗目标，而不是把“发扬传统文化”作为奋斗目标，“发扬传统文化”只能作为致国家于富强的手段之一。

二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当务之急，是增强其物质基础。

从当前全球民族大竞争的形势看，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以强化中华民族竞争力的物质基础，乃是关系到我们民族命运的当务之急。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民族的存在，从来就不是孤立的。某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同时又是该民族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以及斗争的过程。因此，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作用于外部关系时，即表现为一种民族的竞争力。这种民族的竞争力的大小首先取决于该民族的凝聚力的物质基础的强弱。古代中国，“入主中源”的后进民族，概无例外地被先进的汉族文明所同化融合。中世纪的西欧，征服民族日耳曼人受被征服民族比较高的经济条件所作用，实现了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的飞跃。这些史实说明了物质文明居于后进的征服者民族，最终为物质文明较高的被征服者民族“所征服”的典型的历史进程。在近代社会，由于西方资产阶级民族把“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文明中来了”，造成了西方民族一统全球，“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民族”（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

言》)的世界格局。因此,世界近现代的产业化的进程,使全球的一切民族的盛衰,聚散以及在民族竞争中的胜负,愈来愈直接地取决于各民族内的种种社会运动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和满足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时至今日,产业化进程对民族命运的影响正日益加强,而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征服全球的本性亦未有任何的改变,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产阶级民族越来越趋向于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非暴力的途径,即经济文化思想方面的途径,对发展中的国家和民族继续实行强权政治和经济剥削,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而在本世纪的最后十年中,西方资产阶级民族,正力争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中取得绝对的领先权,造成其强大的竞争力,以实现下一世纪对社会主义民族的“不战而胜”的战略目标。因此,在当今以高科技产业竞争为主要内容的全球民族竞争的新形势下,为了迎接下一世纪西方的严重的挑战,我们中华民族当务之急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最大限度地增强我们民族竞争力的物质基础,以确保中华民族在全球民族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同时,从中华民族的现状和自身发展需要来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乃是增强我们民族凝聚力的当务之急。

我们知道,正如资产阶级的产业革命最终使资本主义的社会联系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一劳永逸地扫除所有前资本主义的社会联系一样,社会主义运动将要以其更高水准的产业化,使社会主义的社会联系彻底取代一切传统的关系。所以,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使命和根本出路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民族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命运同样是取决于民族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我们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开始的,而社会主义的进程至今仍是以相对低下的生产力为基础的。因此,当前我们要使社会主义关系成为我们民族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的联系,从而造成我们民族内部强大的社会主义维系力,当务之急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产业化,以逐步改变当今仍普遍存在的中世纪式和手工工场式的生产水准,并进一步创造出比当今资本主义更为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不断强化我们民族社会主义物质基础。

其次,目前,我们民族的社会经济领域中,生产力落后的状况,更为集中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尤其是四周边缘地区。在过去四十年,我们在废除民族压迫、民族剥削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各民族平等团结、奋斗合作的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但到目前为止,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仍大大落后于汉族地区。因此,民族关系事实上的不平等仍未完全消除。只要这种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不平等继续存在,由此而造成的民族之间的差别、隔阂,以及种种矛盾,就会成为削弱民族向心力的一种潜在因素。因此,消除这种潜在因素,尤其是防止帝国主义利用这种因素去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最为根本的方法,就是要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力,使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与汉族地区并驾齐驱。为此,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就说过,“我们要诚心诚意积极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文化建设。”(《论十大关

系>)这番话,至今还是很有教益的。

再者,目前,我们仍存在着因社会制度不同而与民族的主体相分离的地区。在今后的“一国两制”实施的条件下,作为民族主体所在地的社会主义大陆,必然地会愈来愈成为非社会主义地区——港澳台地区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繁荣的后盾。因此,社会主义地区,必须不断地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成果,才能在“一国两制”的实施中,有效地发挥其凝聚主体的作用,以促进民族和国家的繁荣。

最后,我们民族曾有着几千万海外的侨胞。这些海外的成员,在近几十年中,又有许多人先后脱离了中国籍,加入了他国的国籍,并在不少国家进而重新汇集成为新的民族共同体——华族,或成为亚民族共同体——华人社会。虽然如此,但由于血缘、地缘关系和历史的、文化传统的原因,这些海外各国的华族、华人社会又与其母体民族仍保持着各方面十分密切的关系。不仅如此,这些海外华族、华人在所在国争取政治、经济的权益,争取提高社会地位的斗争中,在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表现出愈来愈强烈地要求与母体民族所在国开展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合作,亦强烈地希望母体民族所在国富强起来,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同时,在十年开放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也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海外华人的人才优势和经济实力,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作用。近十年来,中华民族的母体与其海外的支裔之间的维系力以经济关系为主要杠杆,以血缘、地缘关系和文化传统为支点,通过互助互利的经济交流合作和文化科技的广泛交流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因此,中国大陆,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体生息之地,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和繁荣科学文化,才能在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的进步事业中作出更大的贡献,不断地提高中华民族的威望,创造出一个海内外炎黄子孙万众归心的新局面。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构筑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新大厦,改善和发展中华民族的生息条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物质基础,应当成为全民族共同奋斗的目标。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上接第54页)

次并存和发展进程交错的特点相适应。

6. 广东市场体系要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广东要发展外向型经济,根本内容就是以外经外贸为桥梁,把广东的市场推向国际市场,按照国际价值规律的要求,依据国际市场参数的变化,扩大参与国际分工的范围、规模和深度,实行有效经营。因此,广东市场体系必然会长入国际市场体系。当前,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一是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在宏观上构造市场国际化的框架;二是以国内市场为依托,加深粤港澳经济合作;三是建立与国际市场相联系的信息网络。

作者单位:南方日报理论部
责任编辑:郑英隆

汉唐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发展

章权才

从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到唐哀帝天祐四年（公元907年），前后约1100年，在中国历史上称做“汉唐时期”。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确立到蓬勃发展的时期，是汉唐帝国作为当时的世界大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实力方面空前强大的时期，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缔造出现崭新局面的时期。本文旨在对汉唐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状况、发展原因和历史局限性作个剖视，这对我们认识和掌握中华民族凝聚力运动和发展规律或者有所启迪。

汉唐时期，中华民族活动在空前壮阔的历史舞台上。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中华民族共同的活动空间得到进一步维护和拓展。“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始皇击灭六国后，势力所及，东至大海，西达陇右，北抵阴山，南越五岭。汉代继承了这个一统局面而又有所扩展，开发西域在中国历史上毕竟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盛事。至唐，疆域更加辽阔，极盛之时，东至朝鲜半岛，西北至葱岭以西的中亚，北至蒙古，南至印度支那，都曾一度向大唐帝国俯首称臣。《太宗遗诏》记述当时的情况是：“前王不谄之土，悉清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州县。”这样的较为稳定的地理环境，为中国各族人民的繁衍生息和交流融合提供了理想的条件。

第二，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得到进一步加强。《史记·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汉时的长安、洛阳、宛、邯郸、临淄、成都等地，成了全国最大的商业市场。两晋南北朝时期，经济领域的一件大事，是江南的逐渐开发，这使各族人民经济活动范围更加扩大。至唐，“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见《旧唐书·崔融传》）“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见《韩昌黎集》卷二十一《送郑尚书序》）这就是说，李唐一代，不仅国内区域经济联系空前加强，而且国外贸易也得到蓬勃发展。这种经济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共同经济生活，正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得以增强的重要保证。

第三，作为中华民族进行社会联系和思想交流的汉族语言文字得到继承和弘扬。秦

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主要是指中原一带说的，是指中原一带的汉族说的，这无疑是维护统一的重要措施。汉承秦制，到了汉代，这一措施继承下来了。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汉族的语言文字，在少数民族中又得到局部推广。语言文字是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联系的纽带，是形成共同心理素质的必要前提，直接影响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

第四，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得到空前发展。中华民族既然是一个大群体，而群体成员之间就有相互学习的机制。汉代以张骞通西域开其端，加强了中原汉族跟西北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匈奴、羯、氐、羌各族先后进入中原，形成了少数民族与汉族在相互学习的基础上实现民族大融合的趋势。隋唐皇室以胡汉混杂的血统奄有天下，隋炀帝杨广、唐高祖李渊的母亲，都出自拓跋鲜卑的独孤氏，唐太宗李世民生母出自鲜卑族纥豆氏，长孙皇后父系、母系皆鲜卑人。这种情况，促使中原汉族与少数民族在社会文化领域方面的进一步融合。

第五，中华民族文化得到进一步缔造和发展。光辉灿烂的汉唐文化，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当时世界各国也是首屈一指。汉代文化领域的建树，《史记》、《汉书》、《后汉书》都有详细的记载。刘向的《七略》以六艺、诸子、诗赋、兵书、算术、方技等六个方面对图书古籍进行了系统整理，使后学得以一目了然。汉代史学、文学、哲学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科技方面，《汜胜之书》、《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九章算术》以及东汉时期张衡在天文地理方面的建树，都闪耀着中华民族智慧的光辉。唐代的文化成就，较之汉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诗文化更值一提。唐代是诗歌创作空前活跃的时代，诗人辈出，诗品极多，清代所编《全唐诗》，就载录了诗品四万八千九百馀首，诗人达二千三百余家。其中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李贺、李商隐、杜牧等一代巨匠。在内容、风格、形式、技巧等方面，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为后世叹为观止。

二

汉唐时期，经过一千一百多年的锤炼，中华民族愈显得成熟，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包括民族整体对于民族成员的吸引力和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的向心力都得到空前加强。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是，我们要进一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汉唐间的中华民族凝聚力何以能得到迅速的发展呢？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呢？

在分析这个问题时，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应该得到坚持。我们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各族人民的实践是社会的基本实践。中国各族人民是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的缔造者。阶级斗争，包括各族人民反压迫、反剥削、反掠夺的斗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基本动力。否认这些，我们就会偏离方向，就会倒向历史唯心主义。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否认，统治阶级的某些代表人物、封建地主阶级中的一些进步的思想家、以及各朝各代具有进步倾向的思想、理论、政策，在促成中华民族凝聚力

向前发展的巨大作用。否认这一点，同样会滑向历史唯心主义。

我们认为，汉唐时期，统治阶级中的某些代表人物，包括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在制定和推行某些政策中，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巩固和发展，是起了良好促进作用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大一统政策。大一统的理论，是处于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一致鼓吹的理论。荀子是主张大一统的，是主张“天下为一”的。《春秋》有三传，其中《春秋公羊传》一般认为是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的著作，这部著作也是以鼓吹大一统为其帜志的。它在为《春秋》第一句话“元年春王正月”作注时，就借题发挥，发了一大通议论，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贾谊是主张大一统的，他在《大都篇》和《治安策》中都阐述了自己的主张。最具典型意义的是董仲舒，他是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他在《天人三策》和在《春秋繁露》的许多篇章中，都鼓吹“《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他把大一统说成是“天志”，是“百王不逾之道”，从而把这一理论涂上了圣光。汉初统治者为使自己的政权长治久安，接受了大一统的理论，并将它转化为政策。汉代大一统政策具有多面的含义，既有政治的，也有文化的。从汉高祖到汉武帝，打击诸侯王势力不遗余力，这是政治的；武帝时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文化的。大一统理论不仅被汉代统治者接受，也被隋唐时期的统治者所接受，隋唐建国之初，也是致力于一统天下。大一统的理论和实践，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巩固和发展，关系很大，因为统一是民族凝聚力得以积累和发展的政治条件。

二、与民休息政策。这是一种旨在缓和阶级矛盾，鼓励生产发展的政策。西汉、东汉和唐朝初年，毫无例外地都实行过这种政策。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后，面对着社会破败、经济凋蔽的非常形势。《汉书》中的《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和《食货志》记载，汉初的情况是：“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它迫使统治者迅速寻找对策。这就是把“清静无为”作为一种国策。汉初六十余年，中经高、惠、文、景，毫无例外地都实行过这种政策。这种政策在经济上有几个要点：一是让在战争中逃往山泽的农民回乡恢复原有田宇；二是让一批壮士“解甲归田”；三是对以往因饥饿而卖身为奴的，恢复其自由身份；四是减轻田赋，实行“什伍而税一”；五是提倡俭朴清廉。这种政策使社会生机得以逐渐恢复。到武帝即位之初，则是另一番情景：“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廩庾尽满，而府库馀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实行无为而治的经济政策，着眼于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但由于实行了这个政策，使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原文化恢复了生机；使各地区、各民族间的经济联系得到加强；使广大农民不致流离失所。这些，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无疑起到了好的作用。

三、崇文重教政策。崇文重教，是先秦儒家的理论主张，也是秦汉之际新兴地主阶

级思想家的实际要求。董仲舒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说：“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是故南面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汉书·董仲舒传》）。他的建议是：“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浙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汉唐统治者接受了儒家的传统理论，把崇文重教作为国策加以贯彻。内容主要有三条：一是重视文化典籍的收集的整理。武帝下诏“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唐初对古籍的收集和整理，较之汉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见新旧《唐书》中的有关记载。二是钦定经和经学。汉初把儒家著作推上独尊的位置，置五经博士，唐代钦立《五经正义》、《九经正义》等等。经和经学是汉唐时代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同时也是学校中的主要教本。三是兴办学校。汉代的学校很具规模，有中央所属的太学，有地方所属的郡国之学，还有私人开办的学校，规模很大，人数很多，东汉后期，光是中央所属的太学，太学生就达几万人。唐代的学校规模更大，生员更多，史载，唐代的国子学和太学，所接纳的外国留学生最盛时就达二万多人，其中光是日本的学生就达一万多人。四是为前朝修史。这些政策使历代典籍得以保存下来，使传统文化得以积累和发展起来，使共同的心理素质得以培植起来，这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无疑也是起了好作用。

四、和亲政策和汉化政策。汉唐时期，统治阶级的民族政策，具有二重性。汉族统治者对待少数民族，存在大汉族主义，更多地表现为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掠夺。但有时也表现为妥协和容允。唐太宗有个说法：“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这种观点显然具有进步性。汉代和唐代，都实行过和亲政策，汉代王昭君出塞，嫁与匈奴首领呼韩邪；唐代的文成公主嫁与藏族首领松赞干布，这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是一件大事。汉唐时期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于汉族统治者，更多地表现为反对民族压迫，但也非常重视向中原汉族学习。魏晋南北朝时期，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实行汉化政策。他们向汉族学习，涉及到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既学习汉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统治方术，也学习汉族的传统文化。这就使民族之间更大规模的融合成为可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民族大融合时期。没有这个融合，隋唐时期要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文化，是万万不可能的。

五、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自主政策。在中国古代史上，中外文化交流有两个高潮，一是在隋唐，一是在明清。隋唐时期中外文化大交流，主要表现在印度佛教的传入。佛教的传入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发端于两汉之际，到魏晋南北朝开始流播，到隋唐实现了更大的发展。佛教所以能够传播开来，首要原因在于统治阶级的利用。但它一旦传入，就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儒家经典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相碰撞。在两种文化碰撞面前，不同时期的不同统治者有着不尽相同的表演。有的弃儒入佛，有的以儒反佛。更多地表现为坚持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对佛教文化采取有选择地吸收的态度。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许多统治者虽然信佛，但他们始终没有忘记崇儒。北魏孝文帝是信佛的，但《北史·儒林传》又称：“孝文稽古，笃好古籍，刘芳、李彪诸人以经术进，崔光、邢峦之徒以文史达，

于是斯文郁然，比隆周汉”。梁武帝信佛，天监三年并宣布皈依佛教。但就是这位虔诚的佛教徒，对传统经学也颇有研究，所著《孝经义》、《尚书大义》、《周易大义》、《礼记大义》、《中庸讲疏》、《毛诗答问》、《春秋答问》等等，成了该朝左右经学的最高学问。这种矛盾性也正好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博大与顽强。以经和经学为其主要内容的儒家思想。在两汉受到独尊，到了魏晋南北朝，其地位仍然是崇奉莫替。唐初急于编撰《五经正义》并颁发下去，也正好说明经和经学是唐代的指导思想，佛教在唐代的地位虽然很显赫，但是它终究无法取代儒家思想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正统地位。中国文化的内核即价值观念、伦理观念等等，并未因佛教颇受尊崇而受到改变。相反，外来的佛教却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而成了中国式的佛教。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毫无例外地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教派，不仅在佛理上是中国式的，而且在价值取向上也具中国性格。比如：印度佛教以出世和个人解脱为价值取向，而中国式的佛教则注重入世，宣传以功德度人；禅宗六祖慧能甚至提出了“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的教义。佛教音乐也受到中国的改造，变得更通俗，更中国化、更大众化。这种在外来文化面前的自主精神，受到后代的肯定、继承和弘扬。

三

事实表明，汉唐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实现了空前的发展。封建地主阶级上升发展时期的性格给该时期的凝聚力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但是，如何认识这个时代民族凝聚力的阶级和时代局限性呢？我们认为有几点是需要提出来讨论的：

首先，必须正视，汉唐时期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建筑在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这一社会基础上的。这是政治生活中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在阶级社会中，除了阶级利益外，是不是存在共同利益的东西呢？答案是肯定的，例如，在遭受外国侵略时，就存在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但是，阶级的利益是基本的，“共同利益”也是受阶级利益制约的。阶级利益的对立必然导致阶级斗争的展开。从某种意义上说，矛盾同一性是“合”，斗争性是“分”。汉唐时期地主阶级思想家是怎样认识分合问题的呢？在《春秋繁露·基义》中，董仲舒是这样阐述的：“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善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在这里，董仲舒说到“合”的客观存在，说到“合”的主导方面，说到“合”的社会本质。董仲舒表里上是说“合”，实际上是说“分”，分什么？分尊卑，分上下，分贵贱，总而言之叫分阴阳。“分”是目的，“合”是手段，没有一定的“合”，也就无法实现一定的“分”，董仲舒的凝聚观，分合观，其阶级本质是一清二楚的。种种事实表明，汉唐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在社会的不断激荡中实现的，是受到阶级斗争客观规律制约

的，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

其次，汉唐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从民族关系上说，是建筑在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的基础上的。这种情况使民族间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平等联合和和平。汉唐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曾一度采取和亲政策，但更多地采取民族战争和民族征服的政策。比如，在武帝朝，他发动的对匈奴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战争就曾出现过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在元狩四年以前，第二个高潮在元鼎五年以后，动用的兵力超过万数的竟达十一次。这种“我打你服”的政策，当然不可能实现民族间牢固的凝聚。

再次，汉唐时期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受到封建宗法制度的强烈影响。在中国封建历史上，从两汉到唐中叶以前，是世家豪族势力形成、发展到衰落的历史时期。世家豪族势力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是先秦宗法豪强势力的历史遗留。另一方面是现实政权的孵化。以“国宪”颁行的东汉《白虎通》，其实就是一部主要反映世家豪族需要的法典。这部法典用相当大的篇幅宣扬封爵、封公侯，用相当大的篇幅宣扬封建宗法制度，用相当大的篇幅宣扬三纲五常。诚然，《白虎通》是强调“同类相亲”的。但这不过是为了掩饰宗族内部分化和奴役真象，用含情脉脉的血缘关系给宗族内部的罪恶披上一层面纱罢了。如果对汉唐之际的凝聚力进行宏观分析又进行微观分析。那么，我们认为，汉唐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似乎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家庭层次；一是宗族层次；一是民族层次；一是国家层次。这四个层次是相互影响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宗族是封建统治的基础之一。宗族一定程度上能维护族内的团结，但宗族内部是由阶级构成的，宗族内部的所谓共同利益是虚幻的。宗族之间存在明争暗斗。族权有维护统治全局的一面，又有分化瓦解全局的一面。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凝聚力，当然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最后，对汉唐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起了很大作用的传统文化，是精华与糟粕共存。作为封建社会的上升发展时期，汉唐文化在许多方面表现出进步性和人民性。《史记》把陈涉列入“世家”，就是进步性和人民性的表现。反映爱国主义情怀，反映哲学中的唯物主义观点的作品也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但是，这个时候的文化遗产，也有不少是糟粕性的东西。无论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都有很多糟粕，认纬化、迷信化、颓废化、三纲五常化的作品也不在少数。文化遗产中的此类糟粕，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是有害无益的。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联
本栏责任编辑：凌 峰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多学科、 多视角的综合开拓

——广东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概况

凌 峰

广东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研究，自1990年12月召开首次学术讨论会以来，至今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其间1991年开了两次小型的专题讨论会，1992年1月又召开了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并正式成立了广东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会。上海《社会科学报》多次载文发表看法，《学术研究》开辟了专栏，《开放时代》也发表了有关文章。目前，这一研究的影响正在扩大。

这一课题的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而且涉及的面很广，包括诸多领域，诸多学科，因而研究起来也就具有多方面，多角度的特点。

本文主要从几次会议所反映的情况来谈谈研究的概况。

首次学术讨论会，问题谈得比较广泛，从这一课题研究的重大现实意义到中华民族凝聚力在各方面、各学科古今中外的诸多表现都谈到了，而重要的是在内涵、核心、特征、生成原因与形成条件等方面取得了初步的认识。

有关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内涵，多数与会者认为：从总体上把握，它应是维系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一种内在力。具体说来，则有三种见解：

(1) 它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横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层面；(2) 它虽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历史条件，但归根到底属于观念形态范畴，主要表现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3) 它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共同利益之上的，由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等多元因素所构成的。

核心问题，有这样几种看法：

(1) 爱国主义。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但不论何时，最根本的是爱国主义，不存在离开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

(2) 是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的总和。

(3) 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由此积淀而成的，为全民族所认同的价值观、道德观。

(4) 是中国共产党。每一个历史时期，能够促进社会进步，代表历史潮流与民族

最高利益的力量，就是该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作为这一核心是无庸置疑的。

中华民族凝聚力总的特征是坚韧性和连续性，它连绵数千年而无间隙。从时间上看具有继承性和变异性；从空间上看富有广阔性。

至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成原因与形成条件，可概括为几点：

(1) 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利于凝聚。(2) 血缘纽带，宗法制度与伦理中心原则。家国一体，有利于凝聚。(3) 中国古代的生产方式及由此决定的社会结构。(4) 悠久的历史传统。

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在前三次会议的基础上，论文质量有所提高，在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及民族学等方面都有一些质量好的论文。对其中一些模糊的、交叉混淆的问题的认识也日渐明晰。论者大多不泥古、不妄非今，取一种与时俱变的姿态，这有利于这一课题的展开与深入。

大家较一致地认为，这一课题的研究，既是一个历史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际问题。传统文化是一个历史问题，如何对其改造，批判地继承，使其更新则是一个现实问题。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是一个理论问题，而如何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则是一个实际问题，有一个实际操作问题。论者认为应坚持“四个有别”：

(1) 上下有别，即对领导和群众有别。首先形成领导者的凝聚力，然后才能谈得上群众的凝聚力。在中国古代的君、民关系上，君为主，民为辅。统治阶级的凝聚力是整个民族凝聚力的主要方面。而当前则应首先增强各级领导者的凝聚力，因为各单位部门的权力都集中在领导者身上，一切的运作首先有赖于领导者的决策与指挥。领导层涣散，则群龙无首。

(2) 内外有别，即对党内、党外有别。党内要大力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使之成为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党外则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为祖国富强而奋斗。

(3) 地区有别，即在大陆范围内坚定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港澳台则实行“一国两制”。对海外侨胞则采取爱国一家的态度。

(4) 古今有别，即对传统文化要历史地看待，要区分其精华与糟粕。但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牵涉到“体”和“用”的关系。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常常是共存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而有的论者认为对传统文化要做多层次的分析，不应受“二元划分”（精华与糟粕）的局限，只要有用的就应充分利用。在实际操作程序上，应明确区分优劣，以免混淆是非，产生副作用。在理论层面上，应以“传统文化的现代适应性”去取代“优秀传统文化”的提法，因为文化的优秀与否具有时代性，应根据时代要求来判断其价值。

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在首次讨论会上大家提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必须提倡弘扬传统文化；而在去年的小型专题讨论会上则有人提出，传统文化并不都是好的东西，要区分其优秀部分与落后部分，因而这次会议提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的主题。

郑群同志在开幕词中提出，这是一个具有内在因果联系和完整统一性的，具有时代紧迫性的，对于民族前途命运具有深远影响的主题。“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这一完整主题的出发点和前提，“振奋民族精神和增强民族凝聚力”则是基本的落脚点和归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凝聚力赖以生成的最重要的基础。

对这一提法，不少与会者表示赞同，但也有争论。

一部分持不同意见者认为，在讨论中华民族凝聚力时，不可忽视经济状况和物质基础，并认为这才是民族凝聚力生成与发展的根本因素。

民族凝聚力应分为物质凝聚力和精神凝聚力两部分。物质因素是源，而精神因素是流。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当务之急，是增强其物质基础。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封建文化的繁荣，凝聚力的强盛，无不是建筑在雄厚的经济实力的基础上的。今天由于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一个民族能否把经济搞上去，更加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古今的历史都证明了，由政治、精神的作用凝聚起来的民族力量，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是不能巩固和持久的。

在首次学术讨论会上，不少人提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内涵极为宽广，是多层次、多方面组成的，有家庭的凝聚力，有企业单位的凝聚力，有地区、部门的凝聚力，有单个民族的凝聚力。整体由部分组成，要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必须由增强一个家庭、一个单位的凝聚力做起，一步步地达到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的目的。但在讨论中不少同志指出，这样做必须遵守一个原则，即部分必须符合整体的需要与要求。要注意局部凝聚力的不适当的加强会削弱整体凝聚力，乃至产生分裂的倾向。

还有学者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论述这一问题。认为从大社会到个人，有许多个中间层次的群体，如朋友、家庭、社区组织等等，这些群体都各有其自身的凝聚力，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些群体的凝聚力越强，则整个民族或社会的凝聚力便越强。关键在于如何将社会系统的各个部分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就是社会整合。无论是个人、群体、社区，都同时面临两种整合：自身的整合与被整合。社会整合与社会凝聚力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但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影响，整合有利于凝聚，凝聚可促进整合。

社会整合的反义是社会解体，要使一个社会不解体，就不能不谈社会稳定问题。有的学者提出，衡量民族凝聚力的强弱不是也无法从凝聚力本身出发，必须以该民族的社会历史能否稳定发展，社会各方面能否处于有序状态，整个社会能否散发出较大值的能量为尺度。社会稳定是衡量一个民族凝聚力强弱的根本依据。社会稳定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纵向的连续性，二是横向的有序性。还有学者加以论述，从中国历史上看，文化结构繁复而精密，特别是结构本身预先准备好的调整机制与功能，不断地保证社会结构的

稳定与均衡，只要文明或文化的发展，一旦有什么超常表现，文化与社会错位之后，调整机制便会起动，以结构调整功能使二者往契合点汇拢。所以，既不会产生文化形态的存亡危机，又不会产生社会形态的存亡危机，使之凝聚为一体，相互共安，融汇并存。这种调整机制和功能，以及制度化的氛围作用和人价值的遗传方式，在民族文化、性格和民族精神中不断积淀，构成了一种深层的心态，成为共同的出发点和融汇点，时刻在产生着凝聚作用。

民族精神问题，也是这次会议的热门话题。较多的人认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培育了中华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就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升华，而民族精神本身又是一个动态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有着不同的内涵，是随着时代发展进步而不断变化的。当前尤其要重视民族精神的时代性，并注意处理好民族精神的时代性、阶级性和民族性三者之间的关系。有的同志则提出民族精神就是民族文化精神，与民族传统文化是同一的。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华民族精神是人情化的人文主义，是建立在民主、科学、法制基础上的人情观，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还有学者认为：民族精神范围广泛，用几个或几十个字不足以概括，建议组织部分学者从高层次、宏观角度去探讨。

(上接第84页)

- ⑦ <谭友夏合集>卷九 <王先生诗序>
- ⑧ <南雷文定>附<携杖集>
- ⑨⑭ <南雷文定>四集
- ⑩ <曹德培诗序>
- ⑪⑬⑮ <随园诗话>
- ⑫ <溇南诗话>
- ⑯ 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 8 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 ⑰ 见伍蠡甫<欧洲文论简史> 245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 ⑱ <剑溪说诗>
- ⑲ <昭昧詹言>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

本辑责任编辑：刘斯翰

试论珠江三角洲经济增长 的双重特征及其转型前景

王光振 张炳申

一、珠江三角洲经济高速增长的特征与主要动因

珠江三角洲^①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区域之一。1979—1989年,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广东全省年平均增长19.5%,而珠江三角洲则年平均增长22.8%。^②1990年珠江三角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893元,比全省高62.5%,比全国高出一倍以上。从区内情况看,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是深圳市(6896元),依次为珠海(5516元)、广州(5417元)、东莞(4959元)、佛山(4536元)、中山(3828元)、江门(2658元)、惠州(2180元)、肇庆(1697元)、清远(1246元)等^③地。

推动和支撑珠江三角洲高速增长的因素有多种,但最为突出的当数工业化、外向型经济和体制变革三大因素。

第一,工业化,特别是农村工业化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1978年整个珠江三角洲的工农业总产值约180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33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3.9%;1989年工农业总产值达1029亿元,工业总产值926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90%。据估算,工业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40%以上。在工业发展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乡镇企业。除广州、深圳、珠海市以外,珠江三角洲各市、县乡镇企业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都在50—70%之间,其中东莞占72.6%,肇庆占64.4%,中山占59.7%,佛山占57.9%,江门占55.7%,惠州占48.7%。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大大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有效地拉动农业劳动力的大幅度转移,促进了城镇建设和人口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目前,一个以电子、家用电器为核心,以轻纺为主体的制造业结构已经奠定,一些轻型机械制造业正在兴起。

第二,外向型经济是珠江三角洲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的牵引力。由于历史、人文和地理的原因,广东的外向型企业大部分分布在珠江三角洲。从1979—1989年,珠江三角洲实际利用外资从4650万美元增至15亿美元,年平均增长41.5%,大大超过国内固定资产年平均递增30.6%的速度。根据1989年的统计数据计算,全区外资的投入约占全社会

总投资的40%左右，大大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在对外贸易方面，1978年全区的出口额仅4.22亿美元，1989年上升到54.8亿美元，年平均增长23.2%（全国为18.4%），占全省出口增额的67%。据对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这两大因素的分析，估计它们对整个经济增长的作用占50%左右。实际上，外向型经济对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巨大牵动表现在多方面，明显的是促进了投资环境的极大改善；大量境外资金的净流入与本地的劳动力紧密结合，创造了粤港澳生产要素合作的新模式；通过“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的形式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大大地提高了区内科技和设备水平；输入了大量的经济信息，推动了国际市场开拓；输入大量的经济管理、经营经验与方法等等。

第三，经济体制变革是珠江三角洲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创造高速经济增长的综合保证因素。在中央和国务院赋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作用下，珠江三角洲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最为突出的是：（1）在公有制为主的前提下所有制结构多样性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外商投资企业和集体、乡镇企业的比重大幅度上升，有力地推动了合资、合作、股份经济的发展。在公有制中主体是乡镇企业的集体经济，它们产权比较明确，从而使企业自主权在这里体现得较为充分。（2）价格、流通、劳动、金融体制改革率先起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雏型已经形成：企业大量招用临时工、合同制工人，采取灵活的反映劳动力资源素质的分配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发育成长起着突出的作用，开创了灵活配置劳动力和城乡劳动力开放性流动的崭新局面；发行债券，开展资金拆借融通，加上近年来深圳股票市场的试点，使资金市场日益活跃；由于搞活了流通，放开了价格，商品市场更是日趋完善，市场调节的份量不断增大。（3）外贸体制实行政企分开，对外贸企业实行简政放权，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实行进出口代理制、工贸结合、技贸结合，从而初步打破了外贸与生产脱节的弊端；在外汇管理体制变革方面，建立了外汇调剂市场，适应了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需要。（4）在放开价格，搞活市场的同时，县、市一级对中观经济的计划、指挥、协调、监督的功能得到了明显的加强。这就使得珠江三角洲的地方政府对地区性的产业发展、体制改革具有很强的管理、协调能力，保证了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创造了在放开市场的条件下加强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经济运行模式。（5）新办企业一反几十年沿袭下来的企业办社会的模式，将幼儿园、商店、邮局、小学、社会保险等逐步交还社会去办。人员的变动，职、级、酬的变化都处于动态配置之中，这就使企业逐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所有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模式的形成，保证了经济的高速运转，同时还催生了主动竞争、敢于冒险、敢于创新等商品经济新观念的成长。

上述分析表明，珠江三角洲在改革开放中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充分地发挥了自身的优势，大力地利用了港澳以及海外的资金、技术与市场；通过改革来调动各个层次、各类人员的创业积极性。这是本文要论证的第一重特征。

二、珠江三角洲经济仍处于外延扩张阶段

1978年以来我国的巨大变化给珠江三角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其经济增长率不仅远远超出省内其他地区和国内一般水平，而且毫不逊色于亚洲“四小龙”在60、70年代的增长水平。但是从总体来说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则仍处于外延粗放阶段，表现在主要靠扩大生产规模，大量引进成套设备、原材料、零配件以及较高的能源、资源耗费率来求得经济的快速增长。珠江三角洲外延扩张的特点是：

1. 技术进步率和经济效益不理想。

联系投入与产出，按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计算，在珠江三角洲11年的经济增长中各生产要素的贡献如下：投资为80.7%，劳动力投入为4.7%，科学技术进步为14.6%，科技进步的贡献比广东全省同期的19.7%低，仅与全国水平相当。

从经济效益看，我们测算和分析了全区的静态经济效益和动态经济效益两组数据，发现无论是动态还是静态经济效益都低于山区市县和全省水平（见表1）。到1989年整个珠江三角洲的静态效益系数为0.44，低于山区市县（韶关、梅州、河源）的0.52，也低于全省的0.48。动态效益系数进一步说明，珠江三角洲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社会总产值的增长也慢于山区和全省，全省为0.85，山区为0.97，珠江三角洲为0.74。上述结果与人们的一般印象相反，值得深入分析。造成珠江三角洲一方面是高增长而另一方面是低效益的经济原因有哪些呢？（1）该区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这部分投资的回收率较低，时间较长。（2）外商投资企业比重较大，中方获得相对收益较低，尤其是“三来一补”企业，中方大体只获得加工费。（3）产品的附加价值不高，大多数产品为高成本比重型、装配型产品。（4）在投资和固定资产占用方面的“硬”约束的财政、信贷体制尚未最终形成。（5）重复投资、重复引进、产业内部和产品结构同构竞争带来的负效益。当然，这些原因的大部分在经济处于外延扩张阶段是不可避免的。

2. 产业结构成长过程中的二重性。

与经济增长的二重性特征相联系，珠江三角洲的产业结构成长也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相对1978年落后的结构状态来说，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成为结构成长中的主流；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性利益主体多元化，导致产业结构同时存在失调问题。

首先与经济水平相一致，珠江三角洲三大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构成比全省高一个档次。1990年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全省为26.1%：39.9%：34%，珠江三角洲则为19.6%：43.6%：36.8%。仅从第一产业比重来衡量，全省处于人均收入300美元阶段，而珠江三角洲则处于500美元阶段。^④不过，珠江三角洲第二产业的比重很高则说明这一区域的工业加工型的典型特色。其次，关于制造业，我们把40个工业行业中超过比重4%的行业抽出来比较的结果说明，珠江三角洲纺织、食品、机械、电子电器等行业的相似性较大，但这些行业集中分布在珠江三角洲主要是资源约束的结果，大体上是合理的。另一方面，从行业比重看各地的差异仍然比较大。例如江门、佛山的“纺织业”比重大大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电气机械及器材”行业中山和佛山比重最高；而“电子及通

讯设备”行业比重则是深圳、珠海、惠州较高；广州的机械、医药和交通设备制造行业比重明显高于全省；建材工业则是佛山、江门、清远最为突出（详见表2）。

结构失调同时并存的主要表现，一是制造业的层次较低，仍以加工装配为主，机械制造业薄弱，高科技行业及产品的比重不高；二是劳动关联效应大的支柱产业仍未最终形成，从而未形成扩散型的产业链系统；三是在区域生产力布局方面，仍然存在各市、县热衷发展“大而全”、“小而全”的倾向，缺少强化区域之间专业化分工和横向经济技术联系的机制。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导致经济效益不高，能耗、物耗降不下来的产业结构原因。

上述分析说明，外延扩张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另一重特征，它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扩大经济规模，加快工业发展，增加基础设施，扩大就业需求；但同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高速度、低效益的增长状态。这作为经济起步的存在形态是合理的，然而长久维持则是危险的。显然，珠江三角洲面临着提高经济增长素质，提高经济效益，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转型的重大任务。

三、前景与对策

进入90年代，珠江三角洲继续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前景十分广阔，这主要取决于三大因素：一是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仍然是保持较高增长率的地区；二是90年代末香港、澳门主权回归祖国，港澳地区与华南地区在经济、技术等方面的合作将更为紧密；三是珠江三角洲经过80年代的发展，投资环境已进入了较优的状态，并打下了与港澳经济合作的良好基础。但从国内情况看，地区倾斜的对象有所改变，特区和开放区域的竞争正在加剧，这必然会增加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难度。根据前面的“双重发展特征”分析，我们认为珠江三角洲在90年代必须实现新一轮的经济转型，即从以外延扩张为主转向外延与内涵扩大再生产并举；从低层次的加工组装向高层次的自我开发转变；从产业结构失衡向产业结构优化转变。为了有效地达到这一目标，极有必要明确下述对策思路。

1. 外延适度扩张与内涵挖潜有机结合。

据香港恒生银行发表的研究报告，港商在1989年下半年以后曾一度将投资转向泰国等其它亚太国家，但不久又大幅度回流珠江三角洲，因为港商通过实际比较认为，珠江三角洲仍是亚太地区投资环境最好的地区。^⑤但是面对国内外引进外资的剧烈竞争和珠江三角洲投资环境与国际上的差距，为保持国内最优的投资环境必须继续增加投入，这必然使珠江三角洲在90年代客观上仍将处于外延适度扩张阶段。如果外延扩张太猛会再度引起经济效益和经济环境的恶化，那么如何既能保证必需的投入，又能优化增长呢？正确的选择应是把外延适度扩张与内涵挖潜有机地结合起来。第一，必须统一建设规划，加强宏观调控，避免基础设施的重复投资和遍地开花。第二，积极争取外商成片开发，增加外商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比重，并要对这类投资给予更为优惠的政策待遇。第三，大力促进科技进步，提高经济增长素质。今后需要逐步减少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比重，提高

高科技产业的比重；要十分重视技术进步，努力开拓高技术、高档次、高质量的产品，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第四，着重解决技术引进的消化吸收问题，对那些可产生整体影响的先进技术要强化吸收、消化、创新工作，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新技术的制造、扩散基地。第五，建立和完善科技进步促进机制。例如在宏观上需要建立有效的科技进步推动机制，对各地及企业的考核，必须突出国民生产总值、净产值、科技进步率等增长指标，坚决摒弃以工农业总产值为主的衡量方法。在微观上要围绕建立企业的技术进步动力机制、利益机制，深化企业体制的改革，使企业成为技术进步的主体，充分调动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积极性。

2. 引进外资与自主开发有机结合。

从珠江三角洲的发展经验来看，大力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增加外商投资企业可以有效地补充国内资金紧缺和技术水平低的缺口；可以使我们逐步熟悉国际市场的变化和 International 生产经营运作的惯例及经验，同时又为国内增加就业机会，从而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另一方面，珠江三角洲的经验说明开拓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分工最终取决于本地企业的经济实力、产品质量和市场渠道的掌握。因此，珠江三角洲今后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方针应该把大力引进外资与自主开发有机结合起来。目前必须着重抓好：第一，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在充分兑现优惠政策的前提下，切实抓好中方合理收益的实现。第二，尽快提高国内企业自我开发、自我发展能力和产品直接出口能力，使引进外资、先进技术与自我发展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第三，主动出击，增加对海外投资的比例。对于那些已形成一定经济实力的集团企业，通过对海外的投资，掌握市场渠道，实现跨国经营是提高外向型经济档次的重要战略。

3. 促进结构升级与优化地区分布有机结合。

珠江三角洲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700美元（按现行汇率计算），少数地区达到1000美元，这是产业结构，特别是出口贸易结构发生较大转变的阶段。在80年代珠江三角洲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产业结构高度明显高于全省。以佛山市和顺德县为代表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发达地区，其结构高度已达到钱纳里等人研究的800美元的标准结构水平（但第三产业偏低，第二产业偏高）；广州、深圳、惠州等市已超过1000美元的标准结构。可见，珠江三角洲的经济结构已初步进入现代状态，与中等发达国家较为接近，这种结构特征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发展高科技产业提供了可行的条件。

从珠江三角洲的资源条件出发，90年代产业结构的合理变化趋向，除了继续发展第三产业之外，仍将以轻纺、电子电器为主体，着重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因而在具体选择上要突出以下标准：一是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处理好眼前效益和远期效益的关系；二是优先发展国际市场前景好，产品附加价值高的产业；三是优先发展节能、节料的产品和技术，并发展适应本地特点的原材料、能源等基础工业；四是优先发展某些轻型机械制造业，如小汽车、摩托车及饮料、食品、塑料机械等等。

在确定了产业结构合理变化趋向后如何实现空间的合理布局是珠江三角洲合理配置

资源的不容忽视的大问题。今后必须本着充分发挥各地优势的原则，对电子电器、纺织化纤、机械制造、化工、建材等主要工业大项目的分布作出科学、权威的规划。通过经济机制和杠杆的调节作用，促进各地区形成有相对优势，有规模，达到一定集中度的优势产业。此外，要根据分工协作的原则加强区内企业的经济技术横向联合，避免重蹈“大而全”、“小而全”的覆辙。

4. 外向发展与深化改革有机结合。

珠江三角洲的发展经验还表明：对外开放促进了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反过来促进对外开放。仅以企业体制改革为例，为了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要求，珠江三角洲的地方政府尽量减少对企业的行政干预，赋予企业真正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使企业更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结果使外商越来越喜欢到珠江三角洲投资设厂。经验证明，沿海开放地区与国外市场结合较紧，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更适应于国际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经济体制。我们认为其改革目标是确立以现代商品经济规范为基础，以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为主导的间接调控的经济体制。

首先要进一步发育开放性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除了放开价格搞活流通以外，应着重完善生产要素市场，逐步加大资金、劳动力、技术流通的自由度，使其价格反映自身的余缺程度，这就要求把金融体制、劳动工资体制、科技进步体制的改革放到突出的位置上。

其次，深化外贸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进一步解决外贸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营出口企业直接开拓国际市场和汇率制度迅速反映经济变化的问题。与此同时，在加强管理的基础上为企业多创造出入境方便灵活，有助于跨国经营的条件。

再次，加快企业体制的改革。一是在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发展的基础上着重探索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体制模式。二是要深化国营企业的改革，通过完善承包责任制，推行股份经济等办法把国营企业推向市场。三是变企业的财政“软”约束为“硬”约束，严格银行信贷约束力，逐步推行企业破产制度，完善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等等，从而在微观上消除企业短期行为。

最后，改善宏观调控手段，提高宏观调控水平。过去，珠江三角洲各级政府对本地的经济发展大多有一个战略构想，在对一些重大项目的投资作出决策之后便动员各部门共同实施，在操作上主要是使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因此各行政区域大体上是有规划，按计划行事的，但是超越了市、县一级的大区域层次却缺乏规划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同时，由于对各地实行财政承包，分灶吃饭，造成了地方政府利益主体重复投资。可见，今后要充分发挥珠江三角洲的优势，合理生产力的地区分布，建立科学的分工协作体系，尤其要把改善宏观调控状态放在重要的位置。在保留财政承包体制的情况下，当务之急，一是制定有权威性的有关珠江三角洲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地区布局的规划；二是完善间接调控体制，更多地采取信贷、利率、税收、工资等经济杠杆，即既要加强宏观调控能力，又要减少行政干预的份量。三是建立区域性的宏观宏观调控的

观协调基金制度，诸如能源开发、新技术开发、技术引进消化基金等，增强宏观调控的物质基础。

- ① 本文中“珠江三角洲”的范围包括广州、深圳、珠海在内的“大三角”。
- ② 资料来源：《广东统计年鉴1990》、《广东市情》。
- ③ 资料来源：《广东统计年鉴1991》。
- ④ 参见钱纳里等：《发展格局：1950—1970》。
- ⑤ 参见《恒生经济月报》1990年10月号。

表1 珠江三角洲动态和静态经济效益比较

	动态效益	静态效益		动态效益	静态效益
广州	1.01	0.47	江门	0.71	0.39
深圳	0.55	0.46	佛山	0.74	0.35
珠海	1.06	0.47	肇庆	0.83	0.49
惠州	0.78	0.57	清远	—	0.56
东莞	—	0.50	三角洲	0.74	0.44
中山	0.63	0.39	山区	0.97	0.52
			全省	0.85	0.48

资料来源：根据《广东统计年鉴1990年》、《广东市情》资料计算。本文计算1979—1989年数据。

注：动态效益： $\frac{\text{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text{社会总产值平均增长率}}$ 。静态效益： $\frac{\text{国内生产总值}}{\text{社会总产值}}$ 。

表2 40个工业行业中超过4%的行业情况比较（按1980年价计算）

	全省	广州	深圳	珠海	惠州	东莞	中山	江门	佛山	肇庆	清远
食品制造	6.4	5.2		9.0		6.4	8.0	8.4		10.1	9.6
纺织	8.8	6.5	5.7	9.0	6.5	8.2	7.1	17.4	15.0	10.3	6.4
缝纫	4.9		5.0			5.3	5.6	6.9		11.0	6.7
化学	5.0	6.4		9.0			7.0	4.1			
塑料制品	4.0			9.2	4.3	4.5			7.2		
金属制品	4.1	5.1					4.9		7.0		
机械	6.5	8.9	6.5			8.3		8.6	4.2	7.6	5.0

电气机械及器材	10.0	11.8	4.8		4.7		28.6	9.5	19.3	8.95	3.7
电子及通讯设备	11.5		45.4	22.2	41.0		6.9	4.0	6.4	4.6	
医药		6.4			4.0		8.9				
交通设备		5.9					8.9				
造纸及纸制品							4.0				
工艺美术							7.0				
电力、蒸气热水等							13.4				
皮革							4.8			4.8	
化纤								9.8			
建材								4.5	5.8	6.5	18.8
饮料											5.5

资料来源：据《广东统计年鉴1991年》计算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郑英隆



苏轼确知“周郎赤壁”的位置吗

刘家钰

苏轼贬谪黄州，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与前、后《赤壁赋》，遂成古典文学之瑰宝。但苏轼借以抒发怀抱的这个黄州赤壁，却不是赤壁之战的古战场。

苏轼是否误认其为“周郎赤壁”了呢？抑或如有人所说，苏轼确知其并非“周郎赤壁”，但也不妨暂时借以抒发情怀呢？笔者认为，回答应该是否定的。

北宋诗人张耒在《明道杂志》中说：“周瑜破曹公于赤壁，云阵于江北。而黄州江东西流，无江北。至汉阳，江南北流，复有赤壁山。疑汉阳是瑜战处。”张耒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他已经怀疑黄州赤壁并非赤壁之战的真正发生地了。苏轼自己在《东坡尺牋·与范子丰书》中也说：“黄州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传云曹公败处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曹公败归，由华容路，路多泥泞，使老弱先行践之而过，曰：‘刘备智过人而见事迟，华容夹道皆葭苇，若使纵火，吾无遗类矣。’今赤壁对岸即华容镇，庶几是也。然岳州复有华容县，竟不知孰是。”这是苏轼自己对黄州赤壁的疑问之辞了。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用了“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的说法，而在《前赤壁赋》中又说：“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苏轼所使用的“人道是”、“此非”等语，都带有不确定性，这是一种明显的存疑态度。因此，实际上并不如有人所说：“苏轼明知黄州赤壁并非三国赤壁的真迹”。（《苏轼新论》第110页，齐鲁书社1983年版）也不如有人所说：“苏轼知道这里不是赤壁之战的赤壁”，他只是“将错就错”而已。（《苏轼评传》第14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当然更不如有人所说：“博学如苏轼，当然不会不知道（周郎赤壁究竟在哪里）”。（《宋词赏析》第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关于这个问题，要算南宋诗人陆游看得比较真切，他在《入蜀记》中称许苏轼上述存疑态度时说：“盖一字不轻下如此！”

珠-港经济科技合作的回顾与前瞻

路 平

80年代,珠江三角洲和香港经济科技合作的高速发展,促进了两地的繁荣,已为世人所瞩目。90年代,随着亚太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显著地领先于世界,世界经济重心东移,从时间和空间的宏观角度来看,珠-港经济科技合作势必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本文为此谈一些对两地在80年代已经形成的经济、科技合作关系和90年代发展前景的看法。

一、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香港80年代经济、科技合作是保持各自特色,优势互补的合作

(一)80年代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香港面临的国际环境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香港的经济、科技关系不能拘泥于两地一隅之地,要放在国际、国内大环境、大格局中观察,才能科学地进行透切的分析。80年代的国际环境有3个值得注意的因素:(1)80年代是战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慢的10年,但东亚地区却一枝独秀。在50—60年代,世界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在5%以上,70年代降到4%左右,80年代则在3%以下。太平洋西岸各国的经济却出现了迅猛发展的势头,日本从1975年到80年代中期一直维持着中低速稳定增长的态势,1980年开始回升,1987—1989年连续三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都超过5%,1990年增长5.6%,成为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亚洲发展中国家1980—1988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7%左右;包括香港在内的亚洲“四小龙”1983—1988年连续3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在12%以上,1989年仍保持7%以上。从而加速了世界经济重心东移的步伐,太平洋西岸成为举世瞩目的地区。在北美、欧洲两个地区经济集团逐渐成形的时侯,人们议论中的西太平洋沿岸经济圈,已经有了牢固的物质基础,这也加强了香

港作为国际性城市的地位。(2)世界新的科技革命蓬勃发展引发的新一轮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 and 综合国力的变化,国际关系出现了格局性的变化。近10多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取得了非凡的成就,70年代末以来,以开发高技术和建立高技术产业为特征的新的产业革命迅速发展,世界经济、技术发展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即高科技时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和生物技术被认为主宰现在和未来的三大高技术群。其影响所及,不但导致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高级化,导致社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使一些国家(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也使各国力量对比、关系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些原来由美国“照顾”、“保护”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如日本、亚洲“四小”,以抢占高技术制高点为契机,发展自己的经济,已成为美国竞争的对手。美国在世界GNP总和中的比重,已从二次大战后初期的50%,下降到80年代后期23%;美、日GNP比例,1950年为20:1,1963年为8:1,1987年为2:1。人们认为,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世界各国已从军备竞赛和对抗为主,进入到以综合国力(主要体现在经济力和科技力)较量和对话为主的转折期。(3)在80年代,世界各国经济对出口依赖度,已从60—70年代的10%左右,提高到20%以上,国际市场变化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国际市场在80年代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贸易额增长,1980年,世界贸易额为2万亿美元,1989年增长到3.1万亿美元;商品结构变化,1987年同1979年相比,世界商品贸易中,制成品在世界出口贸易中的比重从57.9%增加到69.7%,初级产品的比重从40.5%下降为28.4%;两种产品价格,1988年同1979年相比,总的价格上涨28%,其中制成品上涨33%,初级产品仅上涨2.7%;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商品进出口中的份额,1987年同1979年相比,

西方发达国家所占比重，从63.5%和69%上升到69.9%和71.3%，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从25.3%和22%下降到19.7%和19.2%；地区之间贸易增长迅速，1988年同1987年相比，亚洲国家(地区)之间贸易量增长25%，欧共体12国之间增长10%，美加之间增长12%以上，美墨之间增长40%以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税壁垒措施，从70年代末的850种增加到80年代后半期的1000多种，其中美国设置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从1980年到1986年增加一倍半。

上述分析说明，80年代的国际环境，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香港的发展都是严峻的，同时也充满机遇。回顾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近半个世纪，由于新的世界科技革命的发展，带来的世界性的经济大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转移，不论是50、60年代，或者是70年代，都是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时代，问题是能否抓住机遇。抓住了，经济、科技就能迅速发展；抓不住，同发达国家的距离就会进一步拉大。50—60年代，日本、西德抓住机遇发展了起来；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包括香港在内的亚洲“四小”和巴西等国家和地区也抓住机遇成为新兴工业国家(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主要由于看似极“左”，实际上是闭关锁国政策，隔断了同世界发展的联系，一次又一次的发展机遇，都失之交臂。但是，进入80年代，以改革、开放为转折点，珠江三角洲地区充分利用了同香港的关系，抓住了机遇，迅速地发展起来了。

(二)80年代，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香港共同迎接了挑战，抓住了机遇，各自按照自己的特点，发挥优势，创造了繁荣

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香港唇齿相依，相辅相成，优势互补的关系从来都是存在的，并不因为两地实行的社会制度不同，就一笔勾销了这种地缘人缘关系。香港在60、70年代，充分利用了自己背靠大陆，面向东南亚的有利地理位置和作为一个自由港有利于通向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制度，发挥了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通向世界的桥梁作用。相反，珠江三角洲地区尽管地理条件优越，历史上就是中国通向世界的南大门，但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为地自我封闭起来，实际上是自己割断了同世界的联系，未能很好地利用毗邻香港的地缘人缘优势，一再失去了发展经济的机遇，同香港的经济水平也拉开了距离。这种

情况只是在改革开放后，才得到根本的改变。

香港作为一种彻底的外向型经济体制，在80年代严峻的国际挑战中，为了保持它作为国际间经济活动纵横驰骋的中心地位，除了调整经济结构，使第三产业成为香港的主导产业外；还必须按照世界新的科技革命发展趋势，优化第二产业的结构。要实现这些目的，就必须以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依托，特别要以毗邻香港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为广阔腹地，扩大香港作为国际间经济活动纵横驰骋的舞台。

对珠江三角洲地区来讲，改革、开放以后，面临着繁重的实现第一步战略目标的任务。农村工业化任务还在开始，“左”的农村经济体制和自然经济的农业经济仍在束缚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在50年代仍然同香港经济水平大体相等的中心城市广州，已同香港拉开很大距离；刚刚辟为经济特区的深圳、珠海，依然是边陲小镇和海边渔村。但是，珠江三角洲地区进入80年代的最大优势，是中央给予的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其主导思想是：在国家不可能给地方财力、物力支持的情况下，从地方体制上放宽，给地方以较大的自主权，使地方从改革经济体制入手，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自然包括毗邻港澳的优势和港澳同胞爱乡爱家的积极性)，加快经济发展。按照中央统一部署，首先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建立多层次的开放区，最先在深圳、珠海创办了经济特区(1980年)，把广州列为沿海开放城市(1984年)，接着把小三角16个市、县开辟为经济开放区(1985年)，后扩大到大三角(1987年)，在区内建立了一大批重点工业卫星镇，享受多种优惠政策。这样，在有4.74万km²面积，2088万人口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就形成了以经济特区为“窗口”，以广州为智力、信息、交通辐射的中心，以广阔的开放带为腹地的开放地区，对外商，特别是港商进来投资办厂，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一堵在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之间人为设置的无形的墙，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拆除了，为两地的相辅相成、优势互补创造了条件。

香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贸易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旅游中心和信息中心，它的最大优势是市场广阔，信息灵通，资金汇集，交通方便，有强烈的世界意识、商品意识，易于掌握国际市场动向，疏通商品流通，得世界风气之先，

获得信息快，易于筹集资金和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等；它的劣势则是弹丸之地，活动舞台狭小，地产尺土寸金，劳动力缺乏，素质不高而又昂贵，缺乏现代科学技术力量等等。而珠江三角洲地区则缺乏资金、技术、信息和通向国际市场的跳板和渠道，却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广阔的腹地，丰富而低廉的劳动力和地产，有易于引进国内科技人才的条件，相对国内其他地区来讲，商品意识较强。两地的优势劣势，有很好的互补条件。

在过去的10年中，香港作为一个国际性城市，经济向前走了一大步，人口才占世界的0.1%，贸易额占世界的1.5%，1990年排列世界第11位；198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按市价计）为545.67亿美元，人均9604美元。香港本地生产总值，1980年为1370.8亿港元（1980年不变价，下同），1985年为1799亿港元，1990年为2594亿港元；出口贸易方面，出口总值（离岸价，下同）1985年为2352亿港元，1989年为6399亿港元（港产品出口总值1985年为1299亿港元，1989年为2259亿港元，转口总值1985年为1053亿港元，1989年为4140亿港元），年增长率为22%；香港同大陆的贸易总值为1905亿港元，1990年约3800亿港元，年增长29%。香港的产业结构也有很大变化，到80年代末，三大产业的比重：在本地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不到5%，第二产业占29%左右，第三产业占65%。在就业人口中，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从70年代的6.5万人，减少到80年代末的4万人，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口从1980年113万人，减少到1990年的76万人，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从1980年的110万人增加到80年代末的150万人。第三产业的发展，使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商业、金融、贸易和信息中心，有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到1990年，香港作为一个国际贸易中心，已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关系，对外贸易总额1644亿美元，相当于本地贸易的10.5倍。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有138家外国银行在香港设立了1397家分行（居亚洲第1，世界第4）；香港银行对外资产和对外负债分别为3367亿美元和2907亿美元（居亚洲第3，世界第6）；黄金市场日交易量100万盎司（亚洲第1，世界第4）；外汇市场日交易量491亿美元（亚洲第3，世界第6）。1990年，香港集装箱装卸量510万个，次于新加坡，居世界第2；来港游客

593万人，比香港本地人还多。80年代香港经济繁荣的取得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如果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蓬勃发展，是很难有这样大的成就的。正如美国驻港领事欧威廉所说：“在过去10年中，香港经济同邻近的广东省越来越一体化。今天香港贸易增长最快的组成部分，是来自广东和华南其他地区产品的再出口”。而珠江三角洲地区由于有了香港这个通向国际市场的窗口和跳板，也就有了一个获得资金、技术、设备、信息、市场、管理方法乃至商品观念的渠道，在短短10年中，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成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1990年，包括广州、深圳、珠海在内的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工农业总产值已达1131.83亿元（1980年不变价，下同），其中工业总产值1058亿元，农业总产值82.7亿元，人均工农业产值5420元。据有关部门调查，其中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6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90年已达1138美元，提前实现了第二步战略目标。连港督卫奕信也认为，这个地区“有潜力在今后数十年内，成为亚洲经济增长最大的地区之一”。80年代的发展证明，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香港合作则俱荣，隔离则俱伤。

（三）80年代，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香港形成的经济、科技合作格局

在80年代形成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香港的经济、科技合作格局，从总体上看还是一个低层次的，两地还未形成大批能驰骋在国际市场上技术档次高、经济规模大的企业集团，小不点的工厂多，也就是人们讲的“满天星斗，不见明月”。从珠江三角洲地区讲，对香港的经济、科技合作，也缺乏一个整体的规划和宏观调控，急功近利，解决目前急需解决的短期行为多，香港方面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从我们对珠江三角洲的长期发展战略看，不是也不可能作为香港的经济附庸，我们是放在整个沿海地区和内地相互关联的发展战略中，部署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的，这肯定同一些人捞一把的打算是有矛盾的。从合作内容看，由于香港本身缺乏技术力量和科研基础，在科技合作领域，只能采取一种特殊的形式，即通过香港这个渠道，引进国外的先进适用的技术设备，这就决定引进的技术设备很难是一流的。80年代形成的两地合作格局，主要有3个特点：

第一，以“前店后厂”的形式，香港把大批劳

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珠江三角洲地区。

香港将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使用劳动力多的生产环节）向珠江三角洲地区转移，既是调整产业结构的需要，又要提高经济效益、扩大生产规模的需要。香港制造业不单把50年代已经建立起来的产业（如食品加工业、纺织成衣、小五金业等）、60年代建立的收音机、假发、塑料卷等产业和70年代发展起来的钟表、玩具、牛仔裤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珠江三角洲地区转移，连80年代的四大支柱产业（纺织成衣业、电子电器业、钟表业、塑料玩具业）中使用劳动力多的工序，也转移到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前店后厂”的格局，即：产品设计、供销渠道和资金、技术密集工序留在香港，而把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和工序，包括污染型的生产，转移到珠江三角洲地区。到1990年底统计，全省“三资”企业已登记注册的12232家（约7000多家投产），1990年出口37.39亿美元，1991年1—10月统计，出口40.22亿美元；全省从事“三来一补”业务的企业22000多家，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香港贸发局估计，香港在广东的“三来一补”企业的年产值约125亿美元，而工缴费仅6—7亿美元。广东省内有多达300万名工人受雇于港商开设的工厂，相等于香港本身制造业劳动人口的4倍^①。约5万家香港制造业工厂绝大部分都采用这种“前店后厂”方式发展业务。1989年至少有19000家的工厂以香港为根据地在珠江三角洲设厂，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期工作的香港技术熟练的人员有5万多人，占香港制造业工人的7%。约占80—90%的香港电子工业是以同中国内地企业合营形式或以同乡镇集体企业签订协议形式在中国经营。这些企业总部仍设在香港，聘用10来个业务人员来料理财会、销售、包装、设计等事宜，估计约有5万名港人每天越过边境来料理在华南的工厂。而每天通过边境的集装箱车辆在万辆以上。^②

这种“前店后厂”的经济·科技合作形式，对香港近期经济繁荣无疑是非常有利的；但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则有利有弊，从长远来看，可能是利弊参半。根据我们1990—1991年对“三来一补”企业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的东莞市调查，从调查的4421个“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中，剔除1990年6月以后开办的企业，共2931个企业（其中“三来一补”企业2715家，“三资”企

业216家）统计，这些企业共购买设备近40万台（套），其中进口设备总值37.74亿港元，国内配套设备4800万元；2715家“三来一补”企业固定资产46.9亿港元，企业人数28.58万人，平均每家公司固定资产为25.475万港元，企业人数105人；216家“三资”企业固定资产原值7.68亿元，职工3.2万人，平均每厂为355.48万元，职工147人。从产业结构看，纺织缝纫业占39%，其他劳动密集型企业占48.3%，而资金、技术密集型的电器、机械制造业和电子、仪器、通讯设备业仅占10.6%。从引进的技术设备分类，在全部引进设备38.28万台（套）中，电子及通讯和电器、机械设备制造的设备27561台（套），仅占全部引进设备的7.2%。这些企业每年消耗的原材料折合美元25.98亿元，其中在国内购买的仅1.21亿美元。这些比较精确的统计说明，以“前店后厂”形式移植到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技术档次是不高的，企业是小型的，而不少是污染型企业，已经给东莞环境保护带来严重危害；从企业大进大出的经营方式来看，珠江三角洲地区除了为几百万人提供劳动就业岗位外，得不到多少经济效益，形成不了自己的骨干产业，更不必讲建立技术档次高的企业集团了。

第二，珠江三角洲地区以香港为跳板，“借船出海”，利用香港的对外网络、渠道，主要是采用转口贸易形式发展对外贸易。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贸易中心，转口贸易一直占据重要比重。1989年，香港出口总值6399亿港元，转口总值达4140亿港元，占出口总值的64.7%，远远超过港产品的出口总值。在转口总值中，内地转口货占很大比重，1979年—1989年，香港同大陆的贸易额从170.5亿港元增加到3434.4亿港元（其中香港从大陆进口1964亿港元），1990年为3800亿港元。广东从1986年开始，一直居全国各省、市（区）出口首位，1990年达105.6亿美元。出口香港占全省出口总值中的比重，1985年为70%，1990年上升到81%。1991年1—10月再上升到84%，总值达89.14亿美元，这些出口产品相当大部分来自珠江三角洲地区。

珠江三角洲地区借助香港的信息网络和市场渠道，“借船出海”，发展对外贸易，有它的必然性，以1991年1月—10月的广东出口贸易为例，在106亿美元的出口总值中，一般贸易出口59亿

美元，“三资”企业出口40亿美元，而后者主要是由港商控制出口的。更不必说产值更大的“三来一补”企业了。珠江三角洲地区这样的发展对外贸易方式，必然是有利有弊。最大的弊端有二：一是市场过于集中，很容易受制于人。据港报分析，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中，有64%自香港转口。如果美国撤消对华最惠国的待遇，香港每年的经济损失约100亿美元，这必将对珠江三角洲地区造成巨大影响；二是借助香港的出口网络发展对外贸易，也会影响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企业直接进入国际市场，从长远来看，“借船出海”的出口做法，对涉外经济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第三，珠江三角洲地区利用香港的渠道，引进国外资金、技术、设备和先进的管理方法，建立起了自己的骨干产业，并形成了一条“中——中——外”的科技进步路子。

利用香港的资金、渠道引进技术设备，建立自己的骨干产业，开发新产品，这是珠江三角洲地区走的一条特殊的科技进步道路。据有关部门统计，1979—1990年，广东实际利用外资120多亿美元，港督卫奕信认为：“在广东省的外来投资有80%以上的来自香港”。广东在80年代引进的超过100万台(套)设备，3000多条生产线，也主要通过香港的渠道。中山、佛山、东莞三市在80年代，引进的技术设备分别为10万多台(套)、19万多台(套)和38万多台(套)。这就从整体上提高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技术水平。这种以引进国外先进、适用技术设备为主，结合自我消化、吸收、创新的适合珠江三角洲地区特点的科技进步道路，逐步发展成一条“中(利用国内大院大所、三线国防科研单位的技术成果、科技人才)——中(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改革、开放条件、商品经济发达的环境)——外(从国外，主要是利用香港的资金、技术设备、管理方法、信息、市场渠道)”的科技进步路线，并将内地的科技力量同香港直接联系、衔接起来。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做法。佛山市通过引进设备和消化、吸收、创新，使1800多个工业企业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企业改造面达80%以上，其中500多个企业得到全面系统的改造；形成了纺织服装、塑料皮革、电子、家电、食品饮料五大支柱产业；能生产34类、4310多种工业产品；10年开发新产品4658项。现在，佛山市风扇产量占全国40%，出口占全国50%，墙地装饰砖占全国35%，拉杆天线占全国60%，燃气

热水器和落地式组合音响都占全国1/3，等等。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香港经济、科技合作优势互补，相辅相成的成就。

二、90年代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香港经济、科技合作的展望

(一)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香港90年代经济、科技合作的取向

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日期的临近，珠江三角洲地区——香港一体化的趋势，两地唇齿相依的关系正在日益加强。在80年代形成的世界格局和发展趋势，两地已经形成的经济、科技特色和优势，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在进一步深化。这一形势决定了90年代两地的经济、科技合作，必须从两地的发展目标出发，继续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色，确定两地的合作取向和重点合作领域。

1989年9月发表的美商SRI国际公司的研究报告《共建繁荣：香港迈向未来的五个经济策略》提出：“香港可建立本身在90年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独特的地位，成为居于中国与世界各国间的一个国际商业、金融及贸易中心”。我认为，这是一个有见地的建议，但是，还不够完善，这个研究报告最大的缺陷是忽略了世界新的科技革命对香港、对中国、对珠江三角洲地区未来发展的影响。香港作为“居于中国与世界各国(讲明白一点，资本主义世界)间”的联系桥梁，除了继续发挥“一个国际商业、金融及贸易中心”的作用外，还应该成为一个吸收、扩散国际高技术成果，推动中国，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高技术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纽带。

在90年代，中央已经给广东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广东要继续在改革、开放中起到牵头的的作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目标是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一、二十年内赶上“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水平。具体任务是：加强这一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广东的10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广东计划在“八五”时期兴建的3大乙烯工程、1380万度的发电机组、两个深水港口、14条高速公路、两条铁路、3个钢铁厂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项目，相当大的一部分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有些项目已经上马开工；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现在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优化、升级，发展规模经济，建立一大批骨干产业和企业集团，目前，各市、县(区)都在集中财力、物力建立自己的骨干产业、骨干企

业；建设珠江三角洲地区包括8市6县的高技术带和深圳科技工业园、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广州天河高新技术开发区，使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并将高新技术渗进到传统产业中去；按照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决定的要求，推进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建设；进一步发展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外向型经济，更大程度参加国际市场的交换和竞争，等等。90年代，两地的经济、科技合作，只能以两地的发展目标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确定合作取向，选择两地合作的最优衔接点。

（二）预测90年代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香港经济、科技合作的重点领域

按照《广东省10年规划和“八五”规划纲要（草案）》规定的发展目标，到2000年，广东省的工农业总产值将达4240亿元（1980年不变价），包括广州、深圳、珠海和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内，全区的工农业总产值以占全省70%计算，到2000年，将达到2800亿元—3000亿元。这必将成为香港更加强盛的繁荣的腹地，势必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一个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之一的地位。根据两地90年代各自发展的目标，两地经济、科技合作的重点领域，在保持各自特色和优势的前提下，应该同8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

——继续发挥香港作为国际贸易、金融、信息中心的作用，珠江三角洲地区在90年代仍然需要香港的资金、技术、设备、市场网络的支持，但必须给以导向，按照珠江三角洲地区90年代的发展重点，引导香港的资金、技术、设备投向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80年代已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遍地开花的“三来一补”业务一类的小打小闹的加工工业，应逐步转向广东的沿海两翼和山区，这些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广东腹地完全有能力吸收，地产、劳动力也更为低廉，这是符合产业转移的规律的。

——90年代，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香港都面临繁重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任务。香港的产业结构调整虽然在80年代先走一步，但比之南朝鲜、台湾、新加坡，不可谓不是落后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更是刚刚开始。应当看到，两地的产业结构，经过80年代的发展，大体已在一个水平线上。香港在90年代不是把更多

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珠江三角洲地区转移，也不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扩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规模，而是两地合作，加快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香港在这一点上，可以凭借自己资金雄厚、信息灵敏的优势，同珠江三角洲地区一起建立和发展技术附加值高的产业。

——共同发展高技术和高技术产业。香港本身缺乏技术力量，有利用国内科技力量的积极性，已先后同上海、福建、广东建立了科技合作的关系，并开始吸收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人员。但，最好的合作伙伴是近在咫尺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现在，在这个地区内已建立了近300个生产高技术产品的企业，有3个高技术开发区和包括8市6县的珠江三角洲高技术产业带，国家也制定了优惠政策。国家科委和广东省人民政府、深圳人民政府又决定在深圳建立中国技术开发院，服务对象主要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香港。

——共同建立面向国际市场的技术档次高的产品为龙头的外向型企业集团。这些集团应当具备一定的经济规模，有自己的名牌产品，有力量进行产品的研究、开发，有自己在国际市场的销售网络和销售策略，可以在国际市场纵横驰骋。

——珠江三角洲地区应当有自己的面向国际市场、面向发达国家的多元化的对外销售网络和渠道。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市场容量最大，1987年，仅美、日、加三国的进口总额即达6612亿美元，占世界进口总额的25.67%。一些外国国际贸易专家建议我们，在1997年以前，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把香港作为我们的企业国际化的实验基地，并通过香港把触角伸向东南亚和世界各地。这也是两地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当然，在我国目前的外贸体制下，产销脱节，生产企业实现国际化有很多政策限制，但是这一步不迈开，能适应国际市场变化的外向型经济体制是无法真正建立的。

① 见港督卫奕信《1991—1992年度施政报告》。

② 引自《远东经济评论》刊载的《香港与珠江三角洲》一文。

作者单位：广东省科委
责任编辑：谭湛明

论珠江流域的分工与协作

何应欢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将视野投到珠江流域的整体发展问题上，这预示着珠江流域的研究将走上一个新的阶段。研究珠江流域经济社会的发展，首先要从理论上弄清楚流域的分工协作问题，为此，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一尝试。

一

社会与劳动的地域分工是受多种因素决定和影响的。其中包括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的差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论述过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对地域分工的影响，认为“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劳动的不同的自然条件使同一劳动量在不同的国家可以满足不同的需要量，因而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使得必要劳动时间各不相同。”^①马克思在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将它与商品生产联系在一起的，指出“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和，即表现了社会分工，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②这实质上是阐述了这样一个原理：各地区自然与社会条件的差异是引起社会劳动地域分工和形成地区经济联系的重要原因，商品经济正是伴随着这种分工与协作的发展而发展的。

从珠江流域来说，流域内部分工的存在，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流域内的不同区域存在着如下的差异：

1. 自然条件的差异。珠江流域是一个复合型的流域，由西江、北江、东江及珠江三角洲四部分组成。流域地跨滇、黔、桂、粤、湘、赣六省（区）227个县市，流域面积442100平方公里。其中西江流域面积最大，有353120平方公里，占全流域面积77.83%。^③从自然条件来看，大致有如下的区分：（1）中、上游河段水落差较大，适宜发展水电；下游及三角洲地型较为平坦，且濒临大海，适宜发展大型港口（目前，珠江三角洲年吞吐量1万吨以上的港口就有45个以上），建立与海外的联系。（2）中、上游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储量1亿吨以上的矿产，大部分集中于中上游，如流域内煤炭总储量为292.6亿吨，贵州占71%，居全国第3位；广西右江平果、田东一带铝矿，储量达1.07亿吨，居全国首位；广西来宾等地的锰矿，储量达1.5亿吨；南盘江、北盘江、江水河、柳江、

郁江等上游山区，森林资源十分丰富，占全流域的66.26%，^④且有宝贵的原始森林；下游及珠江三角洲地区，自然资源则相对贫乏，大部分原料及燃料，要从外地调入。（3）上游属西部地区或内陆省份，尤其是云贵高原，地势高，山区多，气候较为寒冷，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而下游及三角洲，地势较为平坦，江湖河叉交错，气候适宜，十分有利于农业尤其是渔业的发展，此外，交通比较方便，易与外界沟通。

2. 人文条件的差异。比较而言，云南、贵州、江西境内的地方，由于历史上与地理上的一些原因，文化相对落后，人们的科技素养和科技意识较缺乏，商品经济的观念比较淡薄，不太熟悉国际经营的惯例。而广西、广东一些地方尤其是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人们的文化素养、科技素养比较高，特别是商品经济的观念与科技意识比较浓厚，比较了解现代经营管理的方法和手段，比较熟悉国际惯例，有一定的竞争意识。特别是广西的某些地区与广东珠江三角洲等地，属全国著名侨乡。据统计，珠江下游各地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华裔有1,400万，占全国华侨总数66.5%^⑤，这些地方与海外的华侨、华人有广泛和密切的联系；珠江三角洲还有毗邻港澳的优势，较易吸收与引进海外及港澳的资金、技术、信息、管理经验，发展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3. 经济社会条件的差异。由于发展条件的不同，珠江流域内的不同区段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也是互存差异的。这种差异，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较发达地区。主要指珠江三角洲地区。这一区段具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全国的最前列。其二，经济效益较好，发展后劲强。其三，交通比较发达，水路、铁路、航空运输都极为方便。其四，通讯设施比较先进和完备，人均拥有电话部数量较高，许多部门与个人都拥有国际程控电话，国际与国内通话相当方便。其五，已形成了较好的外向型经济的基础，50%以上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其六，人们的生活质量比较高。其七，社会福利保障搞得较好，不少地方农村居民退休之后，可以象城市职工那样领取退休金。其八，人们的心理比较稳定，情绪饱满，对未来充满信心，对党和政府与现行制度有较强的认同感。第二类，经济比较落后的区段，主要有云南、贵州、赣南、桂西北、粤北等地。这些地区一般具有如下共同特点：基础设施比较薄弱，尤其是交通与通讯条件较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低，财政比较困难；资源比较富足，但发展资金短缺；人们的生活相对还比较贫困；人们要求迅速改变现状的要求比较迫切。第三类，是处于前两类之间的中等发达的地区，主要有西江走廊一带的肇庆、梧州、玉林以及南宁、桂林、柳州等地。这一类的地区有一定的发展基础，后劲比较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如何进一步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发挥自己的产业优势。

这种种差异决定了珠江流域内的社会与地域分工。既然流域内的不同区段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优势是并存而各不相同的。那么，不同的区段，也只有从自身的实际出发，按照自己的潜在产业优势来合理地布局生产力，才有可能使地区的经济走向专业化的大道。

二

分工要求合作。就合作来说，任何一地区所寻找的经济合作伙伴，必须置于全国甚

至是全球的范围，才可能是正确的做法。然而，由于同依珠江的地缘条件，客观上要求着珠江流域内各个不同的地区，必须互为经济伙伴，并无可选择地加入到流域的利益共同体之中，共同协调关系着自身发展的一系列问题。

回顾珠江水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历史，就可以看到，它所取得的成就，无不是全流域实行统一规划，通力合作的结果；而它所存在的问题，也同样可以在合作方面找到其不足的原因。

众所周知，珠江是我国南方第一条大河，由西江、北江及东江组成。它南临南海，以云雾、云开、十万大山与沿海诸河为界；北以南岭山脉与长江流域分界；西以横断山脉、乌蒙山脉与红河流域的元江和长江流域的牛栏江分界；东以莲花山脉、武夷山脉与韩江分界，跨越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江西六省（区）。珠江以西江为主干流，发源于云南省沾益县乌蒙山脉的马雄山。自发源至磨刀门企人石入海全长2214公里。北江发源于江西省信丰县的石碣大茅山，至广东三水县思贤滘北滘口，长468公里。东江发源于江西省寻邬县髻髻山，至广东东莞石龙镇，全长520公里。

珠江水量丰富，年迳流量有3458立方米，相当于长江的1/8，黄河的3倍；淮河的10倍；多年迳流模数为24.8秒立方米，为全国各大河之冠。珠江还是我国各大河流中，含沙量最小的河流，多年平均含沙量仅为0.25公斤/立方米。

珠江是我国水力资源富矿之一，流域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国内部分为3348千瓦，理论年发电量为2933亿度。单机500千瓦以上可开发的水力资源装机容量为2512万千瓦。年发电量1168亿度。平均每平方公里的理论蕴藏量75.73千瓦，可开发装机容量为56.82千瓦。

珠江流域还是我国主要水产区之一，全流域水产养殖面积达312万亩，年产量21万吨，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年产达14.42万吨（1985年统计），占全流域的68.46%。

珠江流域航运发达，仅次于长江，通航河流有1088条，通航里程14156公里，占全国通航里程107801公里的13.13%。^⑥主流西江水量充沛，客运量大；珠江三角洲河道纵横交错，大部客货运由水路运输，且有8个口门与海相通，出海十分方便。

由此可见，珠江水资源的综合开发与治理，是涉及防洪、灌溉、水电、航运、城镇供水，水土保持、渔业、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的，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全局性大事。

一般而言，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与下述的几个问题相联系：（1）水电站、灌溉等水利工程的修筑是影响整条河流甚至是整个流域的问题，它势必要考虑到流域的整体利益，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2）航运的规划与航道的整治有着它的统一性、系统性和长远性，同样需要遵循全流域的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相统一的方针。（3）水域生态的状况，是关系到全流域利益的事情，提高水域生态环境的质量，必须协调全流域的活动，采取一致性的方针。（4）对资源的综合开发与利用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它除了依靠国家的投资之外，还依靠全流域群策群力。这样，就构成了流域内各地区相互间的唇亡齿寒关系，这种关系是一般区域合作所不曾存在的。

三

社会劳动地域分工和同依珠江的唇亡齿寒的共同利益关系相结合，并与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联系在一起，其结果必然是珠江流域经济关系走向一体化。

首先，就劳动地域分工的一般性来说，只要流域内存在着自然、社会以及经济等条件的差异，就必然会在流域内存在着分工，并在生产专业化基础上实现地区经济的比较利益。从理论上讲，这种分工所要求的合作，并不一定局限于流域之内，它可能是在全国以至全球的范围内来寻求，这种经济合作的相依性，不是由地缘上是否相邻来决定，而是由地域的差异所产生的绝对或比较的优势来决定的。但在客观的经济运动过程中，珠江流域内则形成了经济一体化意义上的分工与协作。它可以说是一般区域分工与协作的特殊表现形式。就共性来说，它遵循劳动地域分工的一般规律；就特性而言，它又有着与一般地域分工相区别的一些特点，这就是：1. 地缘上的相邻性。珠江流域内的各省区在地缘上是彼此相邻的，都不同程度的借助与依赖着广州这个华南最大城市的影响，并藉此而加强着相互间的经济相依性。这是非相邻地区的经济合作不曾具备的。2. 共同利益的自然性。这种特性与一般经济协作所形成的共同利益表现为诸如共同开发航道、公路和铁路交通，建筑水电站、治理水质等种种休戚与共的相互关系，为孕育流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必要条件。3. 资源配置互补中的优先性。由于各地区拥有的资源不同，由于地区的不同产业在投入产出效益上存在着差别；由于地缘相邻以及一些共同的利益等关系，流域内的各地区首先在相互之间来寻求优势的互补。这种状况也对珠江流域的经济一体化起到了催促作用。4. 历史上政治、文化的相融性。无论哪个地区，其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必须借助于政治上的共识和文化上的相融。就珠江流域来说，政治方面，历史上官吏的交流在几个相邻的省份比较频繁，有的在第二故乡居住的时间比第一故乡更长。因此，他们不仅对流域内的各省区的状况比较了解，而且对各省区彼此间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依性与互补性也深有体会，有的人甚至早就对流域内生产力布局的整体规划提出过许多设想，或是参与了一些具体的实践，这就为达成珠江流域经济合作的政治共识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文化方面，历史上的交流一直比较频繁，有的甚至到了水乳交融的状态。如赣南与粤东北一带，是客家文化的发源地和客家人的大本营，而客家人几乎散居于流域各地；西江沿江一带，包括三角洲、佛山、中山、广州、肇庆、梧州、南宁等大中城市，无不群居着讲粤系语族的众多百姓；柳州、桂林等地，其语言可以与云贵相通；流域内各省区居民的相互移居的历史也很长，特别是近几年来，广西、湖南、江西、云贵等地数百万劳动大军进入珠江三角洲，对流域内的文化交流，亦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这些同上述的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珠江流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基础。

其次，就发展商品经济来说，商品经济要求开放——国际与国内的开放。商品经济愈是走向成熟，其对开放程度的要求也就愈高。我们发展商品经济既要遵循着国际商品

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要体现出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即具有中国特色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来，珠江流域在实践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积累了重要的经验。但也暴露出诸如地区封锁，地区产业同构化等不协调问题，这些问题中许多要在流域经济一体化基础上才能得以解决。这是因为：

第一，产业同构化的背景是地区的经济利益，当某种非地区优势产业仍能比地区优势产业还要获得更多的利益时，产业同构化的现象就难以避免。解决这样的问题。除了需要调整产业政策之外，还特别需要协调好地区之间的经济利益。而经济的一体化，则意味着整个流域协调机构的组成，意味着从整个流域全局来考虑和安排生产力布局的可能成为现实。从而使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得到有机的统一。因此，可以说，珠江流域的一体化，是解决区内产业趋同所带来的重复建设等问题的有效途径。

第二，产业同构化还与“诸侯经济”相联系。正是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筑起了一道道堤防，一些效益低劣的企业才能免于竞争浪潮的冲击而得以生存下来。只有当彼此都相互开放，全国统一市场形成之后，优胜汰劣机制才能够建立起来，商品价格才会在市场的作用下逐渐趋于合理化。而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有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连结一个个以经济区域为基础的“市场板块”而形成的。珠江流域的一体化，实质上是构建了这样的一块“板块”，为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有机的组成部分。

第三，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前者要走的是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共同富裕的道路在当前的具体体现就是“避免地区之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正确处理和协调资源地区和加工地区的关系”，“把各自的优势结合起来，共同发展”。以经济发展程度和资源富有程度来划分，我国大体可分为三大地带——东部、中部与西部。这三大地带恰恰以三条大江为分野，形成“三三”结构的经济地带。假若各自有着自然的共同利益的珠江流域，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都走上一体化的道路。那末通过一体化的形式，一个“东部带动西部，西部支持东部”全国协调发展，共同富裕的新局面必然很快出现。从这一点上看，珠江流域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在经济发展国际化的趋势中，地区的发展与发展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目前的情况是，沿海开放地区面临着一个如何依靠内地及资源地区的支持来增加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的问题；内地及资源地区也存在一个借助开放地区的带动而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的分工与合作，并籍此而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的问题。因此，开放地区离不开内地，内地也离不开开放地区；对于开放要求以国内开放为条件，对内开放又需借助于对外开放的推动，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这就需要通过进一步加强地区之间的合作，尤其是要发展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以大型企业集团为组织形式的经济协作。这个过程，也就是珠江流域、长江流域乃至黄河流域走向一体化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珠江流域经济一体化，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内在要求，是发展商品经济，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内在要求。

由此可见，珠江流域的分工与协作，有着它客观的基础。资源配置的互补与优化，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世界经济国际化的国际化以及发展商品经济的现实任务，都要求珠江流域的分工与协作走向更高的阶段——经济一体化。我们只有加强这方面的共识，顺应客观形势的需要，认真地研究珠江流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容、特点以及内在要求，积极主动地推动其向前发展，才有可能使整个流域的经济社会获得快速的、协调的、稳步的、全面的发展。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60—562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3页。

③④⑥见《珠江志通讯》1985年第8期，第29—31页。

⑤见广东省人民政府研究中心资料室编《广东经济概况》第4页。

作者单位：广东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黄振荣

（上接第77页）

是以人类社会中的社会主义社会为起点，以揭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规律为主题，以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为根本，体现社会主义的共性，而不是人类一般的共性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个性。

关于第三层次，也有不同的表述。一种观点认为，它包括两层内容：一是精神文明学，一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另一种观点认为，一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是中国特色。第三种观点认为，它是人类一般精神文明学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的共性、普遍性，同有中国特色的个性、特殊性的有机结合与统一。与会者认为，随着国际共运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曲折与艰难，在今天，怎样进一步搞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的研究，是当务之急，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也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

与会同志还就学科各层次的特征作了探讨。有的认为，第一层次的特征，一是以揭示人类社会精神文明一般为其主要任务，二是对各具体形态的精神文明赋有一般的指导作用。第二层次的主要特征，一是以社会主义为其本质属性；二是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群的共性。第三层次则是以突出的中国特色的个性和在精神文明学的全局上看它具有双重的个别地位，因而具有更具体、更生动、更丰富的特点。

（大会秘书组）

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建设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理论研讨会综述

文建明

由广东省社科联、广东省社科院、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理论研讨会，于最近在中山市结束。研讨会收到论文60余篇。近百名与会专家、学者、企业家，就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建设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一、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建设的理论依据

与会者一致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基本理论依据，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对此，与会者主要讨论如下几个问题：

1. 商品经济同公有制的关系。与会者认为，商品性是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内在属性和要求，两者是内在的统一。因为由现阶段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公有制经济，还很不成熟，企业之间还存在着利益差别和矛盾，只有通过以商品为媒介的等价交换，才能正确处理这类矛盾；而现阶段的劳动仍仅是谋生的手段。各劳动者联合体的劳动，还不是直接的社会劳动，而是个别劳动，只有通过市场交换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从实践上看，广东10多年市场取向改革的成功，说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那种认为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不相容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当然，商品经济与传统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只要按商品经济的要求，对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进行改革，矛盾是可以解决的。

2. 商品经济同市场经济的关系。与会者一致认为，商品与市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商品运动以市场为依托，没有市场就没有商品。商品经济相对自然经济而言，市场经济相对计划经济而言，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当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市场成为资源的主要配置者时，商品经济就具有了市场经济的性质。因此，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较高形态或发达形式。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导致市场经济。因此，不能把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

3. 市场体系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有人认为，市场体系与市场经济等值，它们从不同角度反映发达商品经济的形态特征。市场体系是市场经济的载体形式，它将各类市场联成一个市场系统并产生新的特征与功能，形成社会化大流通网络；市场经济是市场体

系的运动形式，它通过市场体系把社会经济生活组织为一个以计划为指导，以市场为轴心的有秩序的经济活动。市场体系与市场经济都是发达商品经济的标志。

4.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与会者认为，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要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与理解。计划与市场，是社会化大生产所必需的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它们互相补充，共同调节社会生产。计划与市场的作用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既不能搞计划“乌托邦”，也不能搞市场“乌托邦”，而应该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讨论中，就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方向问题，与会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向计划与市场的结合过渡，这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本质要求。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向市场经济过渡。因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自我调节，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而计划则是人们对客观经济过程的预测和决策，是主观反映，无论从计划的制定过程和制定方法看，还是从计划的验证和执行看，计划都绝对地依赖于市场。并且，提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经济完全由市场自发调节。现代西方市场经济并不排斥计划调节。强调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真正含义在于，经济运行以市场为基础，以计划为指导，或者说以市场为第一性，以计划为第二性。

5. 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有规律的关系。与会者认为，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即价值规律，是不可违背的。它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有规律，即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社会再生产中自觉调节国民经济总量和结构比例协调规律，自觉调节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规律等，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也是不能违背的。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经济特有规律，并不是孤立地、单独地发生作用，而是结合在一起，在统一的条件下发挥作用的。二者的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建设的理论依据。

二、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结构、特点与功能

与会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应该是一个架构完整、发育完备、秩序良好、辐射面大、作用力强的，与国际市场对接的，以金融市场为中心、以信息市场为先导、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一体化的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应包括如下几方面内容：1. 生活消费品市场。生活资料包括农副产品、穿着用品、耐用消费品、小商品等等，除极少数垄断性产品价格由物价部门进行必要的协调、干预外，其余全部放开价格，由市场调节。2. 生产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包括钢铁、水泥、木材、煤炭、石油、有色金属等，除石油、煤炭、交通运输等行业商品及劳务价格由政府按价值规律进行必要的协调、控制外，其余全部由市场调节。3. 金融市场。它包括短期资金市场如商业信用市场、短期公司债券市场、同业拆借市场等，中长期资金市场如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外债市场、民间借贷市场等。除人民银行外，一切金融机构企业化，形成经营业务上的交叉与自由竞争。放开专业银行的市场利率，允许其按市场供求情况进行浮动。4. 劳动力市场。劳动合同制成为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的主要用工形式，在实施劳动就业市场取向

改革的同时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5. 技术市场。内容是实行技术商品化,保护和促进技术贸易,建立多层次、多种经济成份的技术交易机构,形成沟通海外的技术交易网。6. 房地产市场。公房全部实现商品化。允许私人房地产自由租赁、抵押、买卖。7. 信息市场。一方面,信息要向商品化、产业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市场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亦要求有先进的信息技术来装备,建立起灵敏、准确的信息系统。8. 产权市场。企业产权商品化,允许国营企业的产权转让、兼并和破产,真正做到优胜劣汰。除此之外,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包括服务市场、资源市场、文化市场等。

会上,参会者指出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应有如下特点:第一,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它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形式、多条流通渠道所组成的;它是社会主义多种经济成份再生产和资金循环的枢纽。第二,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在国家宏观计划调控下发挥对经济的调节作用的。第三,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全国统一的。一方面,区域间市场相互贯通,商品和生产要素能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形成资源在全国范围内优化配置的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工格局。第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与国际市场体系密切结合的。二者的结合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现代化。

与会者还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些作用有:(1)导向作用。社会主义市场体系通过市场信号直接引导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调节资源的配置。(2)选择作用。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为商品生产者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经过市场竞争和市场选择,优者胜,劣者汰,以此优化资源配置,平衡市场供求,提高资源利用率。(3)激励和约束作用。为了在市场竞争中保存自己,战胜对手,生产者必须采取各种办法提高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经济效益。市场竞争又具有强大约束力,促使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必须考虑社会需求和社会利益。(4)决策作用。经过市场信息的传递,市场信号的指引,各企业根据资源状况,市场供求情况和自身利益作出投入产出决策。企业的微观决策通过市场的反馈,又影响着政府的宏观决策,为宏观决策提供重要依据。(5)分配作用。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都要经过市场进行,市场参数——价格、利率、汇率、工资等的任何变化,都会引起商品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化,引起国家、企业、个人经济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

三、广东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建设的现状以及进一步发展的思路

有人认为,判断市场体系成熟与否的标志是:(1)要素市场是否充分发育;(2)企业是否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3)政府是否由控制商品价格转到放开商品价格而控制生产要素价格。也有人提出,市场体系是否成熟,最根本的标志是企业是否有活力,市场是否适合企业生存。与会者认为,无论以何者作判断标准,广东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远未发育成熟。

与会者的一个共识是,广东10多年改革开放,走的是一条市场取向的路子,实践证

明，这条道路是对的。目前，市场已居于经济运行组织的主导地位，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市场调节的比重在85%以上。但市场体系建设还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是：各子市场发育不平衡，消费品市场发育比较成熟，要素市场发育不足，特别是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建设严重滞后；市场结构残缺，市场机制不健全，导致市场价格被严重扭曲；市场主体不全，一部分国营企业尚未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现象还大量存在；市场管理尚未规范化，各种规章制度有待完善。因此，从总体上看，我省市场体系仍处于初级发育阶段，必须加速培育。可采取如下措施：

1. 把国营企业推向市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关键。与会者认为，国营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利益主体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国营企业的参与，或者国营企业的市场行为扭曲，那么市场体系就会发育不全和机制错乱。把国营企业推向市场，关键在于进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实行股份制。

2. 以金融市场建设为重点，加快市场体系建设的步伐。由于各类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配置和交换都要通过货币、资金进行，所以，货币、资金既是各类生产要素市场运行的媒介，又是整个市场体系调节控制的中枢。从我省的实际来看，金融市场发育滞后已成为制约我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应把金融市场建设作为重点，带动其他子市场的建设。

3. 继续搞好价格改革，由狭义价格改革（生活消费品、生产资料及服务收费等的价格改革）进到广义价格改革（资金、劳动力、技术、房地产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改革），建立起全新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运行机制和价格调控机制，使各种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相互协调，形成完善统一的价格体系。

4. 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受国家宏观调节的，国家借助经济、行政、法律手段调控市场，而以经济手段为主。目前，我国政府对经济宏观调控的能力较弱，过多地运用行政手段，这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发育，必须由以行政手段为主转变为以经济手段为主，形成以计划、财政、金融为支柱的宏观调控体系。当前的重点是要协调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将政府的经济职能与管理职能分离。政府作为公共财产的代表者，必须遵守各类市场规则，受市场制约；政府作为管理者，要调节控制市场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制定市场运行法则、监督市场运行状况。政府通过建立财政—金融一体化调控机制，交替使用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调控市场体系。

5. 市场体系应与科技进步协调成长。国外市场发展史表明，市场的发达程度是与科技进步的水平相同步的。在新科技革命条件下，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能力主要地取决于技术革新能力与市场体系的融合程度。科技发展水平不仅决定市场容量和市场规模，决定着市场主体的关联方式，而且是推动市场结构变革的重要力量。因此，市场体系建设必须以我国科技发展水平为依据。市场体系的培育进程要与我国经济技术的多元多层

（下转第20页）

宏观经济：理论、态势分析 与政策操作中的几个问题

朱明春

市场机制的引入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变，使得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在我国现阶段经济运行中已有可能成为常态，从而，反周期的总量政策地位明显提高。总量政策不仅要考虑如何压缩总需求膨胀，防止经济过热，还要考虑如何刺激有效需求，启动经济增长，但是，从增长约束看，结构性矛盾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不能因启动经济而忽视结构合理化的重要意义，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必须有效协同。本文拟就我国宏观经济理论、态势分析和政策操作中相应的几个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总量关系与经济运行态势分析

总需求和总供给关系分析是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重要依据，但由于概念使用上的混乱，这种分析在我国的经济形势判断上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为此，有必要先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1. 作为一定时期的流量概念，总需求和总供给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涵义。

在第一种涵义中，总需求指一定时期内全社会实际形成的对最终产品和劳务的货币购买力，总供给指一定时期全社会实际生产和提供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总量。这里，总需求和总供给实际上不过是从产出和收入两个角度对一定时期GNP的计量，在价值量上两者永远严格相等，即产出等于收入：

$$GNP = C + I + G + (X - M) = C + S + T$$

$$\text{从而 } I + G + (X - M) = S + 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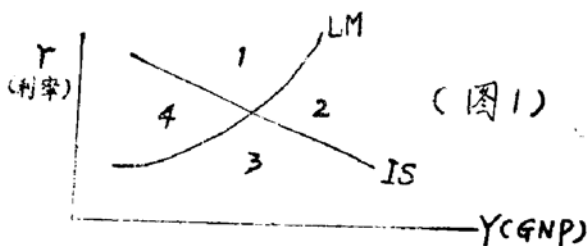
式中C为个人消费支出，I为国内私人总投资，G为政府的物品和劳务购买，X和M分别为物品和劳务的出口和进口，S为居民和企业储蓄，T为居民和企业纳税。如忽略去G、X、M、T等因

素，最基本的等式为 $I = S$ 。

在第二种涵义中，总需求指企业和家庭在一定收入水平下在商品和劳务上的计划支出额，总供给指在一定价格水平上企业愿意或计划生产的产品和劳务量。同样，由于在市场调节下生产是按需求安排的，从一定时期看，只要市场不断趋于均衡，总需求和总供给也相等。

可见，尽管两种涵义下总需求和总供给内容有很大区别，但从流量上看在价格的随机调节下总供求之间的平衡都永远不会被打破。从全过程考察，两种涵义下的总供求概念仍是统一的。问题在于，价值量上总供求的平衡并不意味着微观市场的均衡，平衡并不意味着充分就业、资源最优配置等理想状态的实现。过程上这种平衡也不断地处于不同的价格、就业、投资和储蓄的水平线上。如果以均衡表示理想的价格水平和就业水平下的平衡，则与平衡是一种常态一样，产生于意愿与现实的差距的动态非均衡也是一种常态。均衡只是一种不断趋近的理想态，这种不断的趋近保持了一定时期内总量的平衡。

在经济运行中，均衡的破坏意味着总量平衡处于非最佳水平，即总量平衡点处于资源条件允许的生产可能边界以内，相对于可能的产出水平而言，部分资源处于被闲置状态，社会福利因此受到损失。在IS—LM模型中，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非均衡存在四种不同的组合，如图1所示，除了在IS和LM两条曲线的交点处均衡外，存在四个区域的非均衡状态。其中区域3（投资 $I >$ 储蓄 S ，货币需求 $M_d >$ 货币供给 M_s ）和区域1（投资 $I <$ 储蓄 S ，货币需求 $M_d <$ 货币供给 M_s ）基本上代表了1987年—1988年及1989年—1990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



2. 作为需求管理的政策分析工具，在第二种涵义中，总需求即为有效需求，价格因素的处理既可以出现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现象，也可以出现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情况。但在第一种涵义中总需求却不可能小于总供给，有效需求只是总需求中的一部分，这时所谓需求不足状态用有效需求不足表示更为确切。

假设价格不是象在微观市场上那样随机变动，价格总水平在一定时期相对稳定，总供求之间的平衡就可以被这种价格水平的相对稳定所打破，或者说是被同一状态非均衡的持续所打破。总需求有可能大于或小于总供给，测算公式是：

总供给 = 国内生产 + 进口(用上年不变价算)

总需求 = 固定资产投资需求 + 流动资金投资需求 + 消费需求 + 出口(现价算)

这样，供求缺口 = 总需求 - 总供给，该缺口由物价上涨或强制储蓄来弥补。这里，总需求实际上就是计划需求或有效需求。这种分析的意义在于需求管理，如果国民收入分配额(形成于现价也按现价计算)也即社会货币购买力大于按不变价计算的国民收入生产额，那就意味着物价可能上涨，必须控制已分配的国民收入的使用额，使计划需求控制在使价格上涨过高的水平上，反之，则可以安排更多的计划需求，促进经济的增长。两种涵义的总量分析有着不同的意义，关键区别在于存量对两者的影响大不相同。作为已形成的需求潜力和实际产出量，第一种涵义的总供求概念与经济运行中的存量问题联系更为紧密。

3. 不论那种涵义，总需求和总供给都是流量概念，库存、储蓄等存量概念不能简单地用来说明总量关系问题。

这一问题在第二种涵义的总量分析中较为明显，但在第一种涵义下则容易搞混。存货价值变动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许多人常用“库存超常增加”来说明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事实上，这在微观上也许说明供大于求，但从总量上看，无论停

留在生产还是流通领域，存货都是已分配的产出，在其本身成为一定量总供给的同时，也已形成同量的总需求。如果把价格当作考察和控制目标，可以说存货升值是由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引起的。存货升值意味着总供给在价值量上增加，同时也因存货持有者财富增加而相应地增加了总需求，因此从流量动态看并不影响总供求平衡，只不过均衡价格线变动了而已。存货贬值则是因为市场上实现的需求不足，微观市场形成局部供大于求，但这种贬值并不说明总供给已大于总需求，因为存货贬值使财富持有者的货币购买力降低，总需求下降的同时，也造成总供给在价值量上的降低。如果价格不变，存货贬值会以存货超常增加形式表现出来，但问题的实质仍然没有改变。因此，存货价值变动不能用来说明总供求关系的变化。如果存货中确有部分“无效供给”，那么所能引起的也只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

储蓄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也有许多人用“储蓄超常增加”来说明消费需求不足，进而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事实上恰恰相反，储蓄无论是否已转化为实物投资，都是产生于分配从而也构成总需求的社会购买力，本身只是收入的一种使用形式。因此，如果储蓄不是源于国民收入超分配(如赤字财政或货币超发)，那么这种储蓄必然同时对应着一部分产出，即总供给的一部分。否则只会造成总需求膨胀，而非相反。

4. 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描述与所用总供求概念有直接关系。

由以上分析可见，如果以第一种涵义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概念进行总量分析，宏观经济运行中只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态势，一是总需求膨胀，通过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压力促使物价上涨，否则必然出现短缺；1987年—1988年我国经济就处于这种状态，总需求膨胀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传统体制下长时期的短缺经济，则是总需求膨胀和物价管制并存的状态。二是有效需求不足，1989年底以来的市场疲软即属这种状态，其特征是库存超常增加或价格总水平下降。

这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效需求不足和总需求膨胀可以并存，因为这时有效需求只是总需求中市场实现部分。这种状态的突出特征是生产停滞压力与通货膨胀压力并存。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可以说就处于这种状态，市场疲软并不单纯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与总需求膨胀并存。

在市场机制渐居主导地位，价格放开程度已相当大的今天，这种状态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巨额产成品资金积压与物价总水平上涨并存：1989年，产成品积压大幅度上升，物价指数高达两位数；1990年，产成品资金占压仍达1100亿，而同时物价指数仍为正值。这固然与翘尾因素及调价有关，但不论成因如何，价格在形成中也就形成分配和需求，这一点无法否认。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如果维持正常的库存水平，价格水平就会降低到企业成本无法承受的地步。

如果以第二种涵义下的总需求与总供给概念分析，则可以直接了当地出现总需求过大或总需求不足两种态势，因此事实上更适合总量分析的要求。但这样的分析容易使人忽略存量对经济运行的制约，而在我国条件下存量问题即使在短期经济运行中也是不能被忽略的。

二、结构问题与经济运行的有效约束

总量分析所处理的是短期经济运行问题，一般而言，就较短时期看，存量问题是可以忽略的，但我国的情况则大为不同。由于体制制约，经济发展中的存量矛盾长期积累着，存量不能调整使结构矛盾不断积累，仅靠流量分析远不能正确揭示结构矛盾，尤其是产业结构矛盾。因此，分析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有效约束，必须综合考察流量和存量问题。在对经济运行有效约束的分析中，本文将使用第一种涵义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概念，以求能较好地综合反映存量和流量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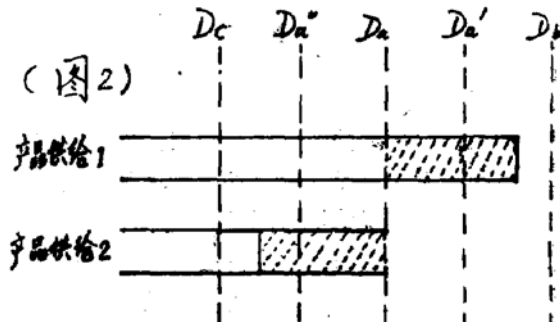
1. 经济运行有效约束的常态是结构性矛盾。

实际经济运行中，总量波动往往与结构问题相联系，无论通货膨胀还是经济增长停滞，背后基本上都受制于结构。我国的情况尤其如此。长期集中计划体制下，结构矛盾积重难返，一直是制约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改革以来，市场机制引入和消费者主权的扩大，取代了计划对产销的衔接，于是需求约束被引入。但在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上，这种需求约束还远不是产生于纯粹的投资意愿不足或消费倾向降低，而是主要与结构不适应有关。资源供给方面的制约更是突出表现在结构性的短线或瓶颈制约上。因此，经济运行有效约束的常态是结构性矛盾。理论分析也能说明这一点。

在价格可变的模型中，由于在价值量上总量平衡永远成立，经济运行的有效约束只能存在于结构上。总供给在结构上是品种质量等具体指标

各不相同的产品或劳务，而总需求尽管都由同质货币形成，但货币购买力的所有者却各不相同，其购买行为方式决定了需求结构。供求结构随时可能不对称，因而非均衡的产生是必然的。

事实上，有效需求概念已把经济运行问题由总量层次转入结构层次，因为需求有效与否也即需求潜力是否在市场上实现，首先与具体的产品供给有很大关系，关键在于产品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是否适应。同样，所谓有效供给如果指市场实现的供给，那么供给有效与否不仅取决于产品本身的物理规定，还与产品价格、产品所处市场区位的需求情况等有关系。正因如此，在总量上，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都难以确切测算，而只能通过市场检验。但恰是这两种状态构成经济运行的有效约束，即需求约束和资源约束都只能表现在瓶颈上，如图2所示。



(说明：图中产品供给1第四栏斜线格内应加 d_1 ，产品供给2第三栏斜线格内应加 d_2 。)

从理论可能上看，非均衡状态下商品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大致有三种，即图中需求处于 D_a 、 D_b 、 D_c 三种状态，其中有效需求不足和有效供给不足都可用 D_a 状态表示。在有效供给不足或资源瓶颈约束下，部分资源供给相对需求水平出现短缺，如图中产品供给2即处于此状态。这种状态的累积在宏观经济运行中则表现为短线对发展的制约，部分社会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有效需求不足约束表现为部分产品供过于求，如图中产品供给1的状态。这种情况累积到一定程度，在宏观经济运行中表现为，需求在市场上的实现不足以维持正常的价格水平（包括利率水平）或库存水平，从而导致企业开工或投资不足，同样导致社会资源的部分闲置。如果价格水平可充分变动，由于总量总能保持平衡，这两种状态下的短缺部分与过剩部分在价值量上都应当相等，即 $d_1 = d_2$ （在多产品模型中应为各 d_1 之和等于各 d_2 之和）。因为价格随机变动会使各供

给水平在价值量上变动，直至这种平衡达到。但这种平衡并不等于均衡，后者应使 $d_1 = d_2 = 0$ 。

在价格控制模型中，图中 Db 状态即总需求膨胀状态，这时有效需求基本上等于总需求，市场压力将迫使价格水平上涨或强制储蓄（这时储蓄也作为一种供给），可将其回复到 Da 状态；Da' 表示结构问题与总需求膨胀并存状态，有效供给不足仍居主导地位，即 $d_1 < d_2$ ；Da'' 则表示有效需求不足居主导地位的需求约束为主状态， $d_1 > d_2$ ；这两种状态在价格变动模型中都可以很快回复到 Da 状态，使 $d_1 = d_2$ 。而 Dc 状态即所谓总供给过大的状态，如前所述按第一种涵义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概念，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因此，如果撇开运行环境问题而从增长看，在价格可变条件下，Da 状态表现为经济运行唯一的有效约束状态，在此状态中，有效需求不足和有效供给不足总是并存的，这表明真正约束经济增长的只能是结构问题。从政策分析上看，总量关系的分析只有助于需求管理和价格水平的控制，而解除经济运行约束、促进经济增长，无论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还是有效供给不足，都不能忽视结构性问题。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经济运行的约束常态与运行常态本身是两回事，前者指的是矛盾本身，后者则是这种矛盾的表现形式。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价格变动的随机性和充分性都有限，价值运动根本上仍受制于实物运动，经济运行事实上经常地处于 Db、Da'' 或 Da' 状态。

2. 解除经济增长约束的关键在于结构转换。

从需求方面看，结构转换意味着使总需求中的沉积部分即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或市场实现的即期购买力；从供给方面看，结构转换则意味着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优化重组，使产业间生产能力结构发生变化，压长线拉短线，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更好地相适应，以此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一般当经济运行处于 Db 状态时，态势分析不会产生大的混乱，因为这种状态有一个明显的市场信号，即物价水平持续的较大幅度上涨。尽管这种状态对经济增长的实际约束仍首先表现为有效供给不足，短线制约日益严重，但同时会出现普遍的供给不足，长线产品也很容易在市场上实现“惊险的一跃”，成为有效供给，因而也就模糊了结构矛盾对经济运行的实

际制约。这时，促进经济增长首先要解决环境问题，即压缩需求、降低通货膨胀率。而一旦需求被压缩到 Da 状态，结构转换这一内在制约仍将突出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

但在需求和资源制约并存的实际经济运行常态 Da 状态，当有效需求不足占主导地位，也即经济运行处于 Da'' 状态时，却往往被误认为是实际上不可能的 Dc 状态，即在某些总量分析中出现的所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在此基础上，政策导向则从结构转换误导为需求外延扩张，即通过由 Da 转向 Db 来增加需求，而忽略了 d_1 与 d_2 之间的某种更为有效的转换。

3. 总量政策在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一般而言，结构性矛盾是经济运行中的长期性问题，产业政策也是针对结构性矛盾改善供给和促进增长的长期性政策，而总量政策则是针对短期经济运行问题的；其基本目的是反周期波动。在西方市场经济中，结构问题由市场自发调整，总量政策的作用关键在于刺激有效需求。而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运行中，总量政策不仅要在总量问题或经济运行的环境问题突出为主要矛盾的 Db 状态下起抑制需求、稳定经济、改善经济环境的作用，而且要在短期结构调整中，一方面启动经济，另一方面与产业政策配合，协同结构调整。

因此，在经济运行的约束常态的 Da 状态中，总量政策也是实现结构转换的重要条件。首先，结构调整不能单纯依赖存量或增量，一般存量调整也必然伴随一定的增量扩张，因为资源互替的局限性不能使“截长补短”恰到好处，因此，结构调整必须要求总量政策的配合；其次，退一步说，即使从资源互替可能上看结构调整可以完全在存量范围内进行，调整成本的制约也使人们更乐于接受在总量扩张中进行这种调整，以把调整成本降到最低限度。我国的情况就更是如此。

值得指出的是，在 Da 状态中，有效需求不足为主的 Da'' 状态在我国也已有成为制约经济运行常态的可能。这使得总量政策的协同更为重要。长期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中总量问题与结构问题之间的矛盾并不突出，只是当市场机制引入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以及消费欠账被弥补后，Da 或 Da' 状态才逐步更多地表现为 Da'' 状态，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才在结构矛盾中突出出来。如前所述，改革已使市场选择和消费者主权逐步建立，

产出在形成收入和购买力也即需求能力的同时，并不直接形成有效需求，尽管这种有效需求不足基本上还未脱离开结构问题，但毕竟提出了反萧条和经济启动问题。另一方面，生产领域无效供给长期得不到有效调整的状况更加剧了有效需求不足约束。据分析，当前我国工商库存积压的产成品中，就有约10—15%这种无效供给，这些过时产品即使在将来需求进一步扩张的情况下也不会有人购买。无效供给的客观存在使得一部分随其产出和分配而来的购买力与生俱来没有相应的供给，因而同时加剧了总需求的膨胀和有效需求的不足。

三、我国现阶段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的协同问题

从我国近年来的实际经济工作中看，结构调整和启动经济中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的协同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1. 结构政策与总量政策的协同方式。

这一问题的难点在于如何判断 Da 状态的需求约束和资源约束中，究竟何者为主导方面。如果是资源约束为主，即经济运行基本处于 Da' 状态，总需求仍处于膨胀状态，这时的基本政策取向应在总量适当控制的前提下进行结构调整，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应以设法实现 d_1 和 d_2 之间的转换为主；反之，如果经济运行处于需求制约为主的 Da'' 状态，则应采取总量适当扩张中实现结构调整的政策，增量调整所伴随的一定程度的总需求扩张会更有助于结构调整的实现。

判断 Da 状态究竟偏于 Da' 还是偏于 Da'' ，在市场经济中，物价指数（包括利率、股票价格等）是一个基本标志。在我国现阶段体制基础上，除了价值形态外，还应同时注意实物形态的运行信号，即资源短缺或产品库存积压水平。因为市场机制主导在我国还仅仅表现在各经济主体强烈的利益动机和边际利益竞争上，但由于行政制约及市场发育不全等原因，这种利益的实现方式尚未完全市场化，不仅利率等金融价格弹性很低，即使物质产品价格也还缺乏足够的敏感度。经济形势的分析还必须较多地借助实物运行状态的考察。一般来看，在经济偏于过热的 Da' 状态时，较为普遍的短缺尤其是基础性产品的短缺直接制约着经济增长，而在经济运行偏于需求制约为主的 Da'' 状态时，库存超常增加成为主要问题，即使仍有些产品供不应求，但并不在整体上左右经

济的发展。

1990年初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基本处于有效需求不足为主的 Da'' 状态，市场疲软、产成品资金积压的大幅度上升，迫使大量企业停工停产。但这一时期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居主导地位，产业结构调整有一个有利条件，即可以在总量适当扩张的条件下进行，即不仅可以使有货币购买力的总需求更多地转化为市场上实现的有效需求，还可以采取较多的增量调整方式，诱导存量调整的有效进行。

2. 必须始终把结构调整放在第一位。

在经济运行处于 Da'' 状态时，有效需求不足居主导地位，经济工作面临结构调整和启动经济双重任务。总量扩张政策能较为有效地从外延上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缓解经济运行的需求约束，但如果因此而忽视了结构调整这一真正的重点，把 Da'' 当作 Dc 状态来对待，急于启动而忽视调整，就难以跳出膨胀—紧缩—膨胀的恶性循环。

由于结构存量调整受体制制约较重，增量调整仍然是我国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手段灵活，需要付出的直接成本较低，对增长速度影响不大，因而较好地适应了决策者的心理预期。但由于增量调整所需资源增量的来源压力，这种方式内在地要求经济重新扩张，往往在调整中途就引发新一轮增长高潮，掩盖了尚未到位的结构调整问题。这可以说是我国经济运行长期以来松松紧紧，结构扭曲不断被复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 Da' 状态下，有效供给不足居主导地位，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较高，人们比较注意总量的控制和结构的调整。但在 Da'' 状态下，政策协同就比较容易出问题。正是由于在这方面的某些失误，1990年我国结构调整与总量政策的协同未能取得应有的成效。以此为例很能说明问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速度追求使启动成了第一位，本应起配合作用的总量政策唱了主角。为了维持社会稳定，1990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本身就偏重于防止增长速度回落过大，而不是彻底解决结构矛盾。从实际操作上看，实际经济政策事实上已有财政金融双紧变为一紧一松，金融政策已相当松。在收入分配政策上也采取了刺激市场需求的措施。但这些措施基本上都是在外延上扩大社会总需求，而在结构调整和使总需求中更大

部分转变为有效需求上，缺乏得力措施，成效不大。尽管在 Da'' 状态下可以较多地借助适当的总量外延扩张政策来帮助结构调整，但一方面由于启动技术上过多地依赖货币扩张，因经济萧条时期流动性陷阱作用降低了启动效果，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由于未能果断加大改革份量，实现结构存量调整，难以支撑新一轮增长高潮，因此启动经济所伴随的总需求扩张未能被经济增长有效地吸收，反而加剧了总需求膨胀的矛盾。

(1) 总需求外延扩张，生产启而不动，滞胀危险加大。为启动经济，银行贷款增长过快，1990年全年银行各项贷款增加量达2700多亿元，大大超过1989年全年1850亿元的水平，也大大超过当年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幅度之和；全年货币净投放量（流通中新增货币量）约800亿元，大大超出应控制的水平；全年 M_0 、 M_1 、 M_2 增长率分别为12.8%、19.1%、27.7%，超过工业增长速度的幅度是1985年以来最多的一年。与此同时，启动效果却十分不理想，据测算，过去 M_1 每增长1.4—1.6%，工业产值可增长1%，而现在 M_1 必须增长5%以上才能达到同一效果。此外，后期采用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启动，新开工项目过多，使在建规模进一步扩大，出现投资膨胀势头，更加剧了总需求膨胀的危险。

(2) 有效需求仍然不足，市场疲软仍在持续。由于结构制约，总需求外延扩张并未能有效地将过大的总需求转为能在市场上实现产品价值的有效需求。银行贷款更多地是转变为流动资金占压，而不是进入有效的社会资金循环。据统计，在新增各项贷款中，流动资金贷款占76.7%，银行贷款的大部分被用于产成品和发出商品上，即仅被用作结算手段，发出商品资金占压与产成品资金之比已达1.45:1，大中型企业该比例更达2.03:1；此外，还有部分贷款甚至被用于发

工资奖金，根本未进入社会生产循环，只形成潜在消费需求，未能起到应有的生产启动作用。固定资产投资虽然能有效地形成市场最终需求，但一方面由于资金并未真正到位，投资的资金来源不落实，另一方面更由于新开工项目过多和在建规模过大，膨胀势头加剧，在结构问题未解决的条件下并不能作为启动生产的主要方式。在消费方面，尽管1990年居民收入仍有较大增长，但由于心理预期的作用，消费倾向的下降大大快于1989年的0.1%，而达8.9%，全年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仅增长1.9%，大大滞后于生产回升的速度。

因此，从根本上说，1990年经济运行虽然在增长速度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对改善我国现阶段的经济运行机制、解决经济运行中的制约矛盾，并未做出实质贡献。这种做法从某种意义上看延误了时机，即错过了可以用总需求外延扩张这种较适合于现行体制下结构调整的方式优化结构的时机。正因如此，今后几年我国经济发展，仍不得不面对同样的矛盾，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看更为严重。从理论上讲，由于1990年总需求外延扩张较大，1991年后经济运行已由 Da'' 状态转入 Da' 状态，有效需求不足与总需求膨胀仍然并存，且总需求膨胀压力明显增大了。因此，进一步的总需求外延扩张已不可取，适当坚持总量紧缩，大力促进 d_1 与 d_2 之间的转移，重点调整产业结构应是近几年经济工作的总方针。使经济运行走上良性循环的出路在于，在总量控制的条件下通过创新和结构调整刺激潜在需求向有效需求转换，在结构合理化的同时解决市场疲软问题，为新一轮经济繁荣创造条件。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宏观调节部

责任编辑：郑英隆

文明观若干问题初探

邹永图

人类文明现象的产生与发展，不断地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他们探究其本质，追索其根源，分析其结构，指明其作用，从而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这里涉及了科学的文明观这一重要问题，它是建立各种科学的文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前提。要建立科学的精神文明学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的理论体系，进一步研究科学的文明观这一理论导向是很有必要的。

科学的文明观，在当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它的理论基础并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是我们分析和认识人类社会文明现象的根本观点和研究方法。

什么是文明？文明现象的本质是什么？文明有何基本特征？这是任何文明观必须首先解决的最一般的问题。如果不先解决一般的问题，就去着手解决个别问题，那么，随时随地都必然会不自觉地“碰上”这些一般问题。^①我们对文明观的研究，同样应当遵循这个原则。

一、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关于“文明”概念的指谓

据现有的文献，大致有如下几种：

一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个历史时代和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人类的文明时代是与人类的蒙昧时代、野蛮时代相比较相对而言的。这是恩格斯在摩尔根历史分期基础上提出的。他认为，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应用于文献而过渡到文明时代。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交换、商品生产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②从而可见，文明是指人们物质生产的提高与发展水平以及人们智力与精神活动的进步状态。

二是指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积极成果。马克思把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包括在文明的一切进步之中。^③恩格斯谈到人类社会发展前景时指出，到那时每一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④他把科学、美术等等称为文明中间一切精致的东西。^⑤

这些论述说明，文明应当是人类创造的物质文化、政治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中有价值的积极成果。

三是指同中世纪和封建制度相比较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文明。作为社会制度，以资产阶级为统治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在文明的道路上迈进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一方面，资产阶级文明带来了它的美好的果实；^⑥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⑦列宁曾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整个所谓“文明的”社会制度的真正实质，^⑧认为资本主义的野蛮超过一切文明，并称之为文明的野蛮。^⑨这些论断表明，社会制度的进步是文明的重要表现；但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制度和剥削阶级总是具有两重性，是文明与野蛮的结合体。然而，这并不是文明本身具有两重性，文明总是表现为进步、革命、前进、向上的东西，决不表现为野蛮、愚昧、落后、反动的东西。马克思、列宁批判和否定的不是文明本身，而是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制度。这正如傅立叶无情地怀疑和批判“文明制度”一样，他怀疑的其实不是文明，只不过是文明民族社会制度所具有的一些根本缺点存在的不可避免性。^⑩

四是指人类自身的文明，即文明是人类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发展状态和人到达全面发展的过程。这就是恩格斯指出的，文明的发展历程，就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有些著作忽视了文明范畴这个重要的规定性，认为人的素质的提高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这是对的；但却不是从文明范畴上述规定性逻辑得出的结论，只是从文明建设的实用性而言。可以说，文明范畴这一规定性，最能反映和说明文明的本质。

二、关于文明的本质

文明作为人类自身的进步和开化状态，作为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过程，为什么说最能体现文明的本质呢？至少包含了如下几层意思：

首先，人类自身的文明，是通过劳动使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而开始萌芽的。这是经过几十万年时间从猿到人的历史过程，但这仅仅是人类走向文明的第一步。恩格斯详尽地论述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劳动创造了文明。由“野蛮人”到“文明人”的历史发展，是由人学会生产和发展生产这个同自然进行斗争的进程决定的。这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⑪

其次，人类自身的文明，表现在人类不断发挥自觉的能动性，自觉地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列宁说得好，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造世界。^⑫人类的自觉能动性，生动地表现在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预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⑬现实的历史不是别的，只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创造世界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

最后，人类自身的文明，表现于对客观规律和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和利用，不断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渡和飞跃。马克思早就指出过，人类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⑭人类追求自由的过程是漫长的历史过程：

第一步是人类从自然的统治下获得解放。人类从旧石器到新石器、从捕猎到驯养、从农业到工业等等的进程，就是人从自然界获得自由的过程。最初的、从动物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⑮

第二步则是把人类从各式各样的压迫和人剥削人制度下解放出来。这只有通过工人阶级的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在实际上表明，它而且只有它才是现代文明的支柱。^⑯因为，工人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

最后一步是成为自由的全面发展的人，即被马克思称为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种人也就是恩格斯说的，人终于成了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了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在经历了这些历史的步伐之后，只有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⑰这种飞跃将表明成人类为了最文明的人，社会是最文明的社会，这时的人类社会发展史，才是真正名符其实的文明史。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大致上得出关于文明概念含义的基本规定性。文明既是人类自身不断开化和提升的程度，又是历史时代的更新与飞跃的状态；既是社会制度的革命和进步过程，又是社会文化繁荣与发展的积极成果。

文明总是同野蛮、愚昧、落后、反动等相比较而存在，相对立而发展的。简言之，从人类到社会，从历史到现实，凡属真、善、美的东西，都是文明的表现；而假、丑、恶的东西都是对文明的否定，是文明的对立面。文明虽然有各种不同的形态和特征，但是，归根到底，就文明的实质而言，乃是人类自身的文明。文明现象形形色色，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人的本质按真、善、美的方向的对象化，是人的本质积极的实现过程。

首先，对自然而言，根本无所谓文明，文明只归人所有。自然界从山水树木、虫草花鸟、江河大海、高山峻岭、植物动物；从无机到有机，小至原子，大至宇宙，都在自生自灭，自发地变化和运动，确实无文明可育。反之，除了人类之外，即使再高级的动物也是野蛮的。再者，历史时代的文明，归根到底，也是人类自身文明发展的产物和表现。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它的出发点是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不是上帝创造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的规律也就是人们活动的规律。最后，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文明，实质上，也是人类自身的文明。有的论著，离开人类来讲文明，好象有一种没有人的社会文明的独立存在。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三、关于文明与文化的关系

从学科的分类以及科学研究的对象来看，研究文化现象的“文化学”应当与研究文明现象的“文明学”有所区别。但是，从人们研究这两门科学以来，对于文明范畴与文化范畴的界定，往往是混淆不清的，或者将两者等同，或者将一者代替另一者，也有的人将两者对立起来（如：施本格勤将文明视为技术机械因素之总和，而把文化视为有机界，甚至把文明看成是社会没落和灭亡的标志。）象有十大卷之多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也只有“文化”条目而没有“文明”的条目。“文化”的定义据说有160多种，而“文明”的定义却甚少。

文化与文明两者是既有密切联系又互有区别的两个范畴。

首先，文化与文明有共同的主体，都是人类劳动和精神活动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程。如果说，“文明”归根到底是人的文明，那么，可以说“文化”亦即是“人化”。因为文化不是天生的，而是人们改造主客观世界的产物，是人们的思维、知识、信仰和行为的总和。正如自然界本身谈不上文明一样，自然物本身也不是文化。自然界只有经过人的劳动所开发、改造、加工、利用，成为满足人的需要的成果，才称得上文化。文化首先是人类改造自然，在自然界打上人的印记，使之成为社会的物质财富。从广义上说，经过人所改造的“人化自然”，都可以称为文化。包括人们用来改造自然的劳动工具和各种劳动的物质产品。文化不是物本身，而是在这些工具和产品中体现了人们技能、思想、感情、观念、设计和方案以至理想和追求，这才是“人化”的本义。但是，“文化”不等于“文明”，“人化”也并不就是“文明”。因为，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文化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一样长久，但文明的历史则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形成，比文化的历史要短得多。据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的材料，人类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经历了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历史时代。前二个阶段约有9万5千年，而后者即文明时代才5千年。恩格斯也正是从文化比文明有更长的历史的依据出发，把上述人类发展的三个历史时代的前二个时代称之为“史前各文化阶段”，最后时代称为“文明时代”，而不是将三个时代都统称为人类文明时代。原始文化可以没有文字，而古代文明则一定要有文字为标志。就是说，前二个时代的人们对自然的改造成果，是文化的体现，但从总体上而言却不是文明的体现。正如《古代社会》所言：“认真地说，没有文字记载，就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文明。”恩格斯也强调冶炼技术和文字应用作为文明的开端。这些正说明文化与文明不能分开又不能等同的关系。

第二，从文明时代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看，文明与文化结成了同一共同体的共生关系。在这个共同体中，文化是文明的载体，文明则是文化的灵魂。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列宁都把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精致的东西视为文明的东西。离开了各种文化的形态，文明也就无所寄托、不能存在了。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文明与文化结成了共生关系，结束了分离的关系。一般说这种共生关系，使得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通过人类创造的物质文化的先进和丰富成果来体现；政治文明通过政治文化的革命和民主的成果来体现；而精神文明则通过精神文化的真、善、美的成果来体现。社会客体的文明与文化具有

共生关系是如此，社会主体的人的文明与文化的共生关系也一样。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或者文化落后的民族，不可能有高度的文明；同样，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很难有文明的思想 and 文明的行为以及文明的生活方式。所以，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就不可建设文明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文明与文化这种共生关系，不能理解为等同关系，不能否认它们的差异性。文化一般具有两重性，往往有精华与糟粕、革命与反动、先进与落后、健康与黄色之分。在一种文化中，真、善、美的东西往往与假、丑、恶的东西共存。但是，文明却不具有这种两重性，它总是文化中的积极的、健康的、先进的成果。从历史到今天，世界上，有反动的文化，却无反动的文明；有文化的精华，却无文明的糟粕。总之，文明是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标志，是文化载体的灵魂，文明是文化建设的目的和归宿。也可以说，文化是文明的前提和基础，文明是文化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最后文明与文化相比较，无论从过程还是从结果看，两者有共同性，又有不同的特殊性。其一是文化与文明都共同具有主体性，都是人类创造的过程和成果，都是“人化”的产物，都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进程和标志。其二是文化与文明都是共同具有超自然性，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具有社会性，因而也有其历史性。正因为有了人类的文化创造，才有社会的存在；正因为有了人类的文明，才使社会不断繁荣和发展。反之，社会的状况和条件又制约着文化发展的水平和文明发展的程度。其三是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文化现象与文明现象，一般都带有一定的阶级性，有不同阶级的文化和文明，它们有不同的社会历史的作用和价值。这些都是文化与文明的一些共同性。但是，两者又各有自己的特点，不可不予注意。因为这对于文明建设和文化发展的指导有重要的影响。比如，如果说，文化一般有较强烈的民族性，那么，文明的成果则往往为全人类所共享。又如，文化成果的继承性往往通过批判性来取得，而文明的成果既可以通过积累而继承或发扬，也可能在特定社会环境和条件下丧失或遭受破坏。再如，文化一般表现于人类精神生活的过程和人类精神生产的过程之中，而文明则往往体现在精神生产的积极成果之中；文化往往表现于人们行为及其生活方式的规范中，而文明则往往更多地体现在人们的高尚情操和崇高的理想之中。

① 参阅《列宁全集》第12卷，第476页。

②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页、第31页、第170页。

③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68页。

④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8—479页。

⑤ 参阅同上第1卷第580页。

⑥ 参阅《列宁选集》第3卷第586页。

⑦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4页。

（下转第16页）

把商品经济意识的精华上升为全民意识

张秀玲

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依然是商品经济，因而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着商品经济意识，商品经济观念或思维方式，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进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意识的教育。对此，有论者提出异议，认为不宜笼统地去提倡商品经济意识，还是要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去教育人民。还有人觉得，在人民中提倡商品经济意识会造成思想混乱，因而极力反对宣传商品经济意识。

笔者认为，商品经济意识的社会效应具有二重性，笼统地去提倡商品经济意识，会人为地强化它的负效应，变相地支持了社会中的腐败现象；对商品经济意识采取严厉的批判态度，虽然可以削弱其负效应，但不能发挥它的积极作用。正确的做法是，我们应该一方面引导人们自觉地抵制它的负效应，同时要将其精华上升为全民意识并在人民群众中倡导，这样就可以丰富中国人民的思想，加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步伐，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

商品经济意识是商品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反映，它包括四个基本观念：等价交换观念、竞争观念、市场观念、盈利观念，与这些基本观念相联系的还有：效益观念、进取观念、节约观念、风险观念、信息观念、顾客至上观念等等。商品经济意识本身及其社会效应都有二重性。商品经济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形态：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里所说的商品经济意识指适合于各种商品经济形态的一般商品经济意识。这种商品经济意识在不同的商品经济形态中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任何一种商品经济形态中，只属于经济领域的观念或思维方式，如果把它作为全民意识让它通行于社会各个领域，必然会扩大它的负效应而导致严重的后果。但是，同类的个别事物有其共同的本质、特点，共性包括个性的一部分一方面或本质，我们把社会各领域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中具有共性的积极因素上升为全民意识，即做意识升华工作，这又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我们一定要正确理解商品经济意识与全民意识的关系。

弄不清楚商品经济意识与全民意识的关系，宣传工作就会出现左右摇摆的现象，也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前几年，人们看到商品经济意识在冲破自然经济观念的束缚，形成了开放向上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一大批精明强干的企业家，于是大家纷纷撰文宣传商品经济意识，把它作为全民意识来提倡，提出要在全民中进行商品经济意识的教育，用商品经济观念去取代各种传统观念，可是却忘了把它的负效应告诉人民，更没有考虑

到把没有普遍意义积极意义的商品经济意识引进社会各领域的危害性，致使商品经济意识在向社会各个领域渗透的过程中，如等价交换观念等不同程度地渗透到社会政治生活乃至党内生活里面。与此同时，伴随着商品经济而来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意识腐蚀着人们的灵魂，使一些人的思想发生了混乱，思想政治工作者感到迷惑，精神文明建设出现了“滑坡”。现在，当大家开始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时，又在报刊上大力宣传抵制商品经济意识的负效应。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连在经济领域中也不敢理直气壮地去提倡商品经济意识了，这显然也是不对的。这是因为，我国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虽然有了一定的商品经济意识，但发展并不平衡，许多人的商品经济意识还很肤浅。人们已经注意提高经济效益，但在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和产值时却忘了效益；人们似乎树立了信息观念，但还不懂得如何处理信息；人们好象有了效率观念，却又缺乏提高效率的手段；人们开始懂得节约，却又偏偏造成了严重浪费——浪费时间、浪费人材、浪费材料、浪费劳动力。广东佛山市是一个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然而，“一位台湾商人考察了佛山市某企业后，很惋惜地对该厂厂长说：贵厂是一流的设备，二流的厂房，三流的管理，四流的营销。产品质量虽好，却没有占领市场。”（《南方日报》1991年11月1日）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们缺乏第二次竞争意识（产品如何实现本身价值称为“第二次竞争”）——产品的形象宣传、营销策略、服务系列等。由此可见，我们应该在经济领域里强化商品经济意识，否则，会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要引导人们自觉地削弱其负效应，正确处理好商品经济意识与全民意识的关系。

如前所述，在商品经济意识中，等价交换观念、竞争观念、市场观念、盈利观念是基本观念，它们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经济领域内，树立和强化这些观念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决不能把它们当作全民意识，因为这些观念的社会效应都具有二重性。例如盈利观念，即利润观念，也就是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要考虑是否赚钱的观念。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形态中，对价值和利润的追求成为生产活动和经营活动的最高目的，也是人们的生活目的。唯利是图、贪得无厌是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本性。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的使命就是赚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第148页）盈利观念表现出唯利是图、拜金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腐朽的、没落的。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代表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去追求利润，盈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的需要，因而，盈利的手段也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是符合职业道德的。但是，我国目前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化水平不高，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企业等多种所有制并存，不少集体和国营企业的领导人或承包者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思想，竞争仍然在不同的所有者或不同的生产者之间进行，盈利的直接目的仍然是为了个人或单位，盈利的最终目的也不可能完全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这就使盈利观念有了诱发拜金主义的内部条件。同时，目前我们的经济活动具有国际性，跟外国资本家打交道不可能不受其思想意识的影响，这就成了拜金主义产生的外部条件。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盈利观念仍然

有诱发拜金主义的负效应，“金钱第一”的思想就是它在意识形态中的具体表现，社会上许多腐败现象的产生均源于此。美国经济学家艾伯特·萨特斯说：“我不是怀疑利润动机的重要性。我只是不希望整个体制都顺从于它。当你大肆鼓吹利润和自身利益的时候，人们便越来越趋向于追逐这些东西。”这个说法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在商品生产和经营活动中，以盈利作为直接目的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把盈利观念作为全民意识在人民中提倡那就会出问题。再如竞争观念，它是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在互相联系的经营活动中把争夺一定的经济利益、优胜劣汰作为行为准则。从消极方面看，竞争观念往往与利己主义、虚假作风和宿命论相联系。首先，竞争者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在竞争中取胜，以牺牲失败者的利益为代价，竞争的出发点和直接后果都是利己性的，因而竞争观念含有利己主义因素。其次，因为竞争者的利益不同甚至对立，容易产生弄虚作假作风。再次，竞争是要冒风险的，要在竞争中取胜，除要以实力（更新设备、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降低成本等）作为基础，还要有机遇、有实力而且能抓住机会实现了商品交换才知道自己是不是胜利者。于是人们往往把机遇看成是纯粹的偶然性而产生宿命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计划性的商品经济，它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同，在竞争的目的、性质、特点、范围等方面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虽有明显的区别，但仍有共同之处。因此，把竞争意识作为全民意识加以提倡也是值得商榷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与上述四个基本观念相联系的效益观念、进取观念、节约观念、效率观念、信息观念、顾客至上观念等是有积极意义的，是商品经济意识中的精华，可以作为全民意识提倡，扩大它们的积极效应。例如效益观念，它是盈利观念的基础，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有了效益观念就会精打细算，注意节约，千方百计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然而，效益却涉及各行各业，物质生产讲经济效益，精神生产讲社会效益，机关工作讲效率也是间接的社会效益。由此可见，效益观念完全可以作为全民意识。“提高经济效益是一种社会综合力的实现，它是直接或间接涉及到各行各业、各个部门和各个单位，因此，效益观念应该是一种全民意识。如同爱国主义观念、法制观念等等已深入人心那样，效益观念也应该渗透到人们的理想、追求、道德、情操和行为中去，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新华文摘》1991年第一期第42页）再如进取观念，就是志气高大，努力向上。有了进取观念，人们就不会满足于物质和性欲的低层次追求而变得更有理想；有了进取观念，会使人勇于开拓，不断创新，冲破墨守成规的小农观念的束缚。再如节约观念，就是精打细算，节约开支，节约时间。树立节约观念，会使人们处处节约时间、节约资金、节约原料，提高效益，增加社会财富总量；“树立节约观念，会激励人们艰苦创业，全民奋起摆脱贫困与落后，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商品经济手册》第52页）而效率观念是关于在商品经济中讲求效率，加快节奏的观念。“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树立了效率观念，提高办事效率，就可以节约时间，提高效益；树立了效率观念，加快节奏，就可以克服小农的惰性，焕发民族的活力，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所以，效益观念、进取观念、节约观念、效率观念都可以作为全民意识在

人民中提倡。

至于顾客至上观念和信
息观念则是从市场观念派生出来的。市场观念是商品生产和经营要考虑消费者的要求，重视市场情况的变化。有市场观念的人都会有顾客至上观念、信息观念。“顾客至上的观念，这是现代化市场营销观念的核心。”（《羊城晚报》1991年9月11日）商品生产和经营一定要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将顾客的利益放在首位，为顾客服务。商品生产和经营的直接目的是盈利，其最终目的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另一种是为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盈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私利，顾客至上的观念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不一样的。现在，有些企业为顾客服务不错，但赚了钱既不用于扩大再生产，又偷税漏税，以各种名义把钱分光，致使收入过分向个人倾斜，中央财政赤字连年。如果盈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利益，那么顾客至上的观念与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一致的，前者是后者在商品生产和经营中的体现。

把商品经济意识的精华上升为全民意识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第一，思想建设要密切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国的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随之而来的商品生产和经营活动已成为社会的基本活动，反映它的商品经济观念和思维方式已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种形势下，思想建设一定要注意研究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思想反映，清醒地认识到商品经济意识的负效应在群众中造成的危害，做好思想引导工作，使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提高。李瑞环同志讲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密切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这是“反映客观实际和思想政治工作规律的重要原则和具体方法”。（《关于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1990年5月18日）

第二，要引导人们在实践中进行意识升华。把商品经济意识的精华上升为全民意识在人民中倡导的方法，实质上是引导人们在实践中进行意识升华的工作方法。用这种方法去提高人们的思想水平是有效的。这是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深入了解他们的实践活动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引导他们在实践中进行意识升华容易被他们接受。当前，人们关心的是商品经济，谈论的是商品经济，反映商品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商品经济观念和思维方式对社会影响很大，我们把这些观念和思维方式中的精华上升为全民意识就能适合人们的心理状态，易于被人们接受。这种做法与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去教育人民并不矛盾，它体现了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丰富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

总之，在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的形势下，如何看待商品经济意识，如何进行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是时代给我们理论工作者、思想政治工作者提出的新课题。只要我们从实际出发，进行辩证的分析，就可以总结出一套比较科学的方法。这对于推动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有重要意义的。

作者单位：佛山大学社科部 责任编辑：范英

智慧新说

石松

千百年来，无数的人无数次谈论过智慧，但还不曾有专门探讨智慧的专著；有些书籍虽以智慧为题目，却未以阐发智慧为主旨。因此，认真对智慧进行全面的研究，是今人的重要责任。本文只着重剖析世人较为关心的几个主要问题，以便展开新的探讨。

一、关于智慧的涵义

头脑是天地间最复杂的物质系统，而智慧则是发生于其间的种种精神中最奇妙的东西。古往今来，人们对智慧作过各种各样的界说，但没有一种可以称得上是完美的。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这一看法很有道理，但也有不足之处。说出真理就是发现真理，它讲的是体现于认识过程中的智慧，而在社会生活中，智慧实际上是无所不在的，它的神奇功能还显示于认识以外的各种活动中。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可以说是尊重自然规律，不违反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是不能创造和不可抗拒的，尊重自然规律和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当然是智慧的表现。然而，人又能在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运用和驾驭自然规律，使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这是智慧的更高的表现。

我国新编《辞海》给智慧做了这样的解释：“对事物能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它对智力的一种解释是：“通常叫智慧。指人认识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两种解释是大同小异的，而且都较为全面，即二者都同时从认识和实践两个角度揭示了智慧的内涵。然而，用哲学的尺度来衡量，这两者的概括性可以说还不够广，其解释没有统一性，未能完全揭示智慧的最一般的特征。

立足于哲学，应该做如是界说——所谓智慧，就是人们创造性地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样的智慧定义，是以对问题的哲学理解为前提的。问题是人们活动中普遍存在即无时无刻不有并具对象意义的事情。有人将问题解说为

“人没有认识而应该认识的东西。”这种看法很在理，但它仅仅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谈论问题。参照这种表述方式，我们还可以作出如下判断：

问题是能够实现而尚未实现的任务，或是能够完成而尚未完成的使命，这是从人们创造历史的角度来谈论问题的；

问题是需要弄通而尚未弄通的知识，或是需要掌握而尚未掌握的技术，这是从教育或训练的角度来谈论问题的；

问题是必须战胜而尚未战胜的困难，是必须征服而尚未征服的险阻，这是针对某一具体实践过程来谈论问题的；

问题是应该摆脱而尚未摆脱的危机，或是应该迎接而尚未迎接的挑战，这是针对某一异乎寻常的具体情势来谈论问题的；……

一言以蔽之，问题是人们在谋求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必须解决而尚未解决的矛盾。应当指出，问题表现为矛盾，但不是任何矛盾都可以说成是问题。只有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实践过程，人们觉察到需要解决、有条件加以解决，但还没有解决、急待解决的那些矛盾，才可以称为问题。

把问题上升为哲学概念，对它做出合乎实际而有普遍适用性的解释，我们便可以构想出概括性更高的智慧定义。在人类社会，任何智慧都表现为恰当地提出和圆满地解决某种现实问题的能力、才华、本领或技艺。这种以创造性、开拓性、超越性为特点的智慧，几乎囊括了人的生命力量中的所有精华部分，它既包容了认识、获得真理的能力，又包容了学习、理解知识的能力；既包容了发现、揭示客观世界种种奥秘的才华，又包容了发明、创造桩桩有益于社会的物品物件的才华；既包容了修身养性、待人接物、美化生活的本事，又包容了改天换地、治国安民、推进历史的本事；既包容自觉地尊重、服从客观规律的技艺，又包容了有效地运用、驾驭客观规律的技艺；……

有人认为：“智慧在于人与道相契合的状态。”

而道表示“宇宙间的普遍联系和运动规律，即辩证法。”“智慧的追求恰恰是要从技进于道，即从具体事务向普遍联系超越。”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持这种看法的人同时指出：“智慧是全面的。在任何一种方式中突出智慧，都可能成为对智慧本身的限制。”^①对于智慧的这种规定似乎欠全面。智慧是多种多样的，这里所讲的只是“哲学智慧”，而不是“伦理智慧”，“健美智慧”、“情感智慧”、“生存智慧”或其他特殊种类的智慧。其实，道和智慧都是有层次的。道不仅指辩证法所阐明的普遍联系和普遍规律，而且指实证科学所揭示的特殊联系和特殊规律；作为人与道相契合的状态的智慧，不仅表现为人们对于道的省悟、认识，而且表现为对于道的运用、驾御。因此，从总体上说，所谓智慧，乃是同人们悟道、识道、用道、御道的活动相关联的对于现实问题的回答和解决。只有这样来理解道、理解道和人的契合关系，来规定智慧的内涵，我们才能在智慧问题上真正跳出片面性的怪圈。

二、智慧在精神王国中的位置

从总体上看，精神世界可以划分为三大系统，即认识系统、意识系统、智慧系统。

首先应该肯定，智慧同认识、意识具有共同性、共同点。其表现是：第一，它们都是人脑所具有的机能，都是头脑的产物和属性；第二，对于物质来说，它们都是第二性的、派生的东西，它们都不具实体性；第三，它们都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现象，都具有社会性。

必须加以强调的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把智慧归并于认识或意识系统之中，使它失去独立的品格和位置。智慧同认识或认识的差异主要有：

第一，存在方式不同。认识和意识都通过具体的形式、形态而存在。例如，认识或者表现于经验、观念等感性形式之中，或者表现于假说、理论、学说等理性形式之中；意识（社会意识）或者体现为感情，风俗、习惯、成见、信念、自发的倾向等社会心理，或者体现为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艺术、科学、哲学等社会意识形式。智慧则无具体的稳定的样式，它深藏于人们心灵中，显露于和融化于千千万万的实践成果、认识成果和社会意识形式之中，唯有通过对已经解决的问题和与之相应的成果的具体的描述、分析与评价，才能弄清该种智慧的内容、特点和状况。

第二，功能和特点不同。认识和意识都以客体为对象，它们的基本功能或作用，就是以某种方式和形式报导、报告或记录、记载客体是什么、是怎样的。智慧则不同，它以实际问题为对象，其功能或作用，就是依据某种意识，应用某种经验、知识，解决人们生存和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或者说，就是运用包括理性在内的生命力量来掌握、驾驭现实的主客观条件，使所从事的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并取得成功，甚至造成令人惊叹折服的奇迹。认识和意识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对于客体的反映性，而智慧，虽然它到处显示着神奇的力量，却不反映什么，它的最一般的特点，可以说是由解决现实问题而表现出来的对于事业的推进性。

第三，发展的路子不同。认识和意识都随着社会实践、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不断演变、不断进步，在其发展前后有所继承又有所更新，同自然界和社会上的事物一样，其发展表现为破旧立新、推陈出新的前进变化。智慧虽然也随着文明与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发展、步步升迁，但是，它有确定不移的连续性却无法遗传，它连续不断地升华跃迁，却无所谓更新。智慧的发展并不表现为革故鼎新，破旧立新的巨变，智慧是常新的，但它无故可革，无旧可除。智慧的发展，是由全人类的经验、科学、技术、技艺等优良的精神力量的积累、扩展而自然地发生的，它总是通过只有对历史条件、时代潮流、文化背景、民族传统等相关因素的具体分析才能加以理解的一系列无形的情势与环节所造成的上升趋势显示出来的。

第四，表现内部差异性的情况不同。无论是意识、认识，还是智慧，都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其内部都具有巨大的差异，但其间的差异性的表现却大不一样。意识和认识都是无限多样的，这种多样性，可以从“有多少个观众，就有多少个哈姆雷特”的感叹中得到证实。多样性的意识和认识可以划分出类型，即有些认识是正确的，有些认识是错误的，有的意识是积极的健康的，有的意识是消极的病态的。研究意识和认识，首先要分清它们的性质，才能从量上考察它们的程度。智慧与此相反，它们不能被划分为正确错误、积极消极这样的两种类型。当然，智慧也可以划分为某些类型，诸如群体智慧、个体智慧，世界智慧，民族智慧，哲学智慧，科学智慧，伦理智慧，情感智慧，生存智慧，发展智慧，创造智慧，

革命智慧等等，然而，这里的类型划分，不象意识或认识那样以自身的性质特点为依据，相反，是以智慧所依附的事物，以智慧所发挥作用的对象或智慧所显示功效的领域为标准。必须明白，多样性的智慧本身并无质的区别，智慧类型的划分是外在性的。从表现来看，智慧有大小之分、强弱之殊、高低之别，其多样性或内部差别性是由许多不同的等级显示出来的。等级性是智慧的最突出的特点。即令是在创造智慧很高的人们中间，这种等级性亦表现得很显眼。同样是作家，有的人一生只写了少数几部作品，有的人则写了多得惊人的作品；同样是发明家，有的只有几件几十件发明，有的则有数百件甚至数千件发明。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书中引述泰纳《英国文学史》的一段话，也十分精彩地说明了这一点。其话云：“当文明发展进程中新的进步产生出一种新的艺术时，总会有几十个杰出人物以一两个天才为中心应运而生，几十个杰出人物只能把社会思想表现出一半，而一两个天才却能把这种思想完全表现出来。”

第五，发挥作用的规则不同。意识和认识由于有正反两种类型，它们在社会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不能不有兩種相反的情形。一种是促进推动作用，一种是阻碍破坏作用。不同类型的认识或意识同时发挥作用总会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销，若一方的力量相当强大，则另一方的作用就淹没于其间；同一类型的意识和认识，其作用可以朝同一方向发挥，并产生互补协同效应。至于智慧，由于没有正确与错误的差异，没有积极与消极的分野，其作用的方向总是协调一致的，其作用的效果一概是优良佳好的，大凡智慧都是对社会、对民众有益有利的。在群体活动中，特别是在正义的事业中，多样化的智慧能够以最佳的方式协同、互补，从而极其有效地放大群体的力量，产生极其理想的整体效应，推动事业或历史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向前进步。

以上表明，在精神王国中，智慧这一子系统和其他子系统之间的差异和区别，比意识系统和认识系统之间的差异和区别更为巨大、更为强烈。

智慧具有相对独立性，这一点还可以从它与知识的具体关系来加以说明。智慧与知识有明显的区别，因为知识作为认识成果可以传授、转让以至于共同分享，智慧作为心灵的妙用，虽然可以启迪、激发、促进，却不能传授、转让、分

享。智慧和知识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二者始终是互为因果的；一方面，知识总是在智慧的显现、发扬与闪光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科学知识实际上是人类智慧的光辉结晶；另一方面，智慧又总是在掌握运用科学知识的过程中发生和表现出来的，离开科学知识，智慧之花也无法开放。必须强调的是，智慧与知识的联系是以它们的区别为前提的。智慧既培养、抚育知识又植根于、奠基于科学知识，二者这种不可分割的相依相助相生相长，证明了人类智慧和科学知识不能是相互从属的东西，而只能是彼此并列的因素，假如智慧与知识是毫无区别的同一种东西，那么，谈论二者的联系便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或完全多余的举动。

由于智慧具有确实不同于意识和认识的独特特征，由于智慧和知识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由于智慧的性质、特点、作用、生长方式及状态更难于理解和把握，因此可以说，在精神王国中，智慧是更奇妙、更抽象而处于更高层次的独立系统。

三、智慧的产生和发展

智慧和意识、认识一样是头脑的重要功能，每一个健全的头脑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智慧。如前所述，特定头脑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具有巨大的差异性，人们的智慧事实上有一千万个等级。那么，智慧是怎样在人们头脑中产生和生长的？是不是象一些人所断言的那样，智慧的显露纯粹是偶然的，其间没有任何规律或规则？

应该承认，头脑孕育、生产智慧，其机制远比酝酿、制作认识和意识更为复杂，而且，智慧水平越高，其机制越微妙、越难掌握。在人类社会中，最高的智慧被称为天才，而天才的出现尤为特别。例如，从1901年到1970年这段时间里，每百万人口中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犹太人为0.64，法国人为0.13，德国人为0.093，意大利人为0.037，阿根廷人为0.029。从19世纪中叶到我们这个时代，犹太人中出现的天才特别引人注目，其中的马克思、达尔文、爱因斯坦均有划时代的发现并“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引起了革命”。②

智慧的萌发生长机制的确是异常复杂、令人难以掌握的，这也是一些人把天才加以神化的一个原因。但是，再复杂、再难掌握也不意味着不可知晓、不可理解，不意味着智慧的发生发展毫无规则或规律可循。

“智慧是人的本质特征”，“它是人的生命力的全面的展开。”^③智慧的萌发生长受到众多的原因的制约、影响或左右。一个特定的头脑能否生长出卓越的智慧，这决定于一系列的具体因素。这些因素至少包括下列十大项：

(1) 优越的环境、条件。其中包括优越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和思想文化背景，也包括家庭方面的优越的物质生活环境和学习深造环境。

(2) 较高的天资禀赋（这跟父母有健康的体魄杰出的智力并重视胎教有关）。

(3) 远大的即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趋势的理想、志向和与之相适应的胆略、勇气。

(4) 广博丰富的充满时代气息的经验与知识。

(5) 独立的批判态度和变革精神。

(6) 为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前进发展奋发干一番事业的强烈上进心、责任感。

(7) 诚挚的谦虚性格和一以贯之的求实作风。

(8) 长期持之以恒的勤奋努力和艰苦奋斗。

(9) 思维上和想象上的高度灵活性和敏捷性。

(10) 思想方法、研究方法或工作方法上面的异常多样性和真正适宜性。

智慧的奇妙性在于，它依赖于所有这些因素，但却不与其间的任何一项成正比例。

优越的环境条件蕴含着大量的创造基因，它们确实是大智大慧的沃土，然而，也须看到，在良好环境中思索着的头脑有的并没有闪耀出灿烂的智慧光辉，相反，处于各种逆境中的人们，有的也做出了在人间大放智慧异彩的突出贡献。环境对人的影响具有二重性，逆境既包含着压抑、扼杀创造力的气势，也潜伏着激发、催促创造智慧的种种机制。

天资禀赋是智慧的基础，但它不是决定智慧大小的绝对因素。出生后被誉为“神童”的人，长大后有的也会是庸夫俗子，而小时候并不特别聪明的人，如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等，后来成了誉满全球的科学泰斗。

达·芬奇说过：“智慧是经验之女。”有人补充一句：“经验是智慧之母。”^④沉淀于意识和潜意识之中的丰富多样的经验、知识，为头脑进行创造

活动储备了不会枯竭的心理能量，使人们的神经系统经常保持清醒、灵活的状态，一旦遇到外部强大力量的撞击，它们就可能转化为直觉、灵感或其他创造思想的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说，经验与知识是智慧的命脉。但是，经验与知识并不能自发地和无条件地转化为智慧。

“天才在于勤奋”。这是至理名言。学习上工作上的勤奋，可以造成思维和想象的专一、通达和熟练，造成创造力的升华和跃迁，从而灌溉出智慧之花。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勤奋是智慧的摇篮。但也必须承认，勤奋不会天然地演变为智慧。

独立的批判态度和变革精神亦有二重性，它既可以成为某些人聪慧、明达、奋发有为的必要条件，也可能成为某些人狂妄、胡来或蛮干的催化机制。

思维和想象呆滞、迟钝的人，其头脑中的智慧幼芽就难以成活、开花、结果，这是不言而喻的。灵活与敏捷的思维、想象，是智慧之树得以茁壮成长的养料。但是，敏捷、灵活的思维和想象扶持起来的，既可以是智慧之花，也可以是愚蠢之果。在大千世界中，思维、想象异常灵活敏捷的人尽走邪路，以至于堕入法网或患了精神病的，也不是个别现象。

应当承认，远大的理想、志向，强烈的上进心、责任感，谦虚品格、求实作风以及多样而适宜的方法这四种因素，总是从正面促进和推动智慧的发生和发展的。但也不能说，某人只要具备其中的某一因素，他就必定成为智慧非凡的伟人。

以上十方面的因素对于智慧生成的扶持或促进，既有必然的确定性的影响，又有随机的不确定的影响，每一因素的作用均依时间、地点和其他情况的变化为转移。同时，这些因素又总是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对于智慧的萌发生长，任何一种因素都不能孤立地起作用。单枪匹马的某种因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造出智慧的丰碑。在人间流芳百世的智慧之歌，始终是一系列有利因素共同作用，综合平衡的产品。

对于智慧的萌发生长，上述十种基本因素既是必要的，又不是并列的，它们不可能是均衡地起作用的，有主次轻重的不同。在它们之中，有先天的因素，有后天的因素，相对而言，后天的因素起着主导的关键的作用；有头脑外部的因素，有头脑内部的因素，相形之下，头脑内部的

因素更具基元性和根本性。头脑内部的因素在作用上也不是同等的没有区别的。在我们看来，崇高远大的志向，持之以恒的勤奋，谦逊求实的作风，灵活科学的方法，这四者是最有决定意义的。这四者缺少了任何一项，即令具有最佳的先天素质并处于最优的社会环境中的人，也不一定能在事业上显示出惊人的智慧。而具备了这四项最基本的条件的人，即令其余某项甚至某几项条件有所缺欠，他也能克服人生旅途上的种种障碍，把自身的全部生命潜能充分发挥出来，在所从事的工作中做出举世称颂的卓越贡献。概括起来说，非凡的智慧，是以这四项为核心，上述先天的和后天的，头脑外部的和头脑内部的种种因素奇妙结合、综合作用的产物。换言之，这一切因素的优化的搭配、结合、协调、互补和协同，一旦使某一头脑的机器在持续、有序的运转中发出一系列富于创造特点的直觉、灵感、想象、判断、推论等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的强烈火

花，则那个头脑便会生长出使某一事业面目一新的辉煌智慧。

智慧作为结果是由众多的原因在奇特无比的相互作用中造成的。在智慧的萌发、生长中，虽然也带着许多随机的、偶然的和非决定性的色彩，但是，从根本上说，智慧的发生是一个合乎必然规律的可以为人们认识的客观过程。

与种种成绩、成就，功劳、功勋，突破、超越，创举、奇迹相联系和智慧，是一个富有永恒魅力的、可探索知晓而不可穷尽的精神大系统。

- ①③ 俞宣孟：《追求智慧》，《探索与争鸣》，1991年第3期。
- ② 〔美〕S·阿瑞提：《创造的秘密》，辽宁人民出版社中译本，第418—419页。
- ④ 金马：《生存智慧论》，知识出版社，第379页。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哲学教研室
责任编辑：范英



句铎与乐府

李文初

句铎（音勾掉），是我国古代东南沿海地区越族人民制造的青铜乐器。其形似钲，口向上，有柄可执，用槌击之而发声。过去在江苏、浙江、湖北等地都有出土。1983年秋，广州市象岗发现一座西汉前期的大型石室古墓，墓主是南越国第二代王赵昧（音末）。墓中保存一套（八件）完好的编乐句铎。这套句铎由大至小依次排列，并刻有“第一”至“第八”的编码。最大的“第一”通高84厘米，重40公斤，最小的“第八”通高36.8厘米，重10.75公斤，八件共重191公斤。这套精美的句铎的出土，除了从一个侧面形象地展示了西汉时期岭南地区的文化风貌之外，它还为我们研究古代“乐府”官署的设置和职能，提供了极为有力的物证。

本来，《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得明明白白，早在秦王朝的“少府”中就设有“乐府”一署了，后因颜师古注《汉书·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一段话，释“乃立”为“始立”以来，“乐府”为汉武帝首创，遂成文学史和音乐史的传统定论。数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名《汉武帝之前乐府职能考》（见《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3期），指出“乐府”官署并非汉武帝首创；秦及汉初“乐府”的职能也不是像有人推测的那样，是一个专管宫廷俗乐的机构，而是少府属下职掌乐器制作的工官；汉武帝以后，虽然乐府承担了“采诗夜诵”，为郊庙祭祀和宫廷娱乐提供俗乐的任务，但它仍以制作乐器为其传统，直至南朝亦复如此。当时立论的主要根据是1977年陕西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一枚秦代编钟，上铸秦篆“乐府”二字，说明这是秦王朝“乐府”监制的产品。

无独有偶，1983年广州象岗出土的这套编乐句铎，每件都刻有相同的铭文（小篆）：“文帝九年乐府工造”。文帝即南越国第二代王赵昧的谥号，“文帝九年”相当于公元前129年，正值汉武帝元光六年。“乐府工造”的铭文，比那枚秦代编钟更明确地宣告：这套句铎是南越王的“乐府”官署监制的。从南越国不奉汉制来推断，这套乐器所标示的，当是秦朝的乐府职能。

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讨会综述

最近，广东理论界举行了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讨会。会议以江泽民同志在建党70周年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工作会议的讲话精神为指导，回顾和总结了广东10多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究的业绩和薄弱环节，着重探讨了精神文明建设与商品经济有关问题，并对精神文明建设现实迫切需要的精神文明学的研究作了初步的讨论。

一、关于精神文明建设与商品经济发展的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搞商品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把物质文明摆在首位，精神文明是次要的。不同意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以人为主体的对客体的认识与改造，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的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没有人的发展，商品经济、物质文明等都难以搞上去；搞商品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等于以物质文明为主，精神文明为次。

多数同志认为，精神文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但对商品经济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负效应”或“负作用”的看法有差别。一种观点认为，商品经济对精神文明的直接作用：①使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经济条件；②它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活力得到增强，促进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③其发展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内刺激了教育科技的进步，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和生活领域。再从间接作用看，它要通过人这一“中介”才能形成观念以指导行动，而人的观念既可能是科学的，也可能不是，由此产生的价值取向不同，有些人不择手段“捞钱”，并非商品经济本身的事，不能把这种“负效应”的帐算在商品经济上去；同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仍不发达，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一些人钻这个空子，乱搞一气，所造成的“负效应”也不是商品经济本身固有的；如果说商品经济有“负效应”，那是现存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成分，导致把“捞钱”作为绝对规律，用来规范一些人的行为的结果，而不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的问题。

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双重效应”，但积极效应为主，消极效应为次，把两者颠倒过来是不对的，不利于放手发展商品经济，也不利于精神文明建设。另一些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负效应”主要表现在对道德方面的不良影响，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商品拜物教的侵蚀，但对这方面的估计又不能过分。

有的同志认为，所谓商品经济的社会效应，指的是商品经济本身的发展对社会经济、政治、精神生产、精神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功能作用的影响，是对商品经济价值评价

问题，又是对其规律性认识问题，因而有个认识商品经济社会效应的方法论问题：①是要把握生产关系的二重结构分析法，即把生产关系视为一定的占有方式和交换方式的统一；②是要全面地把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③是要坚持道德评价与经济评价的统一；④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与商品经济原则的统一。持此观点的同志认为，现在突出的问题，是脱离经济进步，单纯地进行道德评价，以及在道德评价方面存在一些偏差和错误，其中较明显的，是把经济决定道德的关系“倒过来”，要求经济关系去适应某种道德原则，用“滞后”或“超前”的道德原则去苛求现实的商品经济，或脱离占有方式而孤立地评价交换方式，把不同性质的“负效应”混为一谈。

多数同志认为，对“负效应”的看法可以存异，但必须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一种观点认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应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因为商品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但不是“天生的奉献派”，一旦把钱权交易的原则引入政治生活，就会出现许多丑恶现象。有的同志认为，在引导人们自觉地抵制商品经济“负效应”的同时，要将商品意识的精华上升为全民意识，变为群众的科学观念。

另一种观点认为，要克服商品经济的“负效应”，必须重视精神动力的作用。它包括思想动力、文化动力、法制动力和审美动力等方面。前二种精神动力已逐步被人重视，但对法制动力的认识有待加强。商品经济中许多不轨行为和丑恶现象的出现与蔓延，与无法或法盲或执法不严有密切关系；同时，人们不重视从审美角度来规范经济活动中的行为，对美的价值产生误区，以致把假的当真的，恶的当善的，丑的当美的，这种状况应当改变。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加强思想、文化动力的同时，既要加强法制动力，又要进行审美动力方面的研究与引导。

二、关于精神文明学的研究对象、任务与体系等问题

广东对精神文明学的研究已有多部专著，与会者对此也进行了初步探讨。精神文明学能否成立？它的研究对象、任务和体系是什么？一种观点认为，这门学科不能成立。理由是：①精神文明是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范围太宽，很难讲得清楚；②它要研究学科群，实际上各学科已有自己的对象、任务和体系，没有必要搞这种综合的东西；③现实的精神文明建设还不完善，未到搞这种学科的火候。也有的认为，与其搞精神文明学，还不如搞精神哲学或搞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具体学科。

多数同志则认为，这门学科能够成立。最大的理由就是社会实践的迫切需要；对具体学科群的抽象本身就是一门学问；现实的精神文明建设不完善，正好说明理论上有必要先行一步；现有的学科研究的尝试应充分肯定；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不同的探索来加以完善。

有的同志认为，建立精神文明学，首先应对文明观作出科学的规定。科学的文明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它要表明文明的概念、本质和特征。文明概念一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个历史时代和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二是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三是指同中世纪和封建制度相比较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文明；四

是指人类自身的文明，即文明是人类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发展状态与人到达全面发展的过程。而文明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按真、善、美的方向对象化，是人的本质的积极实现过程。

有的同志认为，这门学科的逻辑起点应是“人”。“人”是精神文明学研究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它要探索人类主体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尤其要探索其形成、发展中所取得的积极精神成果，都是“人”做出来的，也是为了“人”的；从根本上说，造就“全面发展的人”是建立精神文明学的最高目标。在现阶段，我们就是要培养“四有”新人。

对于精神文明学的研究任务，有的同志认为，从总体上看有三方面：①是从文明发展宏观角度，吸取、融合、提升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丰富精神文明宝库；②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精神文明理论体系；③是它的研究必须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发展。持此观点的同志认为，精神文明学既要有理论建设的任务，也要有具体实践的各种模式，以满足不同范围、不同部门的迫切需要。

有的同志认为，从精神文明学初创阶段开始，就要注意区分一般理论研究 with 学科著作的问题，标准有两条：①必须明确回答作为学科研究的对象是什么，由此决定的研究方法是怎样的；②必须明确地展示由研究对象、方法所决定的学科体系构架与内容，并贯穿到底。提出上述标准的意义在于：①可以防止精神文明学研究的泛化；②保证学科体系的研究逐步走向科学化。

有的同志认为，目前我国对精神文明学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人类一般的精神文明学；第二层次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学；第三层次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作这样的区分有利于各层次的专门化研究，更有利于不同侧面的对象、任务和方法体系的充分发挥。

但对各层次的研究对象或同层次的研究对象存在着不同表述。有的同志认为，第一层次的精神文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主体精神的形成、发展及其同客体交互作用的科学，其主要内容，一是研究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起源与演进规律；二是研究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内在结构与外部联系的规律；三是研究人类社会精神产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精神文明自身建设的规律。另一些同志则认为，人类一般的精神文明学，一是研究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起源与演进规律的科学；二是对各种精神文明现象的概括和总结的科学；三是注意分析评价人类思想史上各种不同文明观的科学。

有的同志认为，第二层次的精神文明学是通过研究和探讨社会主义人们的精神生产和生活领域中的进步与落后、文明与愚昧、高尚与卑微、美好与丑恶等特殊矛盾，揭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界定第二层次精神文明学时，应强调初级阶段，因而，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精神文明的发展条件、特点和规律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的方式。第三种意见则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

(下转第50页)

“文”的内涵

李 顺 刚

文学观念是关于文学的性质、特征、规律、功能等根本问题的认识，是文学创作的核心问题。在中国古代，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与确立“文”的观念，有着很重要的关系。

文，古文字作𠄎、𠄎、𠄎、𠄎，看上去，是一个人文身的形象。《说文解字》的解说为：“文，错画也，象交文”。指不同线条交错的形象。故《周易·系辞》亦云：“物相杂，故曰文”。看来，文的最初含义，是错画成文，即花纹的意思，是一种修饰的形象。《周礼·考工记》又说：“画绩之事，杂五色。……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彩备谓之秀，……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谓之巧。”文的内涵由图案之美兼备了彩绘之美，出现了“五色成文而不乱”（《礼记·乐记》）的观念。《国语·郑语》中，史伯将此作了初步总结：“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文，由一种修饰的现象，概括为一种物质世界的规律，一种对世界新的认识。以这种认识作为出发点，“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周易·系辞》），在《周易》里，就形成了以“文”为视点的系统宇宙观。“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而成天下之文。”“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象传》）从而，先秦哲人在实践中建立了自己的认识世界——文。具体说来，它包括文身（人之文）。甲骨文的“文”字，一般被认为是文身的简缩。“越人断发文身”（《庄子·逍遥游》）；礼器（物之文），图腾柱，墓地，场地（村落之文），图腾木仪式（社会之文）。随着社会发展，文也在扩展，在人为服饰衣冠，在社会为朝廷、宗庙、旌旗车马，为文字语言（“言谈者，仁之文也”《礼记·儒行》；“言，身之文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为君子风范（“是故君子服其服，则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辞，遂其辞，则实以君子之德”《礼记·表记》），为艺术（乐，声之文，“声成文，谓之音”《毛诗序》；“‘成文’者，宫商上下相应”《毛传》；画，错画成文，五色成文。）人在创造社会之文的同时，也以文的眼光看待自然：日、月、星，天之文。山川植物，地之文。因为“经纬天地曰文”。（《左传·昭公二十八年》）由此可见，正如刘师培所说：“三代之时，凡可观可象，秩然有章者，咸谓之文。”（《广阮氏文言说》）显然，“文”在这里，更具备哲学的意义。确而言之，它是作为客观外在世界的感性形式而存在的，有其物必有其“文”，这是一种非常朴素的自然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一切事物的交错复综的形式均可称为“文”，但古人同

时又强调这种“文”，并不是无章可循，而是如同物质世界本身的自然状态一样，自然而然，井然有序，虽“杂”而又不“乱”，以此，才是可“观”的，真正意义上的“文”。“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老子》）“文”由物质世界的自然形式成为人类可观的对象，这种意识的产生，表明了古人不仅把“文”作为客观世界的一般感性形式来看待，而且，在观照的同时，又隐含了审美的要求，从这些情况来看，“文”的观念的产生，从最初开始，就兼具了宇宙观和审美观的双重性质。近代哲学认为，人的自由，是“美的意识”产生的前提。而人的自由就体现在能给无形式的东西以形式，一旦人赋予自然以形式的时候，人就战胜了自然。席勒曾经认为，人只要在他的最初的自然状态中仅仅是被动地接受感性世界，他就仍然是和这个世界同一的，只有当他在审美状态中把世界放在自己以外去观照的时候，他个人才与世界分开。因此，形式的概念，是艺术产生的标志，也即人类脱离动物界的一个最后标志。“野蛮人以什么现象来宣布他达到的人性呢？不论我们深入多么远，这种现象在摆脱了动物状态的奴役作用的一切民族中间总是一样的：对外观的喜悦，对装饰和游戏的爱好。”（《美育书简》）“装饰”和“游戏”在美和艺术起源上的重要意义，是大家熟知的。这里值得注意的，“外观”是席勒美学中又一个重要的概念。他认为，事物的实在是事物的作品，事物的外观才是人的作品，是人赋予自然以形式。形式概念的出现，是人的自由的开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了“文”的观念，在理解中国人审美意识起源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在某种意义上，“文”的观念比较“美”的观念，更能说明中国人的审美意识，它所包含的审美形式感和所积淀的丰富历史内容，是一个有待于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先秦哲人以“文”为观念，对世界所作的独特认识，由于它本身所具备的审美性质，自然地奠定了古代文艺学的理论基础。魏晋南北朝的刘勰后来在他的《文心雕龙·原道》里，对这种宇宙观、审美观，作了形象的描绘：“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铎，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日月山川，龙凤虎豹，皆有绚丽斑斓之文，文学正是在这个“文”的意义上，与天地万物统一起来。在同一部著作中，刘勰进一步论述到：“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情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文心雕龙·情采》）在这里，“文”已经可以概括一切文艺活动，是一切美的原理，一切存在的原理。“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文心雕龙·原道》）文是天地万物自然而然的表演，其性质和意义是多么重大啊。文艺从而不再是文人的专利，而是弥漫贯穿于一切社会实践的本性。这是对“文”的最高礼赞。

从“道之文”到“人之文”，刘勰把“文学”的发生原理，看作是人类审美的本性使然，是合自然，合规律的产物，是原于自然，本于自然。从而，在文学理论上，第一次系统

而又明确地论述了道与文的关系，显示了他对“文学”的深刻理解。在中国传统文论中，论文而主原道者不断，虽说殊异，而归根结底均与他们对“文”的特征的理解有关。汉魏以降，随着文学地位渐趋独立，人们普遍需要从理论上为“文”正名。“振叶以寻根，观澜以溯源。”（《文心雕龙·序志》）西晋陆机在《文赋》中曾云：“彼琼敷与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籥之罔穷，与天地乎并育。”已经暗示了文章扎根于天地之中，原于天地之气或自然之道。刘勰论“文”，显然与此有所呼应。但在理论上，却显示了彻底性。天地皆有“文”的观念，虽然出于《周易》，然而从“叠壁”、“焕绮”这样动人的美感角度上描绘“天文”“地文”，却是刘勰从根本上解决“文”的审美性质的尝试，进而说明“人文”的根源，揭示“文”的审美本质。在他看来，任何事物都有它内在的本质和规律，这就是“道”。“道”对于不同事物来说，有它不同的表现形式，因此，“文”也就千差万别。“道”与“文”的统一性，说明“文”并非“外饰”，而是“道”的自然外化。从这个意义来讲，人是万物之灵，是“天地之心”，自然也有其外在的“文”。这里的“人文”，即指表现为“形文”“声文”“情文”的文学艺术。文艺的出现，是人的“心”与“文”自然统一的结果，体现着天地万物“道”与“文”互相统一的基本原理。因此，“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文艺的产生，是人类出现以后自然而然的产物，是人类表现自我的本性使然，是“自然的道理。”事实上，这也就阐明了文艺的基本原理，这对于认识“文”的特征，确立和完成后世“文”的“原道论”和“载道论”的统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的观念的建立，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中国古代世界观的朴素的美学性质。因为，用“文”来概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表现形式，明显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想，这种理想境界，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与西方不同，并非宗教性的而毋宁是审美性的。既然天地万物均有文，作为天地万物之灵的“人”，是“五行之秀”是“天地之心”，自然就有人文。从而，形成了从道之文（天地万物之文）到人之文（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诸如政治、哲学、法律、道德等等），再到文学艺术，这样一个系统的 worldview，成就了古代中国独特的“文”的世界本体论。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中文系

（上接第91页）

- ④《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71页。
- ⑥ 尹康庄《源和流怎样混淆？》，1991年9月26日《广州日报》。
- ⑦ 何楚熊《意识形态的产生方式是思维艺术通过反映生活显现社会心理》，1991年第5期《学术研究》。
- ⑧ 《哲学笔记》第168页。
- ⑨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10页。
- ⑩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
- ⑪ 陆一帆《新美学原理》（修订本）第160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文可

文论与心论

李建中

心哉美矣。

《文心雕龙·序志篇》的这句赞语，其言内之意是说：“心”这个词很适宜作书名；其言外之意则暗示：“心”这个器官在艺术创造中作用重大^①——言内言外，都有些艺术心理学的意味。中国人视“心”为思维器官，故刘勰所云“文心”，虽特指“为文之用心”，若引伸开来，不妨将其视为“文艺心理”的简称或缩写。“文心”何在？她不仅跳动在诗词歌赋戏曲小说以及书画乐舞等各种体裁的古典艺术作品之中，而且绽放为文论画论书论诗话词话曲话以及小说评点等千姿百态的艺术理论之花。站在现代心理科学的高度，重新审视、评价中国古代文论，不难见出“文论”之中的“心论”内核，见出“文心”在整个批评史中的动态流变与静态建构，见出作为研究本体的中国古代文论，具有较高的艺术心理学价值，无愧“心哉美矣”的赞词。

说中国古代文论真有艺术心理学价值，并非将心理学的标签贴在古文论之上，而首先是基于对后者的实事求是的考察。

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她的诞生还是十九世纪末叶的事，但心理学思想古已有之。朱光潜称“取得杰出成就的悲剧家……在心理科学还未流行之前就已是深刻的心理学家。从埃斯库罗斯到莎士比亚和歌德，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在悲剧中积累了大量心理学的智慧。”^②——对于中国古代文论和文论家，我们可以说同样的话。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位著文专论创作心理的，是西晋陆机。《文赋》开篇便云：“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得其用心”者，“窥见作品中用心之所在，与心之如何用”也^③。用心理学的术语说，“心之如何用”，是行为的智力特质及其方式；“用心之所在”是主体对自身行为的观照与审视。前者是“做”，后者是“思考所做”。英国现代著名心理学家吉尔伯特·赖尔（1900—1976）提出智力行为的特征是：主体一边专心留意地做某事，一边思考所做之事。^④二十世纪赖尔“留意说”的心理学内涵，在三世纪陆机的“用心说”中早露端倪。据此，不是可以称陆士衡为“深刻的心理学家”？《文赋》所精析的“心游”、“应感”、“逮意”，是贯穿于创作全过程的主体心理能力与智力特质。陆机是文论家，也是作家，当他用心于文时，他也留意于自己的创作行为，他外观才士所作，也内观一己所赋，终得为文用心。陆机很谦虚地说“他日殆可谓曲尽其妙”，其实，对“文心”的各个侧面（如主体心理结构、作品心理构成、言语心理机制）和各个阶段（如构思中的想象、灵感，表现时的称物、逮意）他已经是“曲尽”艺术心理之“妙”了。一部《文赋》，不是蕴藏着“大量心理学的智慧”？

当然，中国古代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心理学，心理学思想蕴藉于哲学思想之中。哲

学中的“心论”（或曰“心的哲学”）一旦与文论相互交汇、融合，或者说，文论家一旦以他们“心的哲学”（关于人之感知、想象、情感、个性等）观念，来剖析、阐释文艺问题，中国古代文论便具有了艺术心理学价值。与陆机同时代的阮籍、嵇康，既是文论家，又是哲学（玄学）家。他们的文论，有着鲜明的玄学心理内涵。作为玄学大师，他们看重主体的“玄静”与“玄览”。“玄心”与“文心”融合，化为艺术家的才性、天赋、神情，形成一种自我意识与玄学本体（包括音乐之和）合二为一的精神境界。显然，玄学素养，使得阮、嵇的艺术理论（尤其是乐论）具有形而上的思辨特征与幽深缜密的形态，并最终使得他们在哲学——心理学的层次，把握住“文心”的真谛。后来南朝宗炳，以佛心论画，将佛学心论的“悟”与“神”，内化为画论的“迁想妙得”与“应会感神”，铸成了南朝画论的艺术心理学价值。

中国古代文论家，大都一身而兼数任。他们既是艺术家，又是理论家；既是文论家，又是哲学家。如前面提到的几位：陆机是文学家兼文论家，嵇康是文学家、音乐家兼文论家、玄学家，宗炳是画家、画论家兼佛学家。作为艺术的创造者，他们亲历创作过程的种种甘苦，素谙创作心理的丝丝奥秘，他们是艺术创造的行家里手，他们的艺术理论因而有了真切的体验与深潜幽远的心理魅力；他们又是哲学王国的主人，对物质与精神的世界作或玄或佛或儒或道的思辨，他们的文论也得以从形而下的经验形态，上升为形而上的理论形态。加之，中国古代哲学有着较重的“心论”成份，哲学家的文论便不可避免地染上浓郁的心理色彩。

心论与文论的交汇融合，主要见于两个方面。其一，文论思想多以哲学著作为载体，如刘安、扬雄、王充、葛洪、颜之推等人的文论思想，主要见于他们的哲学著作。或者，文论著作同时也是哲学著作，如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李贽的《童心说》；其二，文论范畴多是从心论中引渡而来。如“气”，先秦两汉时期，一直在哲学、心理学的层次使用。建安曹丕，以“气”论“文”，其“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文气”，专指创作主体的个性、气质。曹丕第一次给“气”这个哲学范畴，赋予鲜明的艺术心理学特征。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些主要范畴如“心物”、“形神”、“言意”、“才性”等，都大体上经历了由“心论”到“文论”的演变历程。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古代文论由三大部分构成：主体（文论家）、形态（文论著作）、符号（文论范畴）。这三大部分有一共同特征：都是脚踩在“心论”与“文论”两条船上。心论使得文论具有哲学的深邃与心理学的透彻；文论又赋予心论以艺术的灵性与美学的鲜活——正是二者的交汇融合，显示出中国古代文论的艺术心理学价值。

①参见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下册），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411页注〔4〕

②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③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75页注〔2〕

④参见〔英〕吉尔伯特·赖尔《心的概念》，刘建荣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46—149页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学院中文系

诗言性情说

王济民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诗学的基本观念是主张表现。这是我们普遍都同意的。表现什么呢？情感，这似乎也已成定论。有时候，已成定论的看法常常是可以讨论的。古代诗学文献中大量的诗言“性情”的议论迫使我们对此一定论重新进行审视。刘勰《文心雕龙·征圣》说：“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情采》说：“文质附于性情”。钟嵘《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皎然《诗式·重意诗例》说：“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这种议论在宋元以后更多。宋代吕祖谦说：“诗者，人之性情而已”。①文天祥说：“诗所以发性情之和也。性情未发，诗为无声；性情已发，诗为有声”。②元代戴元表说：“惟夫诗则一由性情以生。”③明代宋濂说：“诗乃吟咏性情之具。”④何良俊说：“诗以性情为主”。⑤屠隆说：“夫诗由性情生者也。”⑥谭元春说：“诗以道性情也。”⑦清代黄宗羲说：“盖诗之为道，从性情而出”⑧“诗以道性情。”⑨尤侗说：“诗之至也，在乎道性情。”⑩袁枚说：“诗者，人之性情也。”“诗者，心之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⑪……

“性情”指什么？性情是不是就是情感？这是首先应该加以辨析的问题。在许多论者那里，情感与性情是等同的，他们正是用上面引到的那些议论来论证古代诗学主张情感表现。事实上性情并不等同于情感。中国古代表示情感的词是“情”。性情和情感的不同首先在于意指广狭的差异。性情表示包括人的情感意志、感觉体验、思想趣味在内的一切精神方面，而情感只是人的精神心理现象之一。其次在于内涵深浅的差异。性情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文化品格，一种思想趣味，一种人生态度，而情感则带有较强的自发性、自然性。情感的突出特点是真实，性情同样如此，王若虚说：“哀乐之真，发于性情。”⑫袁枚说：“有性情而后真”。⑬由于性情深入地表现着主体对世界、对人生的感受和理解，所以性情之真较之情感之真要深刻得多。在古人那里，性情和精神的涵义相接近，诗言“性情”，按黄宗羲和袁枚的理解，也即是：“诗也者，联属天地万物而畅吾之精神者矣。”⑭“诗者，人之精神也”。⑮

中国古代还有所谓诗言“情性”的说法，这一说法在汉代就已出现，《毛诗序》说：“吟咏情性”。《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记载翼奉说：“诗之为学，情性而已。”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体性》说：“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情采》说：“辩丽本于情性。”钟嵘《诗品序》说：“至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王通《中说·关朗》

说：“诗者，民之情性也”。文天祥《南海集序》说：“盖至是动乎情性，自不能不诗。”刘凤《陈子昂文集序》说：“夫诗发于情性者也，作者孰不由斯？”……显然“情性”也不能等同于情感，它倒是与“性情”相接近的。上面提到的很多人就同时有这两种说法。可见诗言“性情”的观念在中国古代是非常普遍的。

不过，认为中国古代诗学主张情感表现并非没有根据，众所周知的根据是陆机在《文赋》中早就说过“诗缘情而绮靡”。其实这是否陆机基本的诗学主张颇可怀疑，这种片言只语或者出于作赋时对句式和音声的讲究？然而即使如此，诗言情的议论在古代仍是大量的。这种议论大略有两种情况，一是诗论言谈，一是思想主张。作为一种诗论言谈，诗言情本身就有强烈的情感色彩，缺乏诗学理论应有的谨严，难以经受冷静的理性审视。西方诗学中的言情论大多出自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英国诗人华兹华斯说：“所有的好诗，都是从强烈的感情中自然而然地溢出的。”^⑩法国诗人雨果说：“除了感情外，诗几乎就不存在了”。^⑪应该说这种言论的思想价值高于理论价值。中国古代的言情论主要是作为一种思想主张而发生影响，这里有深刻的中国文化方面的根源。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传统观念特别强调理性的主导地位，诗学上的言情论是对这种观念的突破。

由于诗言性情论所主张的不是情感的纯然表现，使之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诗言性情论者在思想倾向上不同程度地同情于儒家观念，也确有所谓性情即儒家伦理人格的说法。但从总体上看，作为古代诗学基本观念的诗言“性情”论是超越于儒家思想观念的。清代乔亿指出：“所谓性情者，不必义关于伦常，意深于美刺，但触物起兴，有真趣存焉耳。”^⑫方东树说：“诗道性情，只类说本分语，如右丞、东川、嘉川、常侍。何必深入义理，动关忠孝。”^⑬传统文化对于诗言性情论的影响主要在于它对文化人格、人生境界、精神趣味的看重和讲究。

很长时间以来，在西方浪漫主义诗学思潮的启示和支持下，我们对于古代诗言情论以莫大的重视，而对于诗言性情论则缺乏关注。一定的诗学不能脱离所处文化体系的制约，后者与传统文化的关联是更为深刻和内在的。在中国古代诗学的研究中，发现和确定其本体性命题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诗言情论和诗言性情论究竟哪一个能充当这种本体性命题？仅仅从各自的文献根据出发是不够的，一般的理论分析也不能最终解决问题。中国诗学本体论的成立，取决于它是否符合中国诗歌的实际，是否能给予中国诗学理论体系合符逻辑的说明。

① 《吕东莱文集》卷六

② 《文山先生全集·罗主簿一鹤诗序》

③ 《剡源戴先生文集·珣上人删诗序》

④ 《答章秀才论诗书》

⑤ 《四友斋丛说》

⑥ 《唐诗品汇选释断序》

（下转第30页）

再论社会心理是文艺反映现实的中介

陆一帆

我提出社会心理是文艺反映现实的中介以后，对我的观点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所有这些文章对我都很有帮助，给我许多启发。现把思考所得写出来，求教于大家。

一 对几个观点的商榷

（一）文艺反映经济基础没有中间环节吗？

意识形态不直接反映而是间接反映经济基础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已反复说明过了。但有的同志却认为马、恩只说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联系”、对经济的“反作用”是要通过中间环节，并没有说意识形态反映基础也要通过中间环节。“艺术是直接反映生活还是间接反映生活是艺术反映生活的方式问题，而不涉及艺术与生活的中介范畴。”^①我以为，所谓“中介”就是两种间接联系的事物之间的中间环节。意识与存在的联系首先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意识不过是存在的反映。所以“意识”这一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反映存在的意思。有了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才有意识与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没有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其他方面的关系就无从发生。所以，意识与存在的联系就包含着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不能因为恩格斯谈到意识与基础之间的“联系”，“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时，没有明白说出“反映”，就否定它包含意识形态间接反映基础的意思。艺术是直接还是间接反映生活，的确是艺术反映生活的方式问题。而“反映方式”与“中介”并非水火不相容。间接反映生活这种方式就涉及了中介范畴。没有中介怎么叫做间接反映？

远离基础的哲学、文艺等反映基础通过哪些中间环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除了国家机关、政治制度及法律设施等物质上层建筑之外，还有意识形态本身诸形式即政治、法律与伦理等思想体系。文艺离基础最远，它反映基础往往还通过哲学、宗教这两个中间环节。哲学常常是文艺的理论基础，宗教常常是文艺的主题和题材。

（二）社会心理能否成为文艺反映的对象？

我认为文艺通过社会心理间接反映现实。有的同志反对这个意见，理由之一是，意识之间“并没有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意识形态反映的对象只能是社会存在及由它决定的一切现实关系。”^②这个理由恐怕难站住脚。社会心理虽是意识，却客观地存在于思想家和作家的头脑之外，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就成为意识形态反映的对

象。文艺并非仅仅反映社会物质存在。“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③，托尔斯泰是“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④。文艺描写社会物质存在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写出时代精神，写广大群众的思想感情。大家常说文学是人学，正是从强调描写人民群众心理的角度出发的。提出文艺不反映社会意识的同志自己也说：“如果把社会心理看成人们的意向、愿望、情感，那么，这些当然也是艺术表现的对象，但不是直接的表现。”“社会生活是指人们的社会生存活动，包括物质生存活动和精神生存活动。艺术反映生活，就是以人们的社会生存活动为对象。”^⑤

社会心理只是意识形态（含文艺）反映的一种对象，它并非意识形态和文艺。有的同志把它们等同起来了，说：“社会意识则属于观念上层建筑，普列汉诺夫认为社会意识有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两种形式，并没有否定社会意识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属性。”^⑥其实，并非所有的社会意识都是观念上层建筑。社会心理只是人们的日常意识，要经过专家的加工创造才成为意识形态，即观念上层建筑。普氏并没有把社会心理当作观念上层建筑，他认为它只是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中间环节。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是文艺家以社会心理为原料创作出来的。如果社会心理已经是意识形态，那就不用文艺家搞创作了。

（三）意识形态产生的方式是什么？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阐明了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之间有一些中间环节，但是他们所指的中间环节，要么是物质方面的（政治制度、国家、法律设施），要么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政治、法律、伦理等思想体系），从物质存在过渡到意识形态，中间经过什么关键性的中间环节？即意识形态通过什么方式从经济基础产生出来？恩格斯晚年说他和马克思还来不及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同志不同意我这种看法，说道：“在我看来，恩格斯论及的关于意识形态产生的方式就是思维。……理论形态体系的思维是概念的思维。那么，艺术形态体系的思维又有何特征？或说艺术地掌握世界的方式是怎样的？这确是文艺学和美学应当研究解决的。”^⑦我以为恩格斯在这里说的显然不是社会科学和文艺各用什么思维方式的问题，而是整个意识形态如何从经济基础那里产生的问题。因为，第一，恩格斯说这段话是针对梅林的论文《论历史唯物主义》而发的，他在给梅林的信中明白地说：“我从末尾，即从《论历史唯物主义》这篇附录谈起。”下面谈的都是这个问题，完全不谈及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第二，关于社会科学用抽象思维及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已论述过了，不存在“被忽略”的问题。

二 社会心理是文艺反映现实的折光镜

普列汉诺夫虽然提出了社会心理是意识形态反映经济与政治的中间环节，但为什么一定要通过社会心理？其过程如何？他并未作具体的论述。我以为这个意识形态产生的过程，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及现代科学心理学的原理加以研究，是可以说清楚的。

从存在变成意识，要经过人们的反映。列宁明确指出过：“认识是人对世界的反映，……在这里的确客观上是三项：（1）自然界；（2）人的认识=人脑（就是那同一自然界的最高产物）；（3）自然界在人的认识中的反映形式。”^⑧这是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新发展。机械唯物论看不到人脑在反映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以为反映就象照镜子一样。这在心理学上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以前行为主义心理学家认为，人们反映现实是按“S（刺激）——R（反映）”这个公式进行的，有什么就反映出什么。后来心理学家们觉得这只是动物原始的生理反应关系，人的反映公式应该是：S（刺激）——O（人脑）——R（反映）。人脑（O）不仅是一个特殊的生理机能，而且还包括心理因素（要求、欲望、思想感情、价值观念及个性等），这些心理因素对认识影响很大。这在心理学上已充分论证过。因此可以说，人脑就象一个折光镜，外部世界转化为意识一定要经过它的折射。各人头脑中的心理因素不完全相同，所以反映出来的结果也就不完全相同。

人们反映现实既然要通过人的头脑的折射作用，能否说意识形态反映现实的中介是个人意识而不是社会心理？不能。这是由两个方面的条件造成的：第一，意识形态的特殊性，第二，社会心理的特殊性。

先说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意识形态不同于自然科学，它是竖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观念上层建筑，一定要反映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不反映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不能成为意识形态。当然，意识形态并不仅仅反映生产关系，它也反映生产力和其他社会关系。但是，它首先是反映生产关系以及集中表现经济的政治。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关系就是阶级关系。反映这种关系的思想体系就有非常鲜明的阶级性。不同阶级都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对立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明显对立的。“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⑨意识形态既然是生产关系的产物，具有鲜明阶级性，它就为经济基础服务，随基础的变革而变革。

有人认为不是文艺反映经济基础才决定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而是“艺术与生活的反映与被反映关系决定文艺的社会意识形态性质”。^⑩这是值得商榷的。“经济基础”与“社会生活”是不相同的。“社会生活”内容很广泛，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社会心理。“经济基础”只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部分。文艺之所以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就是由于它反映了生产关系，或首先反映了生产关系。如果不反映生产关系只反映生产力，就不具有意识形态性。自然科学之所以没有意识形态性，就因为它不反映生产关系。

现在再来看社会心理的特殊性。意识形态反映经济基础和现实，为什么不以个人意识为中介而要以社会心理为中介？这是由于社会心理的特殊性造成的。社会心理是社会群体的日常意识（包括映象、思想、感情、愿望等）。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接触各种事物，就产生映象和思想感情。在这些思想感情中有一部分是属于集体所有的，就叫社会心理，有一部分只是个人所独有，就叫个人意识或个人心理。社会上有很多集体，每个集体都有自己的心理，所以社会心理有很多种，“社会心理”只是一个总称。社会心理虽

然有多种，但主要的只有阶级、阶层、民族、时代等四种心理。

社会心理不同于个人意识：第一，社会心理是群体典型的心理，是该团体中所有成员不同程度具有的共同心理，它不包括每个人的一切心理因素。一个团体中每个人既有与其他人相同的心理，也有与其他人不同的独特心理。前者是共性，可归入社会心理中；后者是个性不能归入社会心理。个人一定会有独特的心理因素，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个性。社会心理强调团体的整体性忽略个性，强调人的社会地位及所属阶级、阶层、民族、时代的特征，撇开个人的生活经历、地位等条件。

第二，阶级思想感情是其他社会心理（阶层、民族、时代等心理）的核心，同时也是个人意识的核心，它对人所有思想感情起着支配作用。阶级思想感情是由阶级关系产生的。人们生活在一定阶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中，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便逐渐产生一定的阶级思想感情。它比较稳定地积淀在人们的头脑中，不那么容易消失。

阶级思想感情一旦形成以后，便成为人们反映现实的折光镜。不同阶级有各自反映现实的折光镜，对各种事物的认识、看法就有所不同。同一事物在对立阶级思想的折光下，会得出两种完全相反的映象和思想来。

不仅对经济关系和政治的反映是这样，就是对自然物的反映也是如此。在不同社会心理的折射之下，会出现大不相同的映象。从一些古文物可以看到，原始和平时期的动物形象与战争恐怖时期的动物形象是很不相同的。仰韶型（半坡及庙底沟）和马家窑型的彩陶中有许多动物形象，如鱼、狗、蜥蜴、鸟、青蛙，还有陶盆里的人面含鱼的形象，呈现出活泼、快活、天真可爱的气派。这些彩陶是原始和平时期的产品，上面的动物形象正是和平安定的社会造成和平欢乐的社会心理的反映。夏商周是奴隶制产生与发展的时代，战争频仍，杀俘、吃人、掠夺，手段极野蛮残忍，造成恐怖的社会心理。反映在青铜器上的人面兽和其他动物形象都十分恐怖。这些动物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这是在当时的恐怖心理折射下产生的动物映象，艺术家根据这种映象造出了青铜艺术。这种动物的恐怖形象是奴隶主阶级用以表现自己的神威，吓唬奴隶和异族的，另一方面又有驱逐邪恶保护自己的作用。

由于阶级思想是人们反映现实的折光镜，不同阶级的思想家及作家就拿着这个折光镜去观察现实，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思想资料，加工创造出意识形态来。哲学、经济学、文艺等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例，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①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首先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而产生了工人阶级思想，这是工人阶级认识和反映现存的折光镜。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这个折光镜，一方面吸收和改造了过去的思想资料——法国18世纪的唯物主义，特别是19世纪上半期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阶级学说等；另一方面深入研究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从而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光辉的思想体

系。如果不是运用工人阶级思想这一折光镜，即使历史资料再多，现实斗争再尖锐也创造不出唯物史观来。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代的所有资产阶级思想家，面对着同样的现实和历史资料却无法创立这一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创立出来后资产阶级思想家至今仍不愿也无法接受，他们仍死抱唯心史观不放。

文艺不论什么品种，不论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不论长篇还是短篇，不论是虚构的还是写真人真事的，都毫无例外地是通过社会心理这一中介去反映现实。

文艺是用具体形象反映现实的，很多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明明是描写了社会矛盾、阶级斗争，而且写得很生动细致。怎么说它们不是直接反映经济和政治呢？这里我们要注意，描写不等于直接反映，间接反映也是要描写的。《水浒传》等作品之所以是间接反映现实，因为它们所写的内容都是经过社会心理这面折光镜折射出来的。同一社会事物在不同阶级思想感情的折射下会得出不同的映象。各阶级的作家就根据本阶级的映象创作出不同的艺术形象来。例如梁山农民起义这一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进步作家施耐庵根据农民阶级的映象创作出《水浒传》，反动作家俞万春根据地主阶级的映象创作出《荡寇志》。这两部作品的人物形象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没有阶级心理这一中介作用，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了。

以清代社会为描写对象的《红楼梦》，产生于清乾隆时代，正值清朝“河清海晏”的鼎盛时期。但是清代毕竟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它的危机和腐朽已潜伏多时，不过未表面化而已。这时社会上已出现一个具有民主意识的知识阶层，曹雪芹即其中一分子。他们的思想观点与封建统治阶层的思想是大相径庭的。正是这种民主意识才能认识到清代社会的危机和衰败。《红楼梦》就是曹雪芹用民主意识这一折光镜反映现实的结果。当时统治阶层是决不会有这种认识的，因为他们的思想是封建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只能折射出另一种社会映象，其御用文人会通过幻想编造出一个繁荣美妙的社会景象来，以安慰自己和欺骗别人。“贾府中兴”、“红楼圆梦”等不就是属于这类幻想吗？

在意识产生过程中，个人意识也起一些作用，但不能象阶级意识那样能使同一事物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映象和思想体系，它至多只能使反映的结果具有一些个性而已。例如许多现代作家都写过反封建的作品，由于他们都是进步阶级作家，用的是进步阶级思想的折光镜，所以他们的作品基本点是相同的，都反对封建礼教，写出它吃人的本质，同情受害者，赞扬反抗的人。但是，这些作家各人生活道路和个性不同，有不同的个人意识，这就使他们的作品各有个性特色。在题材、人物、故事情节、创作方法、表现技巧和文学语言等各方面都有所不同。例如鲁迅与郭沫若，一个是现实主义大师，喜欢对社会黑暗作冷静的剖析，无情的批判。一个是浪漫主义巨匠，喜欢展示未来理想，对反抗者及其精神热情歌颂。但不管他们的作品有多大差异，都没有超出革命阶级意识形态范围。

由此可见：文艺反映经济基础和现实的中介不是个人意识而是阶级意识，也可以说这个中介不是“个人头脑”而是“阶级头脑”。人们说意识形态直接反映经济与政治的时候，

也并不否认要经过头脑的作用。只不过仅仅看到头脑中的个人意识，看不到里面还有阶级意识也在起作用，而且起决定性作用。如果说在意识形态产生过程中个人意识也算是一个折光镜的话，那么阶级意识就是最重要的第一级折光镜，正是它才使一些意识形式具有意识形态性质。个人意识只是第二级折光镜，它的作用是使意识形态作品个性化，使同一种意识形态形式具有多姿多采的品格。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过去大家虽已看到个人意识的折光作用，但仍然说意识形态直接反映经济基础，文艺直接反映现实。

使一种意识形态形式多样化是重要的，特别是文艺尤为重要。因为文艺是用生动形象反映现实，专供审美之用，必须具有多样化个性化，没有个性就成了公式化概念化作品，就没有欣赏价值。所以我们说社会心理是文艺反映现实的折光镜，决不否定个人意识在反映过程中的作用。

意识形态产生的全过程应该是这样：经济与政治—社会心理—个人意识—意识形态（包括文艺）。而不是：经济与政治—个人意识—意识形态（包括文艺）。没有社会心理的折光镜作用，意识形式是成不了意识形态的。我们既要看到树木又要看到森林；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个人意识的作用不见社会心理的作用。

也许有人觉得不好理解，人的头脑只有一个，什么意识都存放在这个头脑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哪里分得出哪些是阶级意识哪些是个人意识？我以为它们虽然都存放在人的头脑中，一个人同时可以拥有阶级意识与个人意识，但二者是不同的，可以分辨得出来的。第一，阶级意识是整个阶级所有成员共有的意识，个人意识只是个人独有的意识。第二，阶级意识是可以存在于个人头脑之外的，是客观的东西，个人可以获得它，也可以失掉它。个人任何时候都有个人意识，只有死人才没有。但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有他原来本阶级的意识。随着阶级意识的改变，他的阶级归属就由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他就不再是原来那个阶级的代言人了。

以上我谈的社会心理主要是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时代心理、阶层心理都未谈。它们也可以分别作为意识形态特别是文艺反映经济与社会现实的折光镜。它们是有各自的特色的，但作为一种中介的折光作用，其基本原理与阶级心理相同，所以这里就不再一一论述了。

三 社会心理是文艺直接反映的内容

社会心理的中介作用，不仅表现在它是文艺反映现实的折光镜，而且它同时又是文艺反映的内容。社会心理中的映象是创造艺术形象的直接原料。现实主义的艺术形象就是用这种原料加工创作而成的。这一点前面已论述过。社会心理中的思想感情、理想等，是所有艺术都要表现的。这里有三种情况：

（一）以再现客观事物为主的现实主义艺术，也表现了社会思想感情，如《水浒传》就表现了当时广大被压迫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在它所描写的人和物的系列形象中就包含着人民的思想感情。

（二）有些文艺种类虽然也描写了事物的形象，但这些形象都不是现实中所有的，

只是人们用想象和幻想编织成的，只存在于人们头脑中，只是人们一种理想和愿望，浪漫主义艺术就属于这类作品。理想愿望就是社会心理的一个内容。

(三)有些艺术并不描写和再现现实中的事物，只表现社会情感。如工艺美术和建筑艺术。近一年多来，北京对“文艺是不是意识形态”问题展开了十分热烈的讨论。问题的提出主要是从工艺美术和建筑艺术反映的内容开始的。有人认为这种艺术并不反映经济基础，所以文艺不是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必须反映基础。很多人都反对文艺不是意识形态的说法，但对这二种艺术是不是意识形态避而不谈，有的人为了要说明这个问题，把艺术分为观念形态的艺术和物质形态的艺术（即工艺美术和建筑艺术），后者不反映现实，所以工艺美术与建筑艺术不是意识形态。争论不休的双方竟然得出相同的结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工艺美术和建筑艺术都是意识形态。它们虽然不直接描写及再现经济基础和社会现实，但却表现了社会心理，通过社会心理间接反映与描写了现实。“建筑以自己的用途的性质、空间和立体丰富的形式、比例的表现力，揭示出社会精神、阶级的思想感情。北京故宫的根基厚大，形体厚实，表现出庄严、不可动摇的气派。四合院民房封闭性的空间，四平八稳，各房间布置井然、低矮，反映了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生活的封闭性、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安静缓慢的生活节奏等。天主教堂尖顶高耸，阴森而宽阔的内部空间，表现出神秘的宗教气氛。建筑所表现的内容主要是精神状态，它不象绘画、文学那样明确具体，较为空泛朦胧，它表现的是社会集体的思想情感，而不是具体的个人的思想感情。”^⑩

工艺美术和建筑艺术一样都是社会心理的直接反映，主要是社会情感和审美情趣的反映。这种情感和情趣是由社会经济与政治现实中产生的。例如服装设计就是一这工艺美术，开放改革以前我国的社会风气古朴、庄重、呆板、保守、单调。这在服装上就表现出来：服装品种很少，一律是蓝色或灰色，长期不变，老少均同，就显出单调、保守。这种情调和风气正是当时经济与政治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服装起了大变化：样式和颜色多姿多采，显得开放、活泼。故新时期以来的服装总体上正好表现了开放、改革、活泼、奋进、明快的时代精神。

总之，工艺美术和建筑艺术都是意识形态。它们虽然不直接反映经济和政治，但是却通过社会心理间接反映了经济和政治。间接反映也是一种反映，虽然不描写那个事物，但可以通过中介物去间接反映，如象征艺术、音乐、有些舞蹈，都是通过甲物表现乙物的。间接描写也是文学常常采用的手法。

①②⑤⑩ 何楚熊《社会心理不是文艺反映生活的中介》，1991年10月24日《广州日报》。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

改造国民性与鲁迅文艺观的独立特色

张 硕 城

茅盾先生曾在《最理想的人性》中提示我们：以鲁迅关于国民性的问题的探讨作为准确理解鲁迅的视觉，“也许比从其他方面下手，更能把握到鲁迅思想的中心。”（参阅《茅盾论鲁迅》，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77—81页）研究鲁迅的文艺观，茅盾的方法也同样适用。鲁迅弃医从文，提倡文艺运动，并为此奋斗了一生，根本的原因是要改变国民精神。作为一个启蒙主义的文学巨人，此后凡三十年，他的文艺观念的发展、演进直至走向马克思主义，以及他在文艺创作实践中所获得的惊人的成就，始终都是与这一初衷紧密联在一起的。有起伏，有嬗变，但没有偏离。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是鲁迅一生思想的重要的有机部分，也可以说是贯串了他一生文艺观和创作实践的一条重要的思想轨迹。这是一条十分独特的演进线索，在现代文学运动之中，恐怕也难找出第二人。

一

所谓文艺观，指的是对艺术的基本认识、看法或主张。文艺观是一个人的整个艺术思想中的基础或核心部分，决定着艺术家的艺术道路和艺术创作的基本倾向。如，对艺术的本质、艺术的价值功用、艺术的任务、艺术的对象、艺术的标准、艺术创作的美学倾向的选择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概括的：艺术为什么，如何为。

鲁迅的文艺观，是在他所处的独特的时代和人生的土壤中成长出来的，是与鲁迅的社会历史观、人生观联系着并大体上同步发展的。许多人已经把鲁迅文艺观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早期（留日时期至1917年），前期（1918年至1926年），后期（1927年至1936年）。我觉得，若更切合鲁迅文艺观的发展实际，可以在此基础上划分为：早期：鲁迅文艺观的发轫雏形期，又是浪漫理想期；前期：鲁迅文艺观的发展成形期与实践期，又是现实主义深化期；后期：鲁迅文艺观

的成熟期，又是马克思主义升华期。这种划分在时间上与前人未有大异，但我认为恐怕更便于从内容实质上去认识鲁迅的文艺观念的发展。

鲁迅对艺术的最早认识，是在留日时期萌发的。当时的民族危机使“救国图存”成为每个爱国知识分子思索的中心问题，也是时代的思想的主流。洋务派的“船坚炮利”，物质救国；维新派的政制改良，“立宪救国”，以及严复等为代表的启蒙救国，等等。各种形形色色的思潮、方略，风行一时。同时，伴随着外国列强的入侵而来的各种西方思想文化的涌入，一时“新学”嚣起，形成了新旧文化、中西文化之间的剧烈的摩擦与冲突。年青的鲁迅，作为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同样面临着探求、思索与选择。当他目睹前人的种种主义，特别是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的惨败之后，他的目光投向了启蒙主义，集中到了对国民性的思索。众所周知，1903年他与许寿裳在日本经常探讨关于人性和国民性的三个问题，这标志着他的思想选择的开始。1906年的幻灯片事件中，看到中国人被示众杀头，而围观的同胞却麻木不仁，促成了鲁迅弃医从文的决心。这件事当然有偶然性，必然性应是他思想上对思想启蒙主义的信仰。鲁迅后来回忆这段思想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时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显然，鲁迅是希望以文艺为武器，去启蒙国人的思想，改变国人的愚弱的精神。这就是他对艺术的最初的观念。

此后，1908年，鲁迅先后发表了他的《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可以说，这是他从文

初期；阐述他的文艺观的代表作，反映着他早期的文艺观的雏形。

《文化偏至论》首先是鲁迅早期社会观的代表作，但同时也是他文艺观的一个理论上的基础。它对鲁迅文艺观的形成有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这篇文章中，鲁迅批判了种种重物质、非精神的偏向，提出了“掇物质而张明灵，重个人而排众数”的思想纲领，以及“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的救国主张，高张起“启人智而开发其性灵”的思想启蒙旗帜。这种思想，对鲁迅早期的文艺观，无疑是从哲学思想的根源上奠定了一块基石。他顺着非物质、重精神的思路，把文艺与“立人”、“立国”联系起来，形成了他的立国先立人，立人重精神，而改善人的精神的最好的武器是文艺的观念模式。通过这个观念模式对文艺的社会作用、文艺的任务等文艺基本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同时，也在这种回答之中打上了爱国主义与个性主义的鲜明的印记。

《摩罗诗力说》则是鲁迅介绍评述文艺思潮和文艺流派的一篇文章，文章中，他介绍了近代西方的一些文艺流派，着重介绍了西方摩罗诗派的艺术特征，并在介绍之中提出自己对新文化、新文艺的见解。他把摩罗诗人的思想艺术特征归纳为：“其为品性言行思维，虽以种族有殊，外缘有别，因现种种状，而实统于一宗：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鲁迅十分赞赏摩罗诗人那种“不为顺世和乐之音”，“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敢于发出“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的超群拒俗，反抗传统，昂扬奋进的个性主义的主观战斗精神，他热忱地呼唤着中国出现这样的“精神界战士”，向传统和世俗发起进击，以振邦人，以大其国。这种精神界战士所具有的精神，也就是他当时所见到的“理想的人性”。这篇文章与《文化偏至论》是姐妹篇，是鲁迅的文艺启蒙主义的具体化。文章中的爱国主义、个性主义鼓舞下的浓烈的浪漫主义倾向，成为鲁迅早期文艺观念的一个鲜艳的色调。

反映鲁迅早期文艺思想的文字，还包括辛亥革命前后他的一些译文和文章。其中较重要的还有1913年在北京写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这是一篇谈美术教育的文章，但其中对美术的一系列美学特点、规律的探讨，也就是他对文艺的美学认识。

把上述几篇文章串起来，早年鲁迅的文艺观的基本轮廓便显现出来了：在文艺的价值和作用问题上，鲁迅是在爱国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思想哲学基础上，从启蒙主义的角度，将文艺视为改造国民精神，达到理想“人国”的有力武器；在文艺的任务问题上，他认为文艺要使国人“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月界旅行·辨言》，《鲁迅译文集》第1卷）要“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要达到“起国人之新生”的目的；在文艺发展观上，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虽“自具特异之光采”，但“孤立自是，不遇校仇”，要建设一种新文艺，“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处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文化偏至论》）而这种“新宗”的建立，最为实际的是“别求新声于异邦”，（《摩罗诗力说》）在文艺的标准和审美倾向上，他崇尚“抗争拒俗”的叛逆之声和摩罗之力，欣赏刚健自强、“雄杰伟美”的阳刚之美，追求“抱诚守真”的艺术境界，反对古典主义的“和美”原则，对西方近代的浪漫主义文艺精神和美学倾向有明显的偏爱；在文艺的内在规律的认识上，他看到了文艺最基本的审美特征，认识到必须通过“兴感怡悦”而达到“攫人心”的效果，他说：“文学和学术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2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35年版）

本世纪初，正是中国文学由古典向新文学艰难蜕变的时期。鲁迅的文艺观，作为这个蜕变中的一个裂响，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在辛亥革命前夜的中国近代启蒙主义文艺思潮之中，也是一簇生意盎然的新枝。他的那些用以构筑起自己早期文艺观念的材料，广取于古今中外，以其丰富多姿和独到见地而令人瞩目。然而，鲁迅的上述文艺观，毕竟是发轫之初的零星的雏稚的思想。严格地说，它并未成为一种固定的形态，也未来得及对自己吸取的各种思想成分作出更深入的了解和判断，难免显现出观念上的庞杂性、片面性和矛盾性。鲁迅历来就是一个“拿来主义”者。鲁迅早年的文艺观念，明显地拖着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千丝万缕的血缘纽带；也杂七杂八地印着尼采和近代浪漫诗人的精神印记。而这些众多的货色能为他所“拿来”，并揉合

进一个他自己的框架之中，当依赖于他思想上的启蒙主义。他是从改造国民精神的需要去选择，去吸取那各色各类的货色中于中国的现实有用的养分，并以“立人”的主旨，将它们拴在了一条逻辑绳索上，来服务于启蒙救国。因此，他的文艺观既是中国时代发展的那个特定阶段的回音，也是他本人思想发展初期对中国国情认识程度的反映。对中国这间铁屋子中沉睡的人们，确实需要来一个唤醒的猛喝，确实需要对国民的精神状态进行根本的改造，而这恰好又是被当时的其他革命者们所忽视的。鲁迅提出来了，这对于爱国启蒙的思想文化革命，无疑又是一个积极的推促。

同他那时的社会历史观一样，他早期的上述文艺观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这主要表现在他否定物质的作用，只强调主观精神的作用，并把精神作用夸大到决定性的程度；在文艺上，则把文艺的力量悬置于一切社会力量之上，视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动力；他的改革国民性的文艺启蒙主义观念模式，实质上是一种从精神到精神，从意识到意识的绝对循环，方法论上也是形而上学的。

鲁迅早期文艺观总体上的主观唯心主义，并不妨碍他在文艺的一些规律的认识上，时时透露出的朴素唯物主义的火花。例如，他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里，提出人的“受”、“作”二性，提出艺术美的三要素：“天物”、“思想”和“美化”的统一，实际上已开始触摸到了文艺与自然、文艺与人的情感的关系，以及自然物质、主观理想和艺术美的统一问题。

前面说过，对文艺社会作用的片面夸大，是鲁迅早期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文艺观的主要特征之一。但是，恰恰也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似乎也有过一次想加以纠偏补救的尝试。他就当时流行的所谓“主美”与“主用”之争，提出了“不用之用”（《坟·摩罗诗力说》）的命题。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思辨命题，对于认识鲁迅早期文艺观的特色，或许颇有启发。深受到梁启超“小说救国”论影响的鲁迅，主张文艺启蒙救国，显然是一个“主用”派、“社会功利论”者；但鲁迅又是“非物质”论者，鄙薄“实利”，这又使他在文艺上对王国维的文艺“非功利”主义即“主美”思想产生某种认同。这样，他在对文艺社会作用的认识上，就呈现出一条似乎难以弥合的思想裂痕：“用”与“不用”，“功利”与“非功利”二元背反的矛盾。如何

协调或“统一”这种矛盾，便成为他早年文艺思想中的一个难题。

鲁迅毕竟是个善于思考的人。他为解决这个难题提出的“不用之用”的答案，完全是一个鲁迅式的答案。所谓“不用”，鲁迅的解释是文艺不能讲求“实利”。他说：“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入之兴感愉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坟·摩罗诗力说》）文艺的作用主要是“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用，乃不期之成果。沾沾于用，甚嫌执持。”（《拟播布美术意见书》）所谓“用”，鲁迅认为：文章之于人生，其为用决不次于衣食，宫室，宗教，道德，“所以者何？以能涵养吾人之神思耳。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坟·摩罗诗力说》）也就是说，文艺是通过自己特殊的审美途径发挥其作用的。在“不用”与“用”之间，鲁迅搭起了一条沟通联结的桥梁；只有“不用”即不沾沾于“实利”，才能达到文艺的审美之“用”，进而达到怡人性情，振人内曜，再而达到超脱“实利”的立人兴邦之大用。鲁迅通过“不用之用”，把文艺的超直接功利性与文艺的巨大的社会作用统一起来了。在这个命题的解决的过程中，鲁迅似乎赢得了某种“胜利”；他以对文艺审美特性的正确认识，一定程度上补救了自己夸大文艺社会功用的偏颇；又以对文艺社会功用的足够肯定，冲淡了王国维超功利思想对他的影响。然而，这终究是一种虚幻的“胜利”。鲁迅解决这一命题的认识基础，仅仅是对文艺作用的特殊性的直观把握，而不是对文艺本质的认识。事实上，鲁迅对“文艺救国”与“文艺超功利”都未进行深入实质性的批判，对立的双方仍然都被他视为一种正确的东西。于是，他在二者之间所搭起的联结之桥仅仅在逻辑意义上闪现了一下辩证思维的火花。一但回到命题双方的任何一方本身，便又仍旧回复到对立的偏执之中。鲁迅似乎摸到了辩证法的门口，但他终究未能彻底冲出形而上学的二元论的框框。

五四新文学运动及其后的七、八年，是鲁迅文艺思想的发展、成型阶段。此前的辛亥革命之后的七、八年，鲁迅曾经一度沉默。1918年，他却突然以他的《狂人日记》一炮打响，接着“一发而不可收”，进入了他的文艺创作思想发展的空

前的黄金期。一个革命者的暂时的沉默，往往就是他的思想反思和孕育期。鲁迅在五四前后对辛亥革命的一系列独到的批判，恐怕也就是这一度沉默的思想结晶。

五四前后，正是现代新文化运动高涨的时期。中国近代史的终结与现代史的开端，旧民主主义的革命的失败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这种历史转换阶段的思想文化运动高潮，把鲁迅推上了文化思想革命的历史舞台，并充当了新文学运动的主将，创下了旷世不朽的新文学实绩。

鲁迅在新文学中的巨人的地位确立是在五四时期，而不是在后来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只有这样实事求是地来认识鲁迅，我们才能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对五四时期鲁迅文艺思想和文艺创作所达到的高度、深度作出正确的评估。

五四新文学运动期间的鲁迅，没有发表过专门的或完整的文艺理论观点的文章。他对文艺的认识，一是散见于他的各种序、跋和杂感之中，二是更主要地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作品之中。五四时期鲁迅的最辉煌的业绩，是他的小说创作，即以《呐喊》和《彷徨》为代表的国民性批判系列。因此，探讨这一时期鲁迅的文艺观的发展，必须紧密地结合他的这些创作进行。

《呐喊》与《彷徨》，概而言之，鲁迅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他还说，这些小说的题材“多采自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通过他的小说，几乎把“老中国”的社会的一切精神病态，都一一再现并揭示出来了，并作了淋漓尽致的批判。这里头，尤以阿Q及阿Q精神最为典型。阿Q就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茅盾《致××信》，《茅盾论鲁迅》第2页）

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系列小说及其它一些杂文所反映出来的文艺观的发展、变化，是深切而且全面的。这方面的论述，前人已有很多。我认为，从早年留日时期到五四时期，鲁迅文艺思想的变化是一种十分明显但又独特的现象，是他从近代积极浪漫主义的偏爱，转向了深刻的现实主义。这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现代中国新文学史上，象这样的文学道路和文学思想、风格的大转变者，并不是多见的。从这种大转弯

中，我们是否可以挖掘到鲁迅的文艺观发展过程中的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否能找到鲁迅文艺观的深层的一些实质性的思想基因？

一般地说，鲁迅在新文学运动中选择了一条现实主义的道路，是当时“科学”、“民主”的时代思潮的产物；是他立足于现实、执著地“为人生”的文学宗旨的必由之路；或者是俄国近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影响的结果。都不错的。然而，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转变的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契机，是一场社会的革命——一次轰轰烈烈的但又令人失望的革命，这就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那悲剧性的历史命运，不仅成为鲁迅文艺思想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时代背景，而且成为了这种转变的深刻的内在动因。

辛亥革命前，是救国思潮和革命鼓吹迭起的年代。鲁迅后来说道：“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警句。”（《集外集·序言》）这种时代风气，是浪漫主义产生的天然沃土，摩罗精神就是时代精神，在这种时代氛围的包围下，青年的热血沸腾的鲁迅，推崇、追逐着浪漫主义是完全顺理成章的。

然而，革命发动前的激昂很快就被革命发动后的严酷所冷却。辛亥革命悲剧性的结局，使鲁迅清醒过来。“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了他们的奴隶了。”（《华盖集·忽然想到（三）》）“招牌虽换，货色依旧”。（《朝花夕拾·范爱农》）鲁迅从现实中清楚地看到了这场“只剪掉了一根辫子”的革命的不彻底性。原先对这场革命倾注了极大热忱和希望的他，思想确实被大大地震撼了。他说：“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呐喊·自序》）

鲁迅是从他思想启蒙者的眼光去总结辛亥革命的失败的教训的。他认为：“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两地书·八》）鲁迅的这一发现，平心而论，是来自现实的切身体验，因此是准确的。辛亥革命的失败，如果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看，当然有十分深广的阶级历史根源，但就其中之一而言，它不是一场真正的人

民革命运动，它脱离了民众，未能通过充分的发动、启蒙而唤起民众参与。所以，皇帝赶走了，烈士的血洒了，换来的是一剂人血馒头的“药”，象“未庄”、“鲁镇”这样的广大的城乡，一切照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根子，本质上并未受到触动。在这种经验总结的基础上，鲁迅决然地否定了自己早年对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幻想，但是对原先的思想启蒙和改造国民性，则更加坚定了。他说，“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八》）怎样才能真正启发民众呢？他认识到，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感情的时候，还须启发明白的理性，——这声音，自然断乎不及大叫杀敌的大而闷，但却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集外集拾遗补编·随感录（一九一八）》）“不能真心领得痛苦，也便难有新生的希望。”（同上）鲁迅正是在辛亥革命后的七、八年的沉默中实现了这种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大转变的。他开始更注重对中国社会底层现实的研究探索，把早年灼热照人的爱国主义包裹压缩在冰一般的冷峻之中，“沉入国民中”，进行着他的改造国民性的新一轮的更深刻的文学启蒙实践。

这种转变，决不是单纯的审美倾向上的转变。它是鲁迅思想和文学观上的一次重大的变革，它对于鲁迅的文艺思想、文艺道路和创作实践的深远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转变，才催生出一个新文学的巨人。

五四时期鲁迅现实主义文艺观的确立的根本标志，是他明确竖起文艺“为人生”的旗帜。这是鲁迅文艺观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为人生”的口号在中国首先是由“文学研究会”提出来的，而提出这一口号的文学研究会《宣言》（周作人起草），事先是经过鲁迅看过并赞同的。“为人生”作为中国现代新文学现实主义的基本宗旨和原则首先是一面文艺战斗的思想旗帜，代表着一种新文艺观念。“为人生”的文艺宗旨的确立，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文学观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首先，从早年的“立人”到“为人生”，反映了鲁迅对文艺“为什么”和“如何为”有了一个有实际内涵的回答。“为人生”，就是要用文艺去反映“人生”，进而“改良人生”，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超越。在“为人生”的宗旨下，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的文学工作，

有了一个“主见”，这就是从理想“人国”的憧憬转向“直面惨淡人生”，把目光从几个先知先觉的精神偶像身上移向广大的现实社会中不幸的人们，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命运，去揭示他们的病态，挖出其中的病根，去设法疗救他们。

其次，从“立人”到“为人生”，使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文艺思想从空洞的观念和呼喊，进入了一个实际的行动阶段，这就是通过小说杂感的文艺创作，向着造就出愚弱国民的传统文化，进行彻底的全面的攻击和不妥协的批判。创下了伟大的战斗“实绩”。五四前后，他对传统的专制主义和礼教的“吃人”本质的揭露，对阿Q式的精神畸形和各个层面上的人们的咀脸和灵魂的高度形象化和尖锐无情的鞭笞，对传统文化的激烈的甚至是“过激”的攻击，都是这种“为人生”、“改造人生”的思想的直接的产物。

再次，从“立人”到“为人生”，标志着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文艺思想中，人道主义思想的深化。早年赖以“立人”的精神支柱是个性主义和进化论，而“为人生”要求的则不仅仅是个性主义，而且是广泛的人生主义即面对广大民众的人道主义。1925年鲁迅曾对许广平说过五四时期自己的“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两地书·二四》）按他的看法，这是一种思想的矛盾。一方面，现实主义的体验，使他感到沉寂的中国还需要“个人的自大”，以抗拒“合群的自大”，个性主义在现阶段似乎还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辛亥革命的失败，以及五四退潮之后的现实，又使他感到个性主义的力弱，必须寻求一种更有力的思想“投枪”。然而，在当时，鲁迅是找不到的。他把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这两个本源一致的人本主义的思想侧面，加以分开，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解，即个性主义偏重于个体的解放，而人道主义则偏重于群体的解放。延伸到文艺，则文艺究竟主要是宣泄个性，表现主观的工具，还是再现人生，疗救人生的工具。这种矛盾消长，与早年一样，是一种二元论的困惑。然而，就人道主义的群体解放问题的提出来看，毕竟比早年的极端的个性主义进了一大步。它为鲁迅后来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进一步认识人民大众的力量，由“为人生”到“为大众”的文艺观发展提供了一个台阶。这种矛盾的消长，也为鲁迅创作思想上由单纯的思想文明的批判进而转向社会制度批判提供了一个台阶。1923年的《娜拉走后

怎样》以及1925年的小说《伤逝》中，他开始指出了个性解放的局限，提出“经济权”解放，社会解放的命题，正是这种矛盾消长的积极结果。当然，五四时期，还只是一个“矛盾消长”的时期，个性解放的思想，作为他的改造国民性的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并未有完全被否定。而就中国的现实的历史进程而言，鲁迅看得很清楚，也仍然不会放弃这个尚未完成的历史任务，这正是他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的独特之处。

第四，从“立人”到“为人生”，使鲁迅在创作中突破主观唯心主义的局限，从艺术实践上贴近了社会生活这个源泉，开拓出一条从生活出发的艺术典型化的途径，纯熟地把握了艺术创作的规律和技巧，创作了一个个不朽的艺术典型和艺术画卷，写下了民族文学史上灿烂的一页。结合着创作的实践，在艺术真实性问题上，在艺术典型化问题上，在欣赏与批评的价值标准上，在写实与理想的关系上，在艺术风格的独创性上，鲁迅都从理论观点或创作实践作出许多精辟的回答。至今仍是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中的瑰宝。

五四前后，鲁迅文艺观的深刻的变化和发展，是与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深化同步进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政治意义是伟大的，但五四运动就其革命形态而言，是一场思想革命，也是一次思想启蒙。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恰好在历史的轨迹上与这种思想革命相契合，使他的改造国民性的文艺思想有了新的时代的特征和意义，在新文化运动中放射出独特的光芒。

三

“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的注入，固然使鲁迅前期的启蒙主义文艺观增添了唯物主义的成份，但就其思想体系范畴而言，它是民主主义思想革命的产物，在反映人生上的真实与深入的同时，并不能掩饰其改善人生方面的力弱；就其哲学认识的本质而言，也未能挣脱历史唯心论的旧巢，批判的笔峰，在文明批判的路口徘徊不前。这种先天的不足，很快就伴随着五四运动的退潮，使鲁迅陷入了战斗生活上的第二次困惑和寂寞。但是，正如《野草》中的“过客”和“战士”，鲁迅的坚韧和执着，支撑着他不息前行，上下求索，终于又一次迎来新的转机：1925年起，目睹工农革命的兴起，加上陆续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书籍，鲁迅思想上开始孕育着一个新的飞跃。

1927年，鲁迅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共

产主义战士，完成了世界观的后期的飞跃。在他的后期，由于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的文艺观也发生了彻底的质变，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升华。

鲁迅后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艺观是全面的，前人已研究很多，本文不必一一再论。后期鲁迅的文艺观，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观基础上构筑的文艺思想体系，它在总体上和实质上，已不是鲁迅早、前期的文艺启蒙主义。然而，它毕竟是从原来的旧母体中脱胎出来的，它与旧母体之间总有一些基因的遗传，总带着一些母体的胎记，不可能是完全绝缘的异体。正如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为的，在鲁迅的思想的飞跃过程中，进化论是“轰毁”了，但改造国民性思想却并没被轰掉。它保留了下来，还成了鲁迅后期思想的一个特色。同样，在他后期的文艺观上，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也被保留下来。鲁迅直到一九三三年还明确宣布：“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如果说，鲁迅后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有什么自己的特色，我看这就是一个。问题是，在今天来探讨鲁迅后期的这个特色，已不能停留在“有没有”，而应回答：鲁迅后期是如何将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放进一个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框架之中；如何对这个民主主义的思想进行否定、改造、新生；如何使它与马克思主义融合一体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仍具有活力的武器？

鲁迅后期文艺观中保留启蒙主义，有一个根本的前提，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对其进行了否定、改造，使之蜕变为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主义。我们前边说过，鲁迅前期改造国民性思想与现实主义的结合，曾是一次更新和发展。鲁迅的后期，改造国民性思想所面临的则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改造。原来的改造国民性思想的认识论基础中，进化论已被轰毁；另一个思想基础则是个性主义。鲁迅后期对于个性主义，进行了理论的总清算。首先，鲁迅以阶级论的观点，批判了抽象的“个性”或“人性”，认定了“个性”无不带着阶级性；其次，所谓人的“个性”总是由他所处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并随之变化而变化的，不存在什么一成不变的“个性”；再次，“个性”

的解放首先有赖于客观社会条件（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解放，有赖它所依附的那个阶级的整体的解放。

鲁迅后期对文艺启蒙主义的否定与改造，主要从几个方面进行。一是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上，否定了启蒙主义的夸大精神、思想和文艺的社会作用的唯心主义，摆正思想、文艺革命与社会政治革命的关系，鲁迅说：“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两地书·十》）“则此后的第一要图，还在充足实力，此外各种言动，只能稍作辅佐而已。”（《两地书·十二》）1927年，他更是明确宣布：“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只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倒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惟有革命武装斗争，“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从以文艺为改造国民性的“第一要著”，到这时把充足实力作为“第一要图”，最终，他将文艺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一翼”的地位，既表明了他对思想文化斗争的重视，但又认为文艺是从属于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是从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者地位上，纠正了一般启蒙主义在群众观上的错位。随着工农革命的兴起，鲁迅开始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开始对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进行重新认识，他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世界却正是由愚人造成”，（《写在〈坟〉后面》）“农工大众日日显的着重”。（《三闲集·“醉眼”中的朦胧》）在文艺观上，鲁迅也从早期的“立人”到前期的“为人生”进而飞跃到“民众文学”的无产阶级文艺观。1928年，鲁迅开始明确提出“民众文学”的口号（见《三闲集·文艺与革命》）他认为，文学不仅要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思想、愿望，而且文学本身就是现在也应该由民众自己来创造，建立起“第四阶级文学”。后来，鲁迅又说，无产阶级文学“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二心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既然文学属于人民大众，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为此，就要提倡文学的大众化，“为了大众，力求易懂”，就要让作家的心与群众息息相通，他赞扬高尔基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且介亭杂文未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从早年的“排众教”到前期对人民大众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到后期的“为了大众”，这样明显的质变，反映了鲁迅人

民大众文艺观的发展演进，也揭示出一个人道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观念感情和立场的根本转变。

三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对“国民性”和文艺进行阶级分析，因此，对所谓国民性的落后的攻打由面对大众而转向少数专制的统治者和造成国民愚弱的社会历史根源。后期鲁迅学会了运用阶级观点看待“人性”、“国民性”，看待文学的阶级性。对所谓“国魂”他曾进行过具体分析，分为“官魂”、“匪魂”、“民魂”，他说“惟民魂是值得宝贵的”。（《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在文艺创作上他开始自觉运用阶级观点去观察剖析社会，他形象地说过：“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在坚持阶级性的同时，鲁迅又以科学辩证的方法，分析“人性”和“个性”，认为在坚持阶级解放和阶级性的前提下，应同时尊重个性解放，充分重视人的个性的发展。他后期所一直未抛弃的改造“国民性”的工作，很大程度上他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看到现代中国仍须进行思想启蒙的必要性与长期性。

必须指出的是，鲁迅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通过自身独特的道路和方式实现的。第一，从他的每次思想发展或飞跃前，总是伴随着一度较长时间的“沉默”与“苦闷”可以看出，他不是那种仅仅满足于从书本上接受新思想的人，而是特别注重于从自身对人生、社会、历史的认真观察、思考、体验中去认识、去接近真理。他后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与信仰，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他的长期的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更高层次上，与这种全新的社会思想理论的一种“际遇”和“融合”，是完全根植于他所处的中国革命的现实历史进程之中的一种思想升华。鲁迅在理解马克思主义时，总是把自己的切身经验融汇进去，具有深刻的现实性和独创性，甚至，连语言表述上也完全是自己的“这一个”，与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无缘。第二，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基本理论观点的了解，又多是通过文艺理论书籍的途径获得的，作为一个文艺家，他也多是在谈文艺和文艺思想斗争之中反映出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这也构成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在形态上没有哲学家的刻意

论证,更没有着意去构造理论体系的大厦,具有一种更平白,更贴近斗争实际的直接性。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独特的掌握方式,使他总是从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具体进程之中,去提出规律性的观点。在文艺观念上,他在介绍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理论时,也是如此,一点也没有脱离中国实际的照搬。鲁迅的这种理论态度,使他能较准确地洞察了解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几次思想启蒙的中断、夭折,所遗留下来的思想文化革命任务的长期性与艰巨性,使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双重使命有直接的体会。这就使他一面着力于对早先的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文艺观的消极部分的否定、改造,另一方面,却始终认定改革国民性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同步性和一致性,以及思想启蒙的现实必要性和不可逾越性。这正如他一九三〇年所说的:“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指列宁——笔者),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二心集·习惯与改革》)或许,当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改革、开放而面临着又一次

民族思想文化上的困惑时,回顾鲁迅的思想,是否会更深刻地体会到它的历史内涵?八十年代的文学中,“陈焕生”现象所一度引起轰动以及此后几年的“文化热”,是否也回应了半世纪前鲁迅的呼唤?

综上所述,只是勾勒出了鲁迅文艺观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某些必然的联系轨迹。鲁迅文艺观中所贯串的改造国民性思想的首尾的一贯性,是他的文艺观的一个特色。然而,在这一特色的背后,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本质性的特征,那就是鲁迅文艺观的发展进程,与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进程的紧密契合。尤其是在后期,他坚定地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实际,使自己的启蒙主义思想与新民主主义的特殊的历史使命达成了高度的时代默契,成为推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文艺运动的有力的思想武器。鲁迅的文艺观正是在与他所处的时代的中国革命的本质要求的高度融合之中,形成了它的本质性的特色,放出了时代的与历史的异彩。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联
责任编辑:陶原珂

(上接第113页)

- ②⑥ [日]《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卷,第478—479页。头山离沪时间,该书称是3月中旬,但据宗方小太郎《辛壬日记》载:3月27日晚,宗方、井手、白岩等在上海新六三亭为头山举行送行宴,头山离沪时间应是3月底,而前者记述有误。
- ②⑧③③⑦ 《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卷,第466、459—460、466页。
- ②⑨④① [日]《大阪每日新闻》1911年11月23日。
- ④① 《犬养毅给陆实信》(1898年2月3日),台湾《大陆》杂志52卷3期。
- ④② [日]古岛一雄:《辛亥革命与我》;陈固亭:《国父与亚洲》第23页。
- ④④ 《太炎最近文录》第25—26页。
- ④⑤④⑥ 上海《民立报》1912年3月2日、2月4日。
- ④⑦ 《巨人头山满的话》第429页。
- ④⑧ [日]《阮谷芳郎日记》。

(本文曾得日本伊原泽周教授、马燕女士、马宁先生惠助,谨谢)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林有能

探讨汉语的民族文化精神

——第二届全国语言与文化学术研讨会述评

苏新春

由中国语言文化学会、广州师范学院、广州市语言文学学会主办的第二届全国语言与文化学术研讨会于1991年12月10日至12月13日在广州国际科技会议中心举行。来自日本、香港和全国各地高校、科研及出版单位的一百余位学者到会，会议收到论文95篇。目前国内研究文化语言学比较有影响的学派都有代表出席，并充分交流了看法。王德春教授介绍了他正在从事的国俗语义学研究，许威汉教授在大会宣读了论文《中国文化语言学的过去和现在》，徐德江研究员报告了不久前的汉城国际汉字研讨会的会况。会议论文在语言方面涉及语言理论、语法、词汇、文字、方言、俗熟语、修辞学、音韵学、词源学、广告语言学、双语教学，以汉语为主，也涉及英语日语；在文化方面，论及民族思维心理、认知心理、信仰习俗、饮食文化、价值观念、民族迁移、文化起源、少数民族文化，呈现了文化语言学的广阔理论前景和运用价值。

本次会议的主题有两个：“文化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语言结构的文化内涵”。这也正是当前方兴未艾的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的热点问题。下面主要就这两方面进行述评。

一、文化语言学的理论体系建构

在1987年南昌的“语言学发展方向研讨会”上，大家对初始介入的“文化语言学”还迷惘于名词术语的理解。到1989年大连的“首届全国语言与文化学术研讨会”，已经涌现了一批论文，但对如何完整地认识“语言的人文性”，如何系统地建构这门学科，人们还难以发表什么有价值的意见，甚至还不可能明确提出这个问题。而这次会议上，这些都成为最引人注目的话题，并对由此而可能涉及的许多理论问题都进行了深入探讨。

1. 关于语言的人文性

语言的人文性是指一种语言所蕴含的它所属于的那种文化的精神和内容。在研究的早期，主张者们认为只有汉语才是富于人文性的语言。现在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不同的语言都有自己的文化意义，都有人文性，只是人文意义的内容不同罢了。汉语基于汉民族思维的辩证性、天人合一的哲学观所表示出来的重神摄、重意会的特点是汉语的人文

性，西方语言基于西方人思维的精密性、重客观的自然性所表现出来的形式规则外化的特点也是人文性。由于这种认识的进步，申小龙表示，可以考虑把“汉语的人文性”改称为“汉语的主体性”，或“汉语的主体意识”。崔奉春则在《论汉语的主体意识》一文就汉语词汇中不同类别词语的发达程度、交际表达中意念活动的趋向论述了汉语主体意识明显存在的事实。

如何认识语言的文化意义，也是这次相当引人注目的话题。韩宝育在《语言的文化内涵》中从六个方面较全面地阐述了语言的文化意义：语言整体的文化价值、语言符号中能指的文化价值、语言符号中所指的文化价值、语言样式的文化价值、语言交际方式的文化价值、语言把握世界的不同方式。陈月明则认为语言文化研究应有四个层面：符号层面、符号组合层面、功能层面、结构层面，在这四个层面中有层层递进的关系。

而对语言中的人文性在决定语言的基本面貌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则存在相当大的分歧。申小龙认为，在语言所有的多种多样的属性中，如物理的、生理的、符号物质性的、文化的等，最重要的是语言的人文属性。语言是一种文化最为本质的因子，是最稳定、并能遗传的文化内核。语言是这个民族认识世界的工具、手段，也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 and 框架，因此对语言进行人文性研究应成为最贴近语言本质的研究。正是在这个基本理论要点上形成了文化语言学中文化认同派和文化参照派的一个理论分界点。后者认为语言的人文性只是语言诸多属性中的一个，全面研究语言的各种属性，或分别研究某一种属性，都有它们各自的存在价值。如邵敬敏《关于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反思》一文就认为：“语言具有文化性，又具有自然性，人文性又具有多个侧面”。在这一根本点上的分歧，使得在以下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上都产生了各自不同的理解。

2. 文化语言学的学科性质和地位

主张人文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的申小龙、徐德江、姚亚平、赵虹等认为，只有运用人文的方法才能真正探索到语言的奥秘，文化语言学就是关于语言本身的本体科学，认为中国现代语言学所进行的研究是照搬西方，不得要领，对汉语的描写缺乏解释力。而主张人文性是语言属性之一的邵敬敏、黄文国、韩宝育等先生认为，研究语言的形式结构和人文属性都有它们自己的存在价值，可互相补充、印证，不能提只有文化语言学才是语言学。戴昭铭在《文化语言学的对象、任务和性质》中指出“文化语言学是交叉学科”，“是语言学的分支学科”。

对汉语进行人文研究的学说由被视为邪说异端到在语言学的殿堂占有一席之地，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学术进步。而它最终能否给汉语研究带来整体的变革，给汉民族的整个人文科学带来更多的借鉴成果，还有待于研究的继续深入。在会上，山西思维科学所刘景钊带来周围学科的一个重要信息：申小龙的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给思维科学、认知科学、逻辑学以极大的启发，他们认为申氏理论从语言的角度提出并解释了许多他们正希望解答而难以解答的问题。

3. 文化语言学兴起的历史原因

如何看待目前这场如火如荼的文化语言学研究热?邵敬敏指出“文化语言学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发展的一种历史必然”。张国扬、苏新春在《当前汉语人文研究的兴起、历史原因、及其发展趋势》中对此作了相当详细的分析,认为有四个原因起着重要作用:对研究现实的强烈反思、“文化热”的幅射影响、对汉语研究新角度的切入、西方人文语言理论的传入。黄文国在《汉语文化语言学刍议》中指出,“更直接的原因是汉语语言研究的‘危机感’而触发了一些有志之士的‘使命感’”。深刻认识这场语言学革命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可以使我們更清楚、更主动地将文化语言学引入更深层的领域。

4. 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评价

显然,两种不同学科观的代表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实践作出了不同的评价。文化认同派的学者们认为,主要借鉴西方语言理论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套用了基于印欧语系的语言理论来解释完全不同面貌的汉语,未免有方枘圆凿之感。而持另一观点的学者则对此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不能对以往的研究全盘否定,那种结构研究正是对汉语进行全面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即使在今天和将来,仍有发展的必要。文化认同派学者反驳道,对中国现代语言学所持的方法、理论进行批评并不能说就是全盘否定。它是一种历史事实,谁也否定不了。它的存在价值就是说明对汉语曾经进行过一种纯形式纯结构的研究,而文化语言学在历史上的价值也正是在于表明汉语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了一种全新的人文研究角度。现在对过去,以及将来对现在的评价都将是一种历史的结论,根本不存在否定不否定的问题。

5. 关于文化认同派理论的评价

随着研究的深入、成果的普及,文化语言学也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但不少人对文化认同派的理论仍持“有道理,但失之偏颇,难以容人”的态度。对此文化认同派的学者认为,在创建一个理论时,应该致力于在逻辑上求得它的完整性,在理论上求得它的深刻性,这就是平常所说的“矫枉过正”、“偏激中更容易做到深刻”。如果在一开始就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可以肯定这样的理论很难提出什么创见。在理论上我们力求深刻彻底,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排除一切异见。但在学术态度上,仍主张各种不同学派的观点互相争鸣,促进学术的发展和繁荣。这几年的研究证明,结构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互相批评,给中国语言学带来了繁荣,有力促进了各自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深入。

也有的学者对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在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上一直缺乏明晰的理论界定表示不满,认为汉语的神摄神韵,并不妨碍研究者们对此作出明确清楚的解释和说明。而在理论上不清楚地表述却正是研究本身不成熟的表现。对此有的学者不屑一顾,认为对汉语的真正认识就是在于体悟。而比较有理性的回答是,由于文化语言学仍处于起步阶段,在一个全新的探索过程中,对完全陌生、正在孜孜探求的对象过早地进行界定,只会束缚自己的手脚,到头反而使自己处于前后矛盾的尴尬境地。不过,随着研究的逐步成熟,情况自然会好转。

6. 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前景

文化语言学在中国的出现,犹如石破天惊,引起了语言学界的震撼。它发展到今天,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十分诱人的前景,申小龙将它概括为文化语言学研究的触角向语言结构深入,而不仅仅停留在语言所载意义的分析上;对中国的语文研究传统力求作出一种全新的文化阐述,而不是摒弃一切,重新移植;更积极主动地引进西方的人文语言理论和方法,在自己的理论来源上广收博取,汲取借鉴一切有用之物;在不同的学派之间展开更深入的学术争辩。苏新春则在论文中提出了下面的四点:由语言要素的个体研究向系统研究的转化;由显性的语言意义向隐性的语言结构的认同:解释与描写、文化功能与物质形式的结合;对比性研究的加强。其中都强调,只有做到能对语言的结构进行文化解释,才有可能真正达到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理论目标,文化语言学才有可能成为汉语语言学的本体学科。这将最终决定文化语言学对汉语的解释力,这正是文化语言学的生命力所在。

二、语言结构的文化内涵

因此,探讨语言结构的文化内涵也就成为本次会议的另一个重要主题。

一、词汇结构的文化意义

探讨词汇结构文化意义的论文约占全部论文的40%。不少论文对汉语词汇中的一些特殊类别,如禁忌语、灯谜、问候语、成语、联绵语、店名、广告用语、人名等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分析,拓宽了语言文化研究的领域。池昌海的《“吃”语言与“吃”文化》、杨琳的《龟由贵返贱的原因新探》、董超凤的《灯谜与民族文化论略》则对不同的对象作了非常独到的研究,功力相当扎实。

关于词汇的深层问题,在以下几点取得明显的突破。

1. 同源词的同源根据是什么

陈建初在《汉语语源研究中的文化触角》中提出了应把文化学的方法引入这一领域的主张。刘殿义在《古汉语词义系统的结构及文化观念》认为,词义系统与文化观念之间有密切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思想如何转化为言语中的初始语义结构,如“张”“大”“远”“美”“高”“厚”“乐”等集结为一个大的语义群,就与古人的审美观念有紧密关系。这个见解与因故未能与会的宋永培的研究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而对什么是同源词、汉语词汇结构内部联系的真正线索,不少代表如周光庆、苏新春、黎千驹认为,历来所谈的音同义近只不过是词源联系的形式联系表征,它们真正相通的根本点应该是与词的概念义完全不同的词义形象特征,而词义的形象特征却与民族思维特征有密切关系。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这种特征表现为思维的具象性和取义的具体性。有关的统计性的深入研究正在进行,它的成果将是对汉语词义系统构成的一大突破。

2. 词汇结构的文化意义

词汇的结构形式历来被看作是一种纯物质的抽象符号。现在发现其中也浸润着与在语法、汉字中所发现的具象性、辩证性相一致的民族文化精神。苏新春在《汉语词汇结

构的具象与辩证》中分别从汉语词语书面表达形式的具象性、吸收外来词的具象心理、具象造词心理；联合式复合词、词语对称发展等方面论述了在汉语词汇结构形式上体现出来的民族思维特征。刘景钊认为这与他们目前正在进行的汉民族认知习惯的研究中所发现的规律相当一致。聂言之在研究通用成语与异体成语的演化、淘汰、规范过程时也发现重均衡、重和谐的民族心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3. 词义引申发展的文化因素

词义的引申，自德国的保罗提出了缩小、扩大、转移后，似乎这已成为词义变化的金科玉律。这次周光庆的《联想：词义引申与审美意识》却将词义的引申作为剖析语言与文化内在联系的试验物，发现“词义引申总是以联想为其必要的心理基础的；而作为人的一种心理活动，联想又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文化氛围之中，并受到凝结和积淀着包括审美意识在内的各种文化要素的主体认识图式的激发、引导和制约。因此，文化传统不同，人的认识图式也就因而不同；人的认识图式不同，认识活动中的联想方式也就随之而不同，民族语言中词义引申规律也就因此而不同。”

对语言之间的共通的、抽象的、纯符号性的一些现象和规律重新进行文化的审视，必将对人们重新认识语言的本质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汉字的文化属性

汉字所充盈着的汉民族文化已经为绝大多数学人所认同。张玉金在《汉字结构的文化内涵》中进一步揭示，汉字构件的多功能性与汉语词的灵活性、汉字结构的对称性与汉民族的辩证思维、汉字的方形工整结构与汉民族的平衡和谐的心理态势、汉字的表意性与汉民族的具象思维，都存在着相通相近的共溶性。张维佳在《浅说汉字深层的文化意识》也从汉字的起源、构成方式、意义演变等方面探索了汉文化的宗教传统和思维习惯特征。顾江萍的论文《汉字在日语形象造词中的作用》则把汉字的文化性质研究引入到一个汉语以外的新领域。

三、文化修辞学的探索

中国的现代修辞学主要是对修辞格的爬梳。这种研究的较大缺陷在于将神韵飞扬的汉语割裂得支离破碎。赵虹在富于思辨的《汉文化修辞散论》中认为，“中式修辞注意的不是真，不是智慧，而是美，而是艺术，这是一种万物同一的人文眼光，和西方的把玫瑰也拆散的分析科学眼光不同。”“修辞是言语的语言艺术，它竭力为张大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服务，其本身并非目的。”汉人的思维主要表现在直觉体悟，在汉语的艺术使用中，“比”也就成为汉式修辞之魂。这次会议论文中探索修辞现象的并不多，但这2万字的长文却足以给人以总体意义上的思考。

四、汉语音韵的文化内涵

在汉语言学的各学科中，最具物质性的学科是汉语音韵学。一般学者也都认为，在20世纪引进西方语言学理论最成功的学科是汉语音韵学。这次，李葆嘉以深厚的音韵学功底和文化学见识，在《论汉语音韵的文化内涵》一文从九个方面阐述了这个论题：呼叫感

叹的情绪宣泄、单个音节的语义负载、依声命名的认知本能、口音口势的象征通感、韵文格律的声情认同、语音巧用的辞趣辞情、语音异同的趋吉避凶、语音游艺的借音怡情、社会风貌的语音折射，给人展示了一幅崭新的音韵学研究前景。

五、汉语语法的文化精神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最早兴起，语法学是一个首先取得突破的学科。申小龙在对先秦的《左传》、现代的《井》所有的句型进行了系统的表意功能性分析后，现在又对近代的《水浒》进行了同样性质的研究。这将使他自己的理论建立一个更牢固的语言事实基础上。他向会议提交的《〈水浒传〉的耦合句研究》就显示了这一研究的成果。杨启光在《文化认同：汉语语法学重建之道》的论文中则对前一时期的研究实践作了系统的理论归纳，指出“语法是沿袭传统文化和塑成文化传统的‘深层结构’之一，并在民族文化的凝结沉淀氤氲化生进程中成为民族文化承传的代码。”因此，符合汉语语法真正面貌的应是对“汉语组织规则及其研究传统的文化分析与阐释”。

系统全面地对汉语进行文化性阐释的成果还得假以时日，有望将来，但它的雏形却已经显露。这就是本次会议所传递给学术界的信心。

（上接第133页）

各式各样错误道德观念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建设和发展，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该书的出版，无疑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具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意义。一方面，该书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历程，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的已有成果，研究了现实的道德生活，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理论体系，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地位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展望了人类伦理道德生活发展的总趋势，为现实的道德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该书在正面阐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同时，也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小资产阶级、资

产阶级人道主义、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伦理思想，俄国民粹派和经济派的伦理思想，资产阶级道德原则和道德生活等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进行斗争的经验。这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无疑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当然，该书作为开创性理论专著，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对作为毛泽东伦理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并极富现实意义的邓小平伦理思想的探索，便略嫌单薄与粗糙。但综览《历程》全书，材料翔实，内容丰富，结构严谨，文字朴实精炼，理论和现实意义很强，值得向读者荐介。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系

责任编辑：冯生

武昌起义后犬养毅来华的活动

段云章

犬养毅（1865—1932）号木堂，是近代日本的一位重要政治活动家。在辛亥时期，他始终注目于中国政治事态的演变，与中国资产阶级各派都有联系。武昌起义爆发，他亟欲使中国的事态按照其夙愿发展，抱病赶到中国，开展了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与同时期日本其他来华人士的言行有同有异，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意愿有投合也有异趋。弄清并且剖视这一活动及其反应，对我们了解日本同辛亥革命、革命党人的关系将有所增进。

然而，笔者初步接触到的中、日论著，对此多语焉不详，有的日期、情节不够清晰确切，论述亦欠系统完整，甚至有错漏。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很多，主要的是限于资料。犬养毅关系文书迄今在日本仍未发现，中文资料更为奇缺。犬养在上海、南京、武汉进行过活动，但国内报纸和有关档案的记述却非常零星简略。为促进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切磋，特将搜集到的点滴资料，结合当时情势，试图勾勒出武昌起义后犬养来华活动的粗略足迹，并试作评析。

一

现能看到的一些中日论著在谈及武昌起义后犬养毅来华事时，几乎都是含糊地写成只是一次。当时与犬养十分投契、同时在华活动的头山满后来写的《中国革命的秘话》虽谈到犬养曾因日本国会开会赶回东京，却未提到他第二次来华。据现已掌握的中、日资料看，可以肯定，犬养在1911年末——1912年初先后两次来华。

第一次来华：据犬养于1911年12月23日给其夫人犬养千代子函称：他与松平康国、柏原文太郎、柴田辉次郎等一行于是月17日由门司乘船离日，19日抵上海。为避免麻烦，他改名“陈扬义”（取犬养毅同音）。①犬养离日前，本在汤河源疗养，闻武昌起义讯，心怦然动，当三浦观树、古岛一雄面请他和头山满赶赴中国处理有关问题时，他立即慨然承诺，抱病启程。行前曾与日本内阁总理、外务大臣就对华政策问题进行过磋商。犬养抵上海时，受到在沪革命党人的欢迎。黄兴亦拨冗到他的住处专访。黄在谈话中热切希望日本有识之士，纠正“凡误认革命党之理想而反对者”。犬养表示：“少数顽固

之徒，绝不能代表日本的国论，民间多数有识者，均能谅解革命党的大志，并热望由于文明的新政，为四亿同文的国民谋求幸福。我等正在努力消除误解，以报雅命。”^② 25日，孙中山偕胡汉民、宫崎寅藏等抵沪，犬养和寺尾亨、副岛义一、尾崎行昌等往迎。27日，头山满一行亦由日本到达上海。28日，头山偕三、四口人到孙中山寓所访问。29日，孙中山被南京十七省代表会议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0日，孙中山、黄兴在上海璇宫旅馆举办茶会，招待犬养、头山等在沪之日本各会社代表和新闻记者约50人，宣布孙将就任临时大总统，在孙致欢迎词后，犬养代表日方致答词，表示祝贺。随后，孙中山、黄兴又向犬养等来宾一一表示谢意。^③

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组织南京临时政府。此前，南北议和已在进行，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已有南北妥协，即举袁为总统的默契，故孙于1月4日复电袁世凯，重申南北统一于民国即让位给袁。而犬养、头山是反对袁世凯当权的，他们抵沪后，即凭藉往昔与中国革命党和立宪派夙有情谊，游说策动南北妥协的有影响的人士（如熊希龄、张謇、赵凤昌、岑春煊、汤寿潜、庄思缄等人），提出：倘若袁世凯得志，中国前途堪危，不如劝请孙、黄二公推举岑西林（春煊）为总统，以与袁世凯的北方势力相对抗。但时正热衷于为南北妥协架桥拉线的熊希龄、张謇等人不表赞同。犬养、头山乃于7日抵达南京，先与寺尾亨商量见孙、黄事，次日上午，犬养、头山由宫崎寅藏、萱野长知陪同，谒见孙、黄，犬养告以内田外相仅支持君主立宪政体的意图，同时又提出与此有异的处理中国问题的建议，即依据南北形势，实行“大同联合论”，先联合其时具有实力和声望之人士如岑春煊、康有为，进而与北方之段祺瑞相结合，以孤立和对抗袁世凯。但孙、黄不同意联合岑、康，他说：“岑春煊任湖南巡抚时代，残杀过无数革命志士，康有为是光绪皇帝的奴仆，只寄望于宫廷改革，两者都不是协助革命的人”，所以“我们不能跟这两个人合作。”^④ 不言而喻，犬养等对此行是甚为失望乃至恼火的。当时，南京临时政府欲聘请犬养为政治顾问，犬养拒不接受，他怒气冲冲地说：“除了日本天皇之外，谁也不能斗胆命令我效劳。”寺尾亨、副岛义一亦未正式接受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顾问的聘任，只愿就法制事项提出建陈。^⑤

一些论著把犬养此次南京之行与他们赴武昌游说黎元洪联孙反袁相踵接，这是有违事实的。实际的情况是，犬养于1月6日起即因肺炎发烧，他虽于7日扶病到了一趟南京，但估计他于8日下午即已重返上海。此后留在上海治疗，15日即由上海乘筑后丸归国，^⑥ 约于17—18日抵东京。^⑦ 同时，从沪、汉往返时间以及头山后来所述在汉活动看，犬养、头山在短短五六日内到过武昌也是难以办到的。

犬养此次匆匆返日，据1月17日《东京朝日新闻》报道，主要是因病回国就医，此诚原因之一。但主要的还是出于政治需要，因到1月14日犬养体温已降低，病情好转；而当时，日本政府的现行政策遇到挫折，日本国会决定于1月20日开会辩论。南京临时政府又正处在亟待外交承认和外国财经与军械支援的关键时刻，故犬养决以议员身份回国参与日本国策辩论，力图促使日政府改变现行政策。

在1月20日开幕的日本第二十八次国会上，犬养提出了旅华视察报告书，他谴责日政府抱定立宪君主主义，支持清政府，并欲以武力威吓、干涉中国革命。他指责内田外相撒谎，并函邀古岛一雄回国参加辩论。日国民党议员亦与之配合，共同要求迅速承认中国共和政府。^⑧在开会期间，犬养听说孙中山有赴天津、北京与袁世凯商讨关于成立临时政府事宜之拟议，赶紧连发两函给孙中山，极力使孙相信：日政府已决定不持干涉中国革命之方针，日本舆论更表反对。而袁世凯则决不可信，千万不要陷入其彀中，南北和谈“宜于南京，不宜于天津”，望孙“勿寸步去南京”。^⑨约在此时，仍留上海紧密注视时局发展的头山满、寺尾亨再到南京和宫崎、萱野一起劝阻孙中山北上谈判，孙接受了这一劝告。^⑩

然而，到了2月中旬，南北妥协却已实现，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14日，而且一度多数通过临时政府设于北京。这些都与犬养等的愿望相背驰，因而促使犬养毅再度来华。

第二次来华：据《民立报》载，犬养不待国会休会，即于2月16日“由日本东京新桥出发，向上海急行”。^⑪报道者用“急行”二字，是较如实地反映了犬养当时的急迫心情。他约于20日后抵南京，25日前某日与孙中山再次会谈。^⑫会谈内容和结果未见报道，但就当时形势和孙中山言行看，让袁已成定局。南京临时政府已于18日派蔡元培、宋教仁等迎袁南下就职。孙中山在同日发布文告，号召国民“务当消融意见，扫除畛域”，^⑬共谋国家建设，并对袁世凯推诚相许。其时，内地和华侨中不少人打电报给孙中山，反对以袁代孙。孙于21日分别复电五大洲华侨和广东各团体，表示“今目的已达，以此完全民国，归诸全体四百兆人之手，我辈之义务告尽。”而袁世凯已“为民国之分子”，“其诺甚濡，其言弥信”，“宜敬观其从容敷施，以行国民之意。”^⑭犬养此时进言，阻孙与袁妥协，其未被采纳，自不待言。

犬养到南京时，黎元洪于21日当选为第二任临时副总统。对于黎，犬养等往昔与他并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但他们眼见挽孙反袁势所不能之后，转而寄望于争取黎氏，以图亡羊补牢。在这以前，日本人士已对黎早有瞩目。武昌起义一爆发，日本各界人士纷纷赶到武昌，到武昌采访的日本各式记者多达70余人，“反较中国记者为多”，对于他们“革命政府均予优待，一时气势充盈”。^⑮与犬养毅有联系的著名日本浪人末永节于起义后第六天即由大连赶到武昌，与原在武昌的吉田、川村等插手武昌革命政府的外交活动。随后，萱野长知、金子克己、布施茂、三原千寻、龟井祥光、岩田爱之助、加纳清藏等十余人由日本赶来武昌，参与革命军方面的活动，日军官与仓大尉当时跟随黎元洪左右。^⑯宋教仁在拟订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时，还曾拟邀寺尾亨参加。这些在犬养毅、头山满、寺尾亨的头脑中肯定形成了黎元洪尚可争取以为己用的印象。诚然，在武昌，最早上演南北和谈；并且出现了武昌集团与上海集团的对立；南京临时政府在后者占优势的情况下建立后，黎元洪和武昌集团对南京临时政府向日借款等问题上诸多掣肘刁难，武昌集团及其组织“民社”机关报《民声日报》不断发表文章攻击孙中山和同盟会；在袁代孙为临时大总统后，黎一再向袁表示拥护，并欣然担任袁的副手。在建都问

题上，黎和民社仍希图以武昌集团为中心，主张建都武昌，但在反对建都南京这一点和袁同调。对于上述黎元洪逐渐倒向袁世凯怀抱的情景，日本方面已有所见，但他们仍图补救。就在犬养毅等抵武昌后，日驻汉口松村总领事致内田外相函，在历述围绕以汉冶萍公司向日抵押借款而激化的孙、黎矛盾后，提出：“基于上述情况，我国如采取片面重视南京而忽视武昌之态度，势必招致武昌方面之恶感。当此黎元洪与袁世凯逐渐接近而与南京政府关系颇欠圆满之际，如此办理，定必惹起不利事态，阻碍我国愿望之实现，且迟早必定发生纠纷。”他希望给予象武昌集团那样的地方势力以“足够重视”；信中还谈到松村在1月15日发出的密函中，已提出上述建议，惜未采纳。^⑧这与下文将予论述的犬养等同时操纵利用中国某些社会势力的一贯手法很相象，它很可能反映了犬养、头山等人的观点，或者说犬养等至少是与之共鸣或与闻这种观点的。

可能是在上述动因和紧迫形势催促下，犬养毅、头山满、寺尾亨于南京之行未遂所愿后，很快就离宁往武昌，力图说服黎、孙合作，共同对付袁世凯，并警告黎不要陷于袁世凯的阴谋。^⑨犬养等在武昌活动了五六天便离汉赴沪。^⑩关于犬养、头山等此番游说情形，尚未发现当时的记述文字。20余年后，头山作了如下忆述：“这访问的意味，是仅在安慰革命的事实发起人的黎元洪，他也委派他的外交部次长到汉口迎迓，抵武昌后，也只好安慰一番，别没有开陈意见，所以黎元洪好象不满足，后来又派外交部次长来询问意见。只是事已成了南北妥协的令人惬意的事，所以想说也无益，一切也不说一句。”^⑪话虽如此，实际背景要远为错综复杂。就在这几天里，在全国和湖北，都发生了较大的促使黎袁进一步靠拢的政治风波。2月28日，湖北发生了反对黎元洪和孙武把持的湖北军政府的群英会事件，它被黎迅速镇压下去，此后黎对革命党人益发忌惮。29日，袁世凯为抵制南下就职制造了北京政变，黎对袁世凯和北洋将领的威吓行径公然附和。在这种情况下，犬养、头山、寺尾与黎元洪及湖北军政府的外交部次长王正廷虽有过几次晤谈，自然达不到预定目的。于是很不惬意地离开了武昌。

犬养等于4日离开武昌至回国前20余天的活动情况，未见任何报道。就是宗方小太郎的《辛壬日记》，也仅有宗方送犬养归国和头山出席两次宴会的简单记录。^⑫这确是尚难填补的空白。但我们可根据当时情势试作分析，于无声处听有声。当时多数革命党人、立宪派人都兴高采烈地以同袁世凯妥协、实现南北统一为得策，而以犬养等的劝告为非计，上海一些革命党报纸就对犬养来华发表过非议评论（后面将述及）。孙中山、黄兴和南京临时政府重要成员在这段时间正忙于制订颁布法令以及一些交接善后工作，对犬养等人自必无暇或极少交接。而犬养等则夙愿未遂，自必深为不快，不愿在上海多出头露面，只是静以观变。对于这样一种疏隔及其后果，亲临其境的宫崎寅藏稍后为孙中山访日事解释时写道：“孙以往未尝稍忘此事，而南北妥协以来，与日方之感情，已有疏隔之嫌，故此，孙更欲乘此访日之机，访友话旧，一吐胸中之垒块。”“日本目前有流传种种传闻：南北妥协后或指孙为亲美派，或责其妄自尊大，待日本人之态度有可治病之处等等，彼等得知后，甚表痛心。”“孙虽受非难，而无辩解之余地；当时真实情况，

至今仍有所顾忌之处，未便公开，只得听之任之。孙有招人误解之处：孙曾用一日人〔池尾亨〕为译员，此人深染官僚习气，日本人登门要求与孙见面时，此人往往从中烦难。此外，尚有一事亦招致误解：失去以汉冶萍及招商局为担保筹集北伐军军费之时机，终至不得已而为南北之妥协，给人以疏远日本之感。此事或有牵涉日本对华政策之虞，故余亦不能为孙作任何辩解。”^②官崎是日本浪人中对孙中山和犬养亲近最久而又最表钦佩者，上面这段文字，很可能吐露了他们“胸中之垒块”。

犬养于3月26日离上海回国。^③28日抵长崎，他发表谈话说：“中国之前途，今日诚不易逆变，迄无定轨”。不过“共和思想已经传播全国，故大总统之为孙为袁，初无关乎大局。惟经营新事，以救财政之窘迫，是宜研究之问题也。”^④犬养与当时日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约于是月末同到东京，犬养又发表谈话说：“日本对华之外交始终失败”，他和伊集院“均不以日报反对袁项城君为然。”^⑤乍看起来，犬养对袁世凯已改变看法，但紧随犬养离华之后，经中国东北和朝鲜回到东京的头山满则在东京银座欢迎会上十分不满地说：“这回的革命是膏药治疗，未能做到真正的开刀手术，现在看去，到处都长出脓包了。”^⑥而随后，犬养、头山都仍持反袁态度，则犬养上述谈话，其中有一时重复成份，而非全为由衷之言。他仍坚认日本对华外交失败，则又表明他这两次来华立场态度的一贯性。

二

犬养毅于武昌起义后短短四个月内两次访华，是为了什么呢？

犬养在向国会提出的旅华视察报告书里说：是因为“日本政府视革命党为罪人，虐待留学生，强要君主政体，无一非足以坏革命党感情者。今回余赴清首途之前，曾往访西园寺（按即当时日本首相），叩其政见，孰料竟与余意大背。余料今后共和政府成立，对日感情必将愈坏，故不得已亲赴上海，宣明我政府之意见，实非我国民之公意，幸勿误会等语，盖为保留我国民将来之利益也。”报告还说，“革命事起，最初恐影响我国，抱定立宪君主主义，并欲以硬力威吓干涉，之后因见清国之事，须依清国民情而定，迄今迟疑因循，无一定成见，故欲认定现政府之不可靠，汲汲于国民外交，冀稍挽回于万一。”^⑦《东亚先觉志士记传》的作者评论说：武昌起义爆发后，“日本有势力之代表人物有必要前赴支那，作革命党之后盾，对其实行指导及劝告，并根据当时情势，调整中日关系，因而与中国革命志士关系非浅之头山满、犬养毅乃有此行。”^⑧头山满则否认他和犬养来华是来“做革命军后盾”，他们与孙中山其时归国并无任何默契，“只不过是偶然而已”，而“犬养仅是做和谈顾问”。^⑨后来，他在《中国革命之秘话》里更直截了当地点明：“犬养渡华的目的，是为着打倒袁世凯，扛出岑春煊和孙文提携。”^⑩

尽管上述说法不免冠冕堂皇，语多隐讳，且调门不一，但细加辨析，仍可察出同其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乘乱主宰中国的图谋形式虽异但却大体合拍的主调。

从19世纪中叶到辛亥革命，日本侵略乃至企图主宰中国历来采取三种方式：第一种是

发动战争或者武装干涉、镇压中国革命力量，保全腐朽的卖国政府；第二种是乘中国内乱制造分裂，肢解中国，特别是首先侵占满蒙；第三种是网罗和培植中国的革新力量，使其在取代旧政权后，成为亲日政府，得以维护并进而扩张日本在华权益。三者方式虽不同，甚至有矛盾有争吵，但异曲同工，相辅相成，有时甚至同时并用。犬养早年参加的日本玄洋社、东亚同文会就有这三种方式的鼓吹者和狂热执行者。犬养是第三种方式的积极提倡者，并长期为此而煞费心机。还在1896年，官崎寅藏、平山周、可儿长一等就开始接受犬养嘱托，调查中国情况，寻觅可用人士。次年，孙中山再到日本，官崎等欣然引见犬养。此后，犬养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和康、梁等维新派都多方笼络，其用心在1898年2月3日他致东亚同文会重要干部陆实的信中如此透露：他在客岁就已暗中笼络中国革命党人，现已商定“以重金购置之”，由玄洋社巨头煤矿主平冈浩太郎给孙中山等按月送生活费，希望陆实“代为照顾彼等一切”，“将彼等掌握住，以备他日之用。”^⑩同时，犬养等力图撮合中国革命与维新两派力量，作为掌握在他们手中更有力的政治筹码。从此到武昌起义前，犬养等对康、梁等维新派固然是特别垂青，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关键时刻也有过“支持”或“同情”的表示。由于当时日本政府明显地敌视中国革新，而犬养在这段时间除1898年短期入阁外，主要是以在野的政府反对党的重要活动家开展活动，而且他在日本军、政、财界以及在日本浪人中又颇有影响，因而更赢得中国革命党人和维新派人士的信托。

武昌起义爆发后所出现的中国大动乱，激发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亟图主宰中国的久蓄贪欲，上述三种侵华方式都争着在中国上演。犬养在新的形势下，通过他所自称的“国民外交”，对革命党“实行指导和劝告”，“调整中日关系”，以保留日本“将来之利益”，其具体办法可以概括为：撮合与自己夙有联系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康有为、张謇、熊希龄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以及以岑春煊为代表的旧官僚乃至可望分化出来的北洋军实力派人物段祺瑞，建立一个取代清政府、排斥袁世凯（因被视为亲英美）的亲日政权。显而易见，这是犬养一贯主张的侵华方式的继续。

对于犬养等此行不是来做革命军的后盾，而是别有私图，当时的革命党人已有察觉，予以挑明。犬养在上述向国会提供的报告书就说：“当时革命党人谓我政府既阴助清政府，一面又使下等浪人助革命军，俾长延战祸，日本得从中取利，言时恨恨有声。”^⑪章太炎主办的一份报纸当时更一针见血地指出：犬养等“表面上是为侠义的行为而来，实际上是暗领日本政府的旨意而来。日本早就有觊觎满蒙之野心，窥视占领满蒙之机会已久，故企图乘中国内乱混乱之机达此目的。”而实现南北妥协，“必使日本失去窥视并占领满蒙的机会，所以头山、犬养要阻止妥协，并说‘妥协对革命党不利’，劝说孙、黄不可妥协。”“征之他们的行动，可以明白日本对中国的意图。”^⑫章太炎在《警告对待间谍者》一文还指出：“原彼国（按指日本）之善遇革命党人，岂诚望中国革新耶？逆臆揭竿斩木，必无成就，乘兹鼎沸，得乘间以遂私谋，是故阳与周旋，纵其速起。革命党因多猛突前进之士，以为得良友于海外无人之乡，初不语其阴谋若是也”，他认为现下力主

建都南京，挑起南北不和，便是他们要在中国挑起纠纷，制造混乱，好混水摸鱼。”^⑧犬养第二次来华时，《民立报》登载署名少白（可能系陈少白）的《犬养毅》一文说：“日本国会未闭，政务方殷，而君竟复来，……喧传则谓君此行之目的，专在谋所以排斥袁世凯者，质言之，则在离间孙、袁而阻南北之统一。”^⑨上述议论，诚然反映了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幻想，^⑩但对日本侵华手段和犬养来华活动的主旨的评论，却也有真知灼见。

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及其言行，固然要察明其动机，但也要考虑其客观效果。因此，尽管犬养来华别有怀抱，但其在武昌起义后的言行，客观上对暴露日政府的伪善和干涉中国革命的咀脸、扩大辛亥革命影响、争取国际人士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和同情，有其不应抹煞的积极作用。当时相继成立的对中国革命表示“声援”的日本有邻会、支那问题同志会、善邻会、东邦义会、太平洋会等或有犬养参加或获其支持。犬养在前面提到的1912年1月日本第28次国会上所提出的报告书及其对日政府的谴责，对一个月后日本国内掀起的追究日本外交政策失策的浪潮有过先导作用。^⑪不仅如此，就是在动机上，也应与其时日本怀有侵华意图的其他一些人士有所区别。即如此时与犬养比较相契的同道者头山满比较，他们虽都经历过由自由民权主义者向国权主义者的蜕化过程，但由于阅历上不全相同，犬养的自由民权思想似乎尚保留得多些，他较多较明确地赞同中国共和革命，而且在这时期并未提及满蒙问题。而头山这时则与自由民权思想更加疏隔，他担心中国实现共和政治，会影响日本的国体，仅因考虑支持革命党人可以较容易地获取满蒙地区，又与孙中山多年交往，才仍决定“支持”革命党人。^⑫

如果说，犬养希冀日本承认并支持南京临时共和政府并未如愿，那末，犬养和头山来华的另一目的——安抚约束来华日本浪人，却取得一些实际成果。其时在大批涌入中国的浪人中（光汇集上海的就百余人），除宫崎寅藏等少数人外，多数是各图私利，有的甚至是“趁火打劫，暗饱私腹”，^⑬有的还暗领日政府密令，刺探中国情报，破坏革命事业；而且浪人们各有后台，各立门户，争权夺利，言行纷歧。这些在当时已引起人们讥议和革命党人的懊丧，这样，统一浪人行动，约束那些“不道德的粗汉”，以免因浪人们的小不忍而乱了历经十数年寒暑策划而成的大谋，也就成了犬养、头山迅速赴华的另一动因。^⑭犬养、头山抵上海后，即会见各界日本浪人，规定非经头山同意，日本浪人不得赴南京会见孙、黄，犬养移此为“安宅之关”。^⑮这对于制约日本浪人恶劣行径、便利革命工作亦有好处。

其时，清政府、袁世凯和革命党人都急需外国财政和军械援助，头山满在来华途中所发表的谈话，就明白指出这一点，认为：“不论能否讲和，首先是金钱，日本可以在财政上予以筹措。”^⑯在这以后，不少与犬养、头山关系较密的日本人士都为解决革命方面的财政困窘进行过活动。犬养第一次访华归国后，恰值南京临时政府派何天炯往日与阪谷芳郎会商帮助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中央银行事，犬养亦参与商量。^⑰就是在南北妥协达成之后，犬养在懊丧之余仍认为对共和政府“经营新事，以救财政之窘迫”需要研究，对孙中山在解职后筹划实业建设、访日求援还是持欢迎和支持态度的。这一点亦需给予适

当肯定。

- ①〔日〕鹭尾义直：《犬养木堂书简集》人文阁，1940年，第124页；陈固亭《国父与日本友人》载犬养抵沪时，孙中山往迎，有误，因19日孙中山尚在归国途中。
- ②⑦ 陈固亭：《国父与日本友人》幼狮书店，1965年，第10—11页。
- ③⑩〔日〕头山满翁正传编纂委员会：《头山满翁正传》（未定稿）苇书房，1981年，第250、248—250页。
- ④〔日〕古岛一雄：《辛亥革命与我》，陈鹏仁译著：《孙中山先生与日本友人》。
- ⑤〔澳〕骆惠敏等主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第136页；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200页。
- ⑥〔日〕《东京朝日新闻》1912年1月17日，又据宗方小太郎《辛壬日记》（见《近代稗海》第十二辑）载：1月8日下午头山满、寺尾亨等已由南京返抵上海，出席了当天下午6时日驻上海有吉总领事邀宴，犬养未与席，估计是因病。
- ⑦ 1912年1月25日上海《民立报》载犬养抵东京时间为16日，疑有差错，揆情应在17~18日。
- ⑧ 上海《申报》1912年1月31日；古岛一雄：《辛亥革命与我》；上海《民立报》1912年1月25日。
- ⑨ 黄彦、李伯新：《孙中山藏档选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453页。又据1月15日《伍廷芳致总理大臣电》称：“现已决定在退位诏书公布之日，孙文即当辞去大总统职位，并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孙文并将立即前往北京，亲自与袁商讨关于成立临时政府事宜。”（《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215页。）
- ⑩⑳〔日〕头山满：《中国革命之秘话》（三），《广东迅报》1941年6月12日；《宫崎滔天年谱稿》。
- ⑪⑬ 上海《民立报》1912年2月25日。
- ⑫⑭《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105、111—112页。
- ⑮ 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73页。
- ⑯ 洪桂己：《清末民初日本在华谍报工作》，《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讨会（1912—1927）》台北。
- ⑰《松村驻汉口总领事致内田外务大臣函（1912年2月26日）》，载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363—366页。
- ⑱《头山满翁正传》（未定稿）“年谱”第372页；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近代中日关系史事记1919—1940》第56页。
- ⑲ 又据3月5日上海《民立报》载：犬养等仍在鄂活动，此报道当系指5日前情况。
- ㉑⑳〔日〕头山满：《中国革命之秘话》（三）。
- ㉒㉓〔日〕宗方小太郎：《辛壬日记》。
- ㉔〔日〕近藤秀树编、禹昌夏译：《宫崎滔天年谱稿》，《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
- ㉕ 上海《申报》1912年4月8日。
- ㉖ 上海《申报》1912年4月2日。因该报是日报道犬养抵东京发表谈话，故犬养抵东京时间为三月末某日。

（下转第99页）

略论徐继畲与《瀛环志略》

李鸿生

鸦片战争反映了当时地球上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腐朽的、代表中世纪文明的、经济技术落后的东方封建主义制度，与新兴的、代表近代文明的、拥有先进经济技术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一场特殊形式的碰撞。面对“侵略的西方”和“先进的西方”的双重挑战，中国向何处去？林则徐等先进的中国人正在苦苦地思索、探求，徐继畲也在同西方资本主义发生联系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闭关自守的落后，从而潜心研究夷情。

徐继畲（1795年——1873年），字健南，号牧田、松龛。山西五台人。道光六年（1826年）进士，初任编修、御史，后任广西浔州知府，庶几奉调福建任道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任广东盐运使、按察使。数月后又提升为福建布政使。道光二十六年授广西巡抚，旋即调任福建巡抚，直到咸丰元年（1851年）奉召晋京。共在闽粤沿海地区为官、办理通商事务十数年。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英军进犯广东受阻，而北犯福建厦门。当时在福建汀漳龙道任代理道台的徐继畲曾在其辖区内积极设防，筹划固守。后来，清军惨败。面对天朝上国受到逆夷的致命打击的现实，徐一度倾向主和。然而，卑屈求和导致了《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的主权和独立遭到进一步的破坏。丧权辱国使徐继畲在茫然中惊醒：“二百年之国威，乃为七万里外之逆夷所困，致使文武将帅，接踵死绥，而不能挫逆夷之毫末。”^①原因何在？他开始睁眼看世界，认真探究西方列强的虚实，寻求盛衰迭代之理，从而千方百计搜集有关世界史地资料，着手编撰《瀛环志略》。

徐继畲编撰《瀛环志略》并非偶然。

首先是由于办理“夷务”的需要。

鸦片战争以前，由于清朝统治者实行严格的盲目排外政策，严禁与外国人接触，结果，不仅国人对西方世界毫无所知，就连高层统治者如道光皇帝、耆英、琦善以及以注重实际著称的顾炎武、林则徐等，也“不谙夷情”，对于来中国“互市”已有两百年历史，又以鸦片走私震撼朝野的英国，毫无所知，“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②以致英国侵略者来到面前也不知如何应战。在这种情形下，徐继畲终于发出了“不悉外情，致误事机”的感慨！^③作为参与办理“夷务”，在粤闽沿海地区常与外人打交道的官员，为了不再昧于外情，徐继畲迫切希望了解海外诸国的“疆土之广狭，道里之远近”，以便作好

应付新世界的挑战的准备。

其次，对舆地考证的酷爱，使徐继畲选择了探索域外史地作为开眼看世界的起点。

徐继畲历来对舆地考证颇为用心，常阅读中国传统史志，并著有《尧都辨》、《晋国初封考》、《两汉志沿边十郡考略》、《西汉幽并凉三州今地考略》等书。正是出于对舆地考证的爱好，因此，当他在厦门会晤英国领事，认识英方译员、美国传教士雅裨理，并见到“绘刻极细”的外国地图时，即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苦不识其字，因钩摹十余幅，就雅裨理询译之”。^④此后，徐继畲不放过任何一个向外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机会。他常常利用职务之便，在接触外国官员、传教士、商人时，尽量询问世界各国的情况。如雅裨理的朋友、美国传教士甘明向他介绍了瑞士等国的情况；英国首任驻福州领事李太郭和夫人则为他解答了许多有关中东的问题；李太郭的后任阿利国和夫人为其提供了外国史地的资料等。徐继畲孜孜不倦，探索外域史地，几乎到了入迷的地步。据与他接触过的外国人介绍说，徐继畲常常会“一连好几小时兴趣盎然地谈论地理”。^⑤

再次是中西文化交流使徐继畲得以完成《瀛环志略》。

16世纪末，欧洲传教士来华。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欧洲“文艺复兴”的成果。随着欧洲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医学、物理学和哲学的传入，中国人对西方的文化有所了解。与此同时，传教士又将中国的传统文化精华介绍到西方，成为西方文化的新血，促进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正是这种东西方文化的双向交流，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一股清新学风。以徐光启、方以智、李之藻为代表的一批向往并学习西方文化的先进人物，力图汇通中西，在中国早期启蒙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然而，这种中西文化双向交流的黄金时代，只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到18世纪初期，清朝统治者由于与罗马教廷的“教仪之争”而“禁教”，完全禁绝西学，使得17世纪曾颇有起色的早期启蒙思想到18、19世纪只有零星的回音，而恰恰在清朝严行闭关锁国的愚昧政策的这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处在专制统治下的中国远远地落在西方诸国之后。

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⑥古老的中华帝国所遭受的数千年未有的变局，使先进的中国人惊觉“天朝”文明之外，还有先进的西方文化。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为了“悉夷情”而罗致翻译人才，“立译馆翻夷书”，“凡以海洋事进者，无不纳之，所得夷书，就地翻译”，并在一年之间，做到“海外图说毕集”，^⑦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四洲志》。魏源正是受林则徐的委托，以《四洲志》为基础，编成第一版《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同样的，徐继畲编撰《瀛环志略》，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他为了更多地、更准确地了解外部世界，常常不耻下问。不仅请外国人提供资料，还向曾飘洋过海的老舵师请教有关南洋群岛的情况。此外，徐继畲还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搜集流传在东南沿海地区的西洋人编写的介绍世界地理、历史的出版物，并与中国传统史志、游记等文献进行比较、考订，“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

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自癸卯至今，五阅寒暑，公事之余，唯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⑧最终于1848年完成了《瀛环志略》。

《瀛环志略》作为一部与《海国图志》并称于世的介绍外国历史的著作，曾风靡一时。与同时代同类型的著作相比，确实有其高明之处。

第一，具有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意识。较早地注意到西方国家的对外扩张，使亚洲许多国家丧失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沦为殖民地是“古今一大变局”，^⑨已构成了对清朝的严重威胁，必须密切关注。

据曾于1845年末至1846年初访问福州的美国人乔治·史密斯记述：有一次，在徐继畲的要求下，阿利国夫人为徐继畲画一幅世界地图，用不同颜色标出受英、法、俄控制的世界各地。“收到这张地图后不久，他（徐继畲）就送来一封便函，询问把阿富汗省略的原因，是它已经与波斯合并呢？还是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王国了。”^⑩这表明徐继畲对西方殖民势力扩张的特殊关心。而且由此而引起他对清朝主权受到严重威胁的担忧。他在《瀛环志略》中指出：“欧罗巴诸国……航行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由其善于操舟，亦因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中国边患自古在西北之背，今则转向东南腹地，西方列强技术先进，国势强大。中国的领土及中国的邻国，已不断受到侵扰，受到变成殖民地的威胁。五印度“有为英所灭者，有听其置吏仅拥空名者，有受役属为藩属者”，到后来，“五印度全土，归英辖者十之七，仅余西北数部尚未服也”。五印度近连西藏，南洋诸岛国与我素有来往，“今则胥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中土之多事，亦遂萌芽于此。”这里的“埔头”，徐继畲虽然尚未象今天那样理解“殖民地”的严重意义，但已看出是隐含掠夺和侵略意味的商贸基地。徐继畲还揭露荷兰曾企图占领中国台湾为它的殖民地，结果遇到郑成功的抵抗而失败：“彼以横肆为鲸鲵，遇郑氏父子而弱焉，亦足为远夷欺凌中国之炯戒矣”。提醒国人应以史为鉴，并密切注视“天朝”周围的国家多已沦为列强的埔头这“古今一大变局”，万万不能等闲视之。

第二，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徐继畲超越了魏源等着重于学习西方先进技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对欧美的政治制度予以关注，力图探索西方的制度与国家独立富强之间的联系。

鸦片战争前的一个多世纪，由于统治者厉行文化专制和闭关锁国政策，国人的思想完全处于封闭状态。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破关而入，中国不得不接受“侵略的西方”和“先进的西方”的双重挑战。一批开明进步的爱国者，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在坚决抵抗“侵略的西方”，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同时，面对“先进的西方”，开始睁眼看世界，重新认识“世情”和“国情”，探求救亡图存之路。最初是林则徐、魏源等在抵抗英国侵略的斗争中，看到了“船坚炮利”的“长技”是列强所以致胜的原因，故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是，这毕竟只是在物质层面上看到了“天朝上国”的短处和西方的长处。而徐继畲高出一筹之处，是在于他初步触及到制度层面，广泛介绍西

方民主制度，大胆称颂民主政治。

在《瀛环志略》中，徐继畲运用西方的材料和详细的统计数字，以极富感染力和综合概括的手法，对欧美的民主政治作了详尽的描述。他既介绍英国的议院制度：“都城有公会所，内分两所，一曰爵房，一曰乡绅房。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耶苏教师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聚众公议，参议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其民间有利病欲兴除者，先陈说于乡绅房，乡绅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议，可行则上之相而闻于王，否则报罢。……大约刑赏、征伐、条例诸事，有爵者主义；增减课税，筹办帑饷则全由乡绅主义。”^①也介绍美国的民主政体：“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各国正统领之中，推一总统领。专主会盟战伐之事，各国皆听命。其推择之法，与推择各国统领同。亦以四年为任满。再任则八年。”“米利坚政最简易，榷税亦轻。户口十年一编。每二年于四万七千七百人之中，选才识出众者一人，居于京城，参议国政。总统领所居京城，众国设有公会，各选贤士二人，居于公会，参决大政，如会盟、战守、通商、税饷之类。以六年为秩满。每国设刑官六人，主狱，亦以推选充补，有偏私不公者，群议废之。”^②并认为美国这种“公器付之公论”，是“创古今未有之局”。^③徐继畲还详细叙述华盛顿率各部民众取得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废弃分封制、世袭制，实行共和制、联邦制、选举制、任期制的业绩：“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择有德者为之。”^④并且对此表示赞赏：“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駸駸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⑤

正因为徐继畲对西方的介绍，确实比着重于介绍西方文化的物质层面具有更深的层次，所以，魏源在1852年增补的《海国图志》一百卷本中，引用了《瀛环志略》这方面的材料，并在每次辑录徐书材料时，冠以《瀛环志略》之名。也正由于徐继畲赞赏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言论，闪烁着近代民主思想的火花，因此，《瀛环志略》备受改良主义者的推崇。在日本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徐继畲作为长期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清朝官吏，在介绍西方民主制度时不可能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意识，而是往往用孔子的大同思想予以解释，其最终目的也是企望通过学习西方以重振“天朝上国”之国威。但是他毕竟是近代中国最早认识和介绍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启蒙者。

① 戴逸、林言椒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一卷，第316页。

② 《林则徐集·奏稿》中，第649页。

③⑤⑩ （美）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第2页、第34页。

④⑧⑨⑪⑫⑬⑭⑮ 徐继畲：《瀛环志略》。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页。⑦ 《林则徐与澳门》第177页。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联 责任编辑：林有能

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学研究方法

姜建强

1918年7月，德国中学教师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发表了巨著《西方的没落》，立即引起了西方社会的轰动；无疑这是与当时的背景密切相关的。19世纪曾被人称之为“历史学的时代”，历史意识在当时日渐深入人心。但这种历史意识，一是黑格尔的重精神力量的历史意识，二是孔德的重科学实证的历史意识。黑格尔从理性和逻辑角度强调了历史的必然性，把精神看成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力量。孔德从实证立场出发，反对历史研究中的形而上学思辨，认为社会历史的动力因和目的因非人智所能探求，极力主张将自然科学那种严格实证方法运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19世纪的历史哲学就如此裹挟在戏剧性的不协调之中，处于变革的前夜。

斯宾格勒以他敏锐的眼光、天才的气质以及批判意识，抓住了这一变革的契机，从而在现代西方历史哲学中占据了重要一席。

斯氏建构的历史形态学方法，首先是从批判西方以往的哲学观念和史学观念开始的。他说：“历史被赫尔德描写成人类的教育，被康德描写成自由观念的演化，被黑格尔描写成世界精神的自我扩张，被其他的用其他的词描写着。”（《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36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从这里出发，他引出了三大批判：

（一）对传统历史研究方法的批判。斯氏认为，在以往历史研究中，之所以会经常出现浮士德式的两个灵魂打架，即一类人总是认为“今天的人类”进步大极了，另一类人则总是用过去贬责今天，把古希腊看成“尚无敌手”，就是因为研究方法上自己限制了自己，“从自然科学搬来了因果律，从而付出了代价。”（第49页）对此，斯氏尖锐地指出：这种源于康德的形而上学哲学观念，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一直垄断着西方的历史思维。“过去的研究方法几乎全是从那唯一完全锻炼认识方法科学，即物理学那里搬来的，以致实际上我们只在研究客观的因果关系，我们却自以为是在进行历史研究。”（第19页）这种按“原因”或“效果”的体系安排历史事件，虽给人一目了然之感，但却是一种实用主义粗略地抄袭物理学所画的世界图景。在斯氏看来，研究世界历史，就是研究各种文化的历史，它不是揭示历史的因果为己任，而是以穷究文化本身的宿命为己任。因此，数学和因果法则只能导致“现象世界的自然安排”，而不能导致“现象世界的历史安排。”（第20页）

(二)对世界历史三分法的批判。由于史学研究借助物理学方法,强调因果必然性,因此,在“世界历史是什么”的问题上,传统的结论是:世界历史是由古代——中古——近代三大体系组成。而在斯氏看来,这一多少年来主宰了人们历史思维的体系,是“简单地直线进展的”(第32页)体系。它是用某种公式化的概念(如“理性时代”、“人通主义”、“启蒙”、“经济进步”、“民族自由”等)当作评判全部历史的准则,因而是极不全面的。它必然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事件或历史因素看成是从属的、估价过低的、或者干脆加以漠视。斯氏举例说,从三分法来看,18世纪应限于“近代史”,把它同上下数千年的“古代史”相对立,而希腊前的各种文化又被偶然性地堆积在那种“古代史”中,未经审查,也无系统,不过作为附录而已,这岂不荒谬可笑吗?因此,在斯氏看来,用三分法来建立世界历史体系,它最大的弊端就在于不把世界历史看作一个整体,而是以个人标准加以选定的。

(三)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斯氏认为,三分法体系不仅限制了历史领域,而且更坏的结果是,它左右了历史舞台,把西欧当作一个坚实的“极”,当作一轮“太阳”。而千百万年来的伟大历史和远古文化都只配围绕这个“极”旋转,围绕太阳旋转,只有从它这里才能获得光源,获得其历史事件是否重要的判定。为此,斯氏把它比作“历史的托勒密体系”。(第34页)这个体系不仅是有关世界历史的“幻景”,而且它还“自欺欺人”,把中国和埃及几千年的遥远历史,缩小成纯粹的插曲,把拿破仑以后的西欧历史则比作庞然耸立的山云。斯氏说,世界历史如真的随个人喜好来安排的话,那么,中国的历史学家可将世界历史安排得视十字军、文艺复兴、凯撒、腓特烈大帝等为无足轻重,或干脆不去提它了。这样做,或许有“地域性的和暂时性的价值”,但“断然没有世界史的或‘永恒’的价值。”(第43页)

正是在批判了传统历史方法和历史思维的基础上,斯氏断然强调,和这种种从传统或从个人选择得来的,强把历史纳入其中的武断而狭隘的体系相反,“我提出的历史进程形式是自然的,‘哥白尼式的’,它的根源寓于历史进程的本质深处,只有完全摆脱了成见的眼光才看见它”。(100页)这里,哥白尼式的革命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斯氏所倡导的世界历史形态学方法。

那么,什么是形态学方法呢?斯氏解释说:理解世界的一切方法归根结底都可称为形态学。机械的事物和扩展的事物的形态学,叫做体系的形态学。这是一种发现并整理自然定律与因果关系的科学。有机的事物、历史的事物的形态学,叫做体相的形态学。体系的形态学是针对“作为自然的世界”而言的,体相的形态学是针对“作为历史的世界”而言的。前者是针对“已成的事物”,实际上是一种自然哲学研究方法;后者是针对“方成的事物”,它是真正的历史哲学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的特点在于,在一个生活的图景中,而不是在一个无所不包的总图中,“重新地检视世界的形式、运动及其最终意义。”(第17页)要从“全部值得注意的细节中去发展人类历史的形式语言,它的周期结构,它的有机逻辑”,(第45页)并把“世界史的演进看作一个有机的单位”。(第65页)概而言

之，体相形态学方法就是用哥白尼式的历史观去替代托勒密式的历史观，也就是历史世界的不可估量的扩大。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斯氏是怎样用历史(体相)形态学方法来研究世界历史的呢？他提出了哪些不同于前人的观点呢？

(一)从历史形态学出发，斯氏得到的第一个结论是：历史是通过各文化兴亡盛衰来体现的，文化是有机体，因此，历史也是有机体。是有机体，就必须具有青年、生长、成熟、衰败的周期性特征。因此，何任一种文化都要经历三大阶段：

(1)前文化阶段。其特征是：在精神上是乡野的和直觉的，庄严体裁的神话诞生，表现出对世界的恐惧和思慕；在文化上是神秘的象征主义和朴素的模仿；在政治上是尚无国家，只有部落及其首领。

(2)文化阶段。这一阶段的文化可分为早期和晚期。早期的特征是：在文化上，作为表现青年世界感情的装饰和建筑开始兴起，形式语言的完成，在政治上，国家观念开始发生作用，贵族和僧侣成为两个原始等级或阶级。与这种等级状况相适应的是地产生经济和封建政治。晚期的特征是：在文化上，成熟艺术的形成以及理智化了的形式语言的完成。与之相伴的是精确的创造力的枯竭，庄严形式的消失和风格的终结；在政治上，第三等级(资产阶级)的兴起，城市金钱战胜了封建地产。

(3)文明阶段。其特征是：在文化上是无内在形式的生存，艺术样式的迅速改变(如旧式的复兴、新式的任意发明、各种剽窃等)，大城市艺术开始显现奢侈、享乐、神经刺激等风气。音乐、建筑与绘画转变成为纯粹的工艺艺术；在政治上是第四等级(群众)开始出现，金钱统治(民主政治)渗入政治形式，凯撒主义的形成。这样，原始的人类社会状态逐渐强加于高度文明的生活方式上，一种文化的历史或生命也就彻底结束了。

斯氏认为，若从时间上说，西方文化的三阶段可这样划分：前文化是法兰克时期(公元500—900年)；文化早期是哥特时期(公元900—1500年)；文化晚期是巴洛克时期(公元1500—1800年)；文明时期是公元19世纪到20世纪。斯氏考察了埃及的、雅典的(希腊罗马)、阿拉伯的和西方的文化，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的文明，每一种文化都是从乡村产生，然后又在大城市的文明中“走向最后的自我毁灭。”(第244页)历史(文化)作为有机体，当然也逃不了这周而复始的循环。尽管我们在情感上不愿承认这一事实，认为它“切断了一切远大的希望。”(第34页)但人们可以悲叹它、幻想它，却不能改变它。

(二)从历史形态学方法出发，斯氏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历史(文化)具有“同时代”性。所有文化都是独特的、等价的、不存在共同的世界中心。

“同时代”理论是斯氏历史哲学中一个最重要思想。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发展阶段，怎么会“同时代”呢？正是在常人不可解理的地方，体现了斯氏独到的思维方法。为了使人知道一点“新方法的丰收情形和适用范围”，(第82页)斯氏在书末列了三张表，“同时代”理论就渗透于其中。

表一是“‘同时代的’精神时代”。斯氏列举了印度、雅典、阿拉伯和西方四种不同的精神时代，每一精神时代都经历了春夏秋冬四个演化阶段。不同的精神时代在相同的演化阶段表现为同时代性。如春的阶段，四种精神时代都表现为乡野的和直觉的，表现为一种新的神感等特征。

表二是“‘同时代的’文化时代”。斯氏列举了上述四种不同文化时代。每一文化时代都经历了前文化、文化和文明三个发展时期。不同的文化时代在相同的发展时期表现为同时代性。如在文化时期，四种不同文化时代都表现为一种由整个内部存在而形成的某种风格的生命史以及最深刻的形式语言的形成等特征。

表三是“‘同时代的’政治时代”。斯氏列举了埃及、雅典、中国和西方四种不同的政治时代。每一政治时代也都经历了前文化、文化和文明三个发展时期。不同的政治时代在相同的发展时期也表现为同时代性。如在文明时期，四种不同的政治时代都表现为大城市与行省的出现以及第四等级的形成等特征。

在斯氏看来，各个文化的不同历史时期不论彼此之间相距多远，它们在精神上、文化上和政治上必然有一个同属于某一历史阶段的问题，从而是可比的。例如海克索人统治埃及时期和19世纪的欧洲就具有可比性，因为它们都处于“文明”的初始时期。斯氏说，用这些形态学关系的方法去组合世界历史的整个图景，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正是这一透视第一次向我们指明了历史的真正型式”。（第77页）

正因为文化具有“同时代”性，因此，从形态学比较看，所有的文化都具有其存在的价值，都有其个性，并不存在共同世界的中心。这是斯氏又一值得注意的历史思维。他把在世界历史发展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概括为八种，每一种文化都各有自己的观念、生活、愿望、感情以及盛衰过程。因此，它们在本质的最深处是等价的，并不存在谁优谁劣问题。这就推翻了长期统治人们思想的文化优劣说和欧洲中心说。

（三）从历史形态学方法出发，斯氏得出的第三个结论是：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不是选定的某一部分。因此，我们要从内在联系的“形态关系”去考察每一种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

以往史学家们总觉得用社会的、艺术的、宗教的观点去“阐明”某一时代的政治意义是一种“额外负担”，他们总是囿于“政治的界限”去理解各种文化。而斯氏则把每一种文化都视为有机体，历史具有一种总体的生命力。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之间总有割不断的内在联系。他举例说，在微积分和路易十四时期的政治时代之间，在雅典的城邦和欧几里得几何学之间，在西方油画的空间透视和以铁路、电话、远距离武器制胜之间，在音乐和信用经济之间，都存在着“活生生的相互依存关系”。（第81页）从形态学观点来看，即使最平凡单调的历史（文化）事实也都具有象征意义。

斯氏所倡导的历史形态学研究方法，对于历史研究具有多方面价值，对我们的启发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历史形态学方法在本质上是一种新的哲学。斯氏强调说过：“一切真正的历史

著作都是哲学，除非它纯粹是一种蚂蚁工作。”（第68页）一切真正的历史研究，都是“发展一种哲学”。（第81页）这也就是说，在本质上历史研究就是哲学研究，史学家就是哲学家。因此，史学研究要象哲学研究一样，要有批判性的反思意识，要有体现时代精神的超前意识，要学会领会和把握现实，而决不要在所谓“新思潮”托词的掩饰下重新咀嚼那已平瘪的旧论点；但也不要随意创造一种谁也不需要的新学说，更不要一味地埋于史料的考证或体系的建构来掩饰其观点的贫乏。应该说，斯氏这一见解是有新意的。他之所以有勇气打破牢牢统治史学领域的“欧洲中心论”和历史发展“三阶段论”，也在于他有了一种新哲学。

其次，斯宾格勒用历史形态学方法所提出的“同时代”理论，突破了传统的时间观。人们在习惯上总以为时间是机械的、均匀地向前流失，因而组成一个永不停顿的持续的事件之流。在这个事件之流中，从没有任何东西得以完全同一的形态重新发生，从而有了赫拉克利特的“你不能两次跨进同一河流”，有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而斯氏则宣布，在历史（文化）的生长演变中并不存在这种机械的时空之流。任何一种文化都能以完全同一的形态重新出现。他的“同时代”理论的提出（斯氏的“同时代”理论，从时间观上说，是否受爱因斯坦相对论影响，目前还无资料证实。不过，必须注意的一个事实是：爱氏的相对论的建立和斯氏成书的时间都在本世纪之初。相对论打破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因而引发了物理学革命。从这一轰动事件来看，斯氏不可能不有所闻。无论怎么说，这是一个有趣而重要的事情，有待进一步的证实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此作出的努力。如从斯氏的“文化时代”上看，西方19世纪与20世纪的文化发展不应与埃及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相比较，而应该与埃及的海克索时期（公元前1680年——1580年）相比较。因为它们同时处在文明时期。从“政治时代”上看，西方1800——2000年的政治发展不应与中国这一时期的政治发展相比较，而应与中国的战国时期（公元前480——230年）相比较，因为它们也同时处在文明时期。斯氏的这一比较方法，打破了机械的、绝对的时间观，把过去、现在、未来缩在一点上（即“同时代”上），然后把有机文化单元放在这一点上进行比较。这一方法对我们来说是有启发的。

再次，斯氏的形态学研究方法还倡导了一种贴近生活、预断未来的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在以往史学家看来，历史研究就是同古董、文物、史料等这类死的东西打交道。因此，史学研究的使命就是注释再注释，考证再考证，所谓“我注六经”便是也。斯氏则把它颠倒了过来。他从形态学方法出发，认为历史研究在本质上并不同“已成的事物”打交道，而是同“方成的事物”打交道，它总是此刻当下的时代精神的高度体现，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斯氏强调说：“一种并不涉及、并不影响当代生活的最深处的学说根本不能算学说，最好不要教给别人。”（第72页）“只有对于生活的必要性，才能决定一种学说是不是杰出的。”（第68页）历史的真正使命并不在于满足“从过去去寻找计算尺”，（第692页）而是要指向未来，预断未来的结果。他说，他写作《西方的没落》这本书的直接动因就是他目睹了当时欧洲的现实，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激发

了他“第一次大胆尝试，想去预断历史”。（第13页）而在当时“环顾宇内，我找不出一个对当代某一重要问题作过一次深刻的或具有远见的发言”。（第71页）通过比较和研究，他发现西方文化已从19世纪就进入“文明”阶段，也就是说进入了停止发展的晚期的衰落和无创造性的阶段，从而正处在没落之中。在那时人的眼中，当时西方世界正处在蓬勃向上的上升时期，一切都还是那么美好。而斯氏则作出了惊世骇俗的预见。这要有相当深远的历史眼光的。因为请注意这个事实：当时，震撼整个西方世界，持续10年之久的第一次经济危机还未爆发。可以说，斯氏是持西方世界悲观论的第一人。不仅如此，斯氏的这一预见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的西方社会的发展中，不断得到了证实。于是，有了《增长的极限》、《熵：一种新的世界观》、《1990年大萧条》。这些都是斯氏预见的发挥和发展。这里，也可看出，方法对历史研究的严重性。

作为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和方法论，斯氏的学说带有某种生机论和宿命论的倾向以及唯心主义的思辨色彩。尽管他的历史哲学的出发点是批判自维柯以来至黑格尔而集其大成的唯理主义历史哲学传统，反对空疏体系式的构画。但是，《西方的没落》为人们展现的仍是一种“世界图式”，而人们也仍是把他与维柯、黑格尔和汤因比归诸一类，称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家”。

作者单位：上海水产大学德育教研室

责任编辑：林有能

（上接第132页）

场，企业经济效益将有更大的提高。为实现新的腾飞，他们正在创造条件，在梅州山区发展行业联合，酝酿组建梅州汽车车桥集团，实行集约经营，为梅州山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梅州汽车配件厂的实践证明，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实行专业化生产是梅州汽车车桥工业发展之路，是适合我国汽车工业发展趋势，符合梅州汽车配件工业生产的实际和发展的良策。根据我国汽车工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汽车配件厂家较多，竞争激烈的情况，笔者认为，梅州汽车车桥工业，必须认清我国汽车工业发展趋势，抓住契机，瞄准国家整体规划，向中央部署的三大层次靠拢，因势利导走汽车零部件专业化生产的道路。以目前生产能力较大的汽车车桥、齿轮、电器三大部件为“龙头”，逐步发展和形成三大专业化零部件

生产体系。

梅州汽车配件厂经过多年的努力，发展轻型汽车车桥生产，实现了产品系列化，质量标准化，而且正在兴建年产3万台套的轻型汽车车桥生产线，成为梅州汽车配件生产的“龙头”企业。因此，以“龙头”企业梅州汽车配件厂为主体联合梅州市区内及各县10多家汽车配件生产厂家，组成梅州汽车车桥集团公司，是符合梅州汽车工业实际和国家汽车工业发展要求的有效途径，是梅州汽车工业生产发展之路，是振兴梅州汽车配件工业，发展山区经济的康庄大道。

作者单位：梅州汽车配件厂

责任编辑：张洁

中华书局本《汉书》校议

曾宪礼

本文涉及的是中华书局1962年校点本《汉书》（以下简称中华本）的“帝纪”和前五“志”部份，认为其中校勘可议之处有九。

一、卷四·文帝纪

“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临）。”（第132页）

《校勘记》：“李慈铭说《史记》无‘临’字，此误衍。”（第136页）

按：1. 此句，《汉书》各本及《通鉴》皆作“哭临”。中华本据为底本的王先谦《汉书补注》本（以下简称王本）引李慈铭说后，又出先谦曰：“荀《纪》亦无‘临’字。”王氏并未下断语。仅据《史记》，或再据《汉纪》而删《汉书》，都无版本依据。

2. “哭临”、“临哭”，在古代与丧事有关的活动和丧制礼仪的记载中，时或省作“临”，但却不与一般意义的哭等同。“临”义为哭祭、哭吊，所以“临哭”时一般都有特定的场所和时间。《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围郑，……郑人卜行成不吉，卜临大宫，且巷出车，吉。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临，临哭；大宫，郑的祖庙；巷出车，示将迁宗庙，意为国丧。所以国人到祖庙哭吊则称“临”，而守陴（城）者在城上哭，就只称“哭”了。另，《左传》襄公十二年秋，“吴子梦寿卒，临于周庙，礼也。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于宗庙。”都指“临”有特定场所。又，《礼仪·士虞礼》记丧制礼仪，称“朝夕临位”，是哭吊既有特定的时间（朝、夕），又有特定的场所（位）。《汉书》对“临”字的使用，多谨守其义。如《高帝纪》述刘邦为义帝发丧，“哀临三日”；为项羽发丧，“哭临而去”。《霍光传》记霍光历数昌邑王失礼事，其中称“自之符玺取节十六，朝暮临，令从官更持节从。”师古注：“临”为哭临；“更持节从”谓更互持节，从至哭临之所。”而《文帝纪》记文帝遗诏称：“殿中当临者，……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临。”其意思是按照礼制，宫中应该哭祭的人，不是早晚哭祭的时间，不得擅自进入哭祭的地方哭祭。《史记》此语作：“宫殿中当临者，……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李慈铭执《史记》以正《汉书》曰：“《史记》无下‘临’字，是也。非临时，禁宫中无得擅哭，‘哭’下自不得再有‘临’字。此误衍。”按《史记》文及李慈铭说，文义则可两解。一是，“哭”为“哭临”一词的承前省略；一是“哭”与“哭临”不同，意思是，非旦夕哭祭的时间，不管在宫中什么地方，都不得擅哭。按前解，则《史》、《汉》意思相同，而《汉书》文义更加明确；按后解，则《史》、《汉》意思有别。然而，《汉书》不必尽同《史记》，《汉纪》亦未全取《汉书》，只要《汉书》文字义理可通，在没有版

本依据的情况下，似都没有理由定要《汉书》文字取同于《史记》。所以《汉书》此句中的“临”字，不应作衍文删去。

二、卷六·武帝纪

武帝元光五年八月“征吏民有明当时之务习先圣之术者，……”（第164页。1987年重印时，‘务’下加了顿号。）

按：“当时之务”，王本原作“当世之务”，王氏《补注》曰：“官本‘世’作‘时’。”而未下断语，中华本以王本为底本，此处从殿本（即《补注》所称官本），但又未出校记。

此句，考《汉书》各本，除殿本从明监本作“当时”之外，《四部丛刊》收宋景祐本（下简称景祐本）、民国九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影宋鹭洲书院本（下简称书院本）、光绪廿五年挂垣书局印明钟人杰刻本（下简称钟本）、汲古阁本及王本皆作“当世”。

“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句运用了对举的修辞方法，在中，“当世”与“先圣”相对，而且都是偏正式的合成词，一是指“当今之世”，一是指“以往之圣”，分别侧重于对“务”和“术”的时间限定：一是“现在”，一是“以前”。而“当时”用作表示时间的意义时，一是指以前的某一时候，如“察仲舒之论，考诸行事，乃知其未合于当时，而有阙于后世也。”（《汉书·匈奴传》）；另是指与某事发生的同时，如“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汉书·地理志》）故此句应以“当世”为是。

另，与此句情况相同，王本《汉书·杨胡朱梅云传》中句：“乃欲以三代选举之法，取当世之士”，中华本亦从殿本作“当时之士”，而未出校记。

三、卷八·宣帝纪

“皇太后归长乐宫。初置屯卫。”（第239页）

按：除殿本外，景祐、书院、钟、王、汲古阁本“初置屯卫”句上皆有“长乐宫”三字，殿本据为底本的明监本，亦有此三字，殿本无，又未出校。中华本既用王本为底本，若以殿本无三字为是，则应出校。

不过，对此句来说，主要问题还不在于未出校记。长乐宫在汉初时已置屯卫，然置而旋废，故此处称“初置”。王氏《补注》又谓：“官本脱‘长乐宫’三字，《通鉴》亦有，荀《纪》作‘长乐初置屯卫’，无‘宫’字。”“初置屯卫”是特指长乐宫而言，殿本无“长乐宫”三字，致所指不明，易生误会。故此句上以有“长乐宫”三字为是。

四、卷八·宣帝纪

“凤皇集鲁郡，群鸟从之。”（第247页）

按：景祐本无“郡”字。齐召南说：鲁当时为国，不得称郡，故《通鉴》只称“集鲁”，可谓至慎。王念孙则进一步说：汉有鲁国而无鲁郡，“鲁”即指鲁国，《通鉴》所记即用《汉书》原文。王先谦还引《文选》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宋书·符瑞志》以证《汉书》原文当为“集鲁”。苏舆则以“郡”字是因下“群”字形似而误衍。以上诸家所言凿凿有据，此句应从景祐本作“集鲁”为是。

五、卷十二·平帝纪

“……甚谬于赦小过举贤材之义。对诸有威及内恶未发而荐举者”。（第348页）

按：其中“对”字，诸本皆无，此为中华本误衍。

句中“义”字下有颜师古注：“《论语》云：仲弓问政，孔子对曰……”以明《汉书》原文“赦小过，举贤材”一语的出处。师古注文后有王先谦《补注》曰：“官本无‘对’字。”《补注》所说的“对”字是指师古注中“孔子对曰”的“对”字。中华本误会，以“对”字阑入“诸有”句上。

像这样，底本、参校本不误，而中华本自误的情况，在卷八十一《匡张孔马传》还有一例：“愿陛下详览统业之事”（第3389页），其中“上”显为“下”之误。

六、卷二十一（下）·律历志第一下

“积中三，中余三万二千四百六十九”（第996页）

按：“三万二千”，王本、景祐本作“二万三千”，殿本从北监本作“二万二千”，各本无作“三万二千”者，中华本作“三万二千”又未出校记。

此句的“积中”、“中余”云云，是指水星（辰星）两次出现之间的时间所包含的中气数。水星两次出现之间的时间为115日又若干分[即《汉书·律历志》中所说的：水星“一复，百一十五日一亿二千二百二万九千六百五分。”（第1000页）]。这样，一年之间，水星出现的次数就不是整数。据《汉书·律历志》所载《三统历》的推算，每经9216年，水星出现的次数即为整数：29041。这个9216年就称为“辰星岁数”，而29041则为水星的复数，又称为“见中法”。一年有12个中气，9216年就有110592个中气（ $9216 \times 12 = 110592$ ），110592即是水星的“见中分”。这样，水星两次出现之间所包含的中气数就是 $\frac{110592}{29041}$ ，用带分数表示，则为 $3\frac{23469}{29041}$ ，其中整数3称为“积中”，余数23469因为不足29041，称为“中余”，这就是《汉书》原文所说的“积中三，中余二万三千四百六十九”。

可见，王本、景祐本作“二万三千”是对的，中华本可能因将“二”、“三”互乙而致误。

七、卷二十一（下）·律历志下

“五十七，庚子。”（第1008页）

按：“庚子”，景祐、北监、殿本皆作“庚午”，中华本从王本作“庚子”。

“五十七，庚子”的意思是甲子统第五十七章首日的干支为庚子。甲子统第五十七章首是否是“庚子”，这可通过每章的日数推算出来。

从《汉书·律历志》可见到三统历关于月、日、章的基本数据如下：

$$1\text{月} = 29\frac{43}{81}\text{日}$$

1章 = 19年（其中包含7个闰月）

$$= 12\text{月} \times 19 + 7\text{月} = 235\text{月}$$

$$= 29\frac{43}{81}\text{日} \times 235 = 6939\frac{61}{81}\text{日}$$

甲子统第一章首日的干支是甲子，这样，我们只要知道它最后一天的干支便可推知第二章首日的干支了。同样道理，只要推算出第五十六章最后一天的干支，也可以知道第五十七章首日的干支，其法如下：

$$6939\frac{61}{81}\text{日} \times 56 + 60\text{日} = 388626\frac{14}{81}\text{日} + 60\text{日} = 6477\text{（余）}6\frac{14}{81}\text{日}$$

上面算式的含义是：56章的总日数是 $388626\frac{14}{81}$ 日，用干支纪日法，60日一轮回，经6477周，剩下最后的 $6\frac{14}{81}$ 日，这六日中的第一天仍是甲子，第六天则为己巳，也就是说甲子统第56章的最后一天是己巳，那么第57章的第一天依次就是庚午了。可见，此处中华本从王本作“庚子”，误，当从景祐、殿本作“庚午”。

八、卷二十二·礼乐志

“高祖六年又作《昭容乐》、《礼容乐》。《昭容》者，犹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礼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人无乐者，将至至尊之前不敢以乐也；出用乐者，言舞不失节，能以乐终也。”（第1044页）

按：“舞人”，景祐·北监本及《册府元龟》（卷五六五掌礼部·作乐一）、《文献通考》（卷四九·乐一）、《太平御览》（卷五六六·乐部四·历代乐）具作“舞入”。作“舞人”，全句殊难索解。若强解作“以人舞”，则下文“出用乐”仍是以人舞，这样，前后文义明显矛盾。

此段文字的意思应是：高祖六年作《昭容乐》，专门配合《武德》舞的退场，作《礼容乐》，专门配合《文始》、《五行》舞的退场。这些舞上场时，不奏乐，是因为舞蹈将要到皇帝跟前，故不好用乐。而舞蹈退场时用乐来配合，是使舞蹈不失节制，能与乐终止。句中“入”、“出”相对，分别指舞蹈的上场和退场，故应以“舞入”为是。

九、卷二十二·礼乐志

“……观玉台 太初四年诛宛王获宛马作。

《天马》十”（第1061页）

按：王本此处正文“太初四年……”句原在“《天马》十”下。“《天马》十”后有补注，谓“《天马》十”三字当依殿本，在“太初……”句后。中华本取王氏《补注》说，依殿本改王本正文句序，例应出校记，否则，使人误以为王本正文句序原就如此，至淆乱底本原貌。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凌峰

雄心·才略·实干

——记汕头经济特区物资进出口总公司

陈海伦 陈波

汕头经济特区物资进出口总公司创建于1983年9月30日，当时只有一枚印章、三辆货车、9000元的开办经费和十八个干部职工。短短的几年过去了，物资公司已发展成为一家拥有3000多名职工、19个直属部门、21家直属专业公司、20家内联、“三资”企业，以及一批出口生产基地的集团公司，固定资产近1亿元，流动资金1.8亿元，成为特区建设大军中名列前茅的经济大户。

绘制“三期”发展蓝图

初时，特区管委会给予公司的任务是为特区经济建设服务，做好建筑材料的组织、调运和供应工作，公司从中收取少量的服务费，以维持企业的生存，没有多大的经营权，更谈不上进出口权。

但公司经理陈书燕敢想敢干，提出要办一个多层次、多功能、跨地区、跨国度的外向型的集团性企业。领导班子沿着这一思路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拿出了“三个转变”的决策：一、从服务型向服务贸易型、再向生产贸易型转变；二、从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三、从单一企业向集团性公司转变。在经理陈书燕的领导下，为了实现这一决策，首先从贸易、实业两个方面着手。贸易方面：1984年，首次跨进广州春交会大门，开始做起物资贸易生意。1986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了物资公司的进出口权。7年来，公司先后在国内投资2000多万元，建立起近百个出口货源基地，同粤东地区，以及广州、上海、北京、天津、大连、青岛、西安、福建等10个对外口岸建立了辐射状的经济联系。并设立一大批销售网点，进出口业务从港澳地区、东南亚发展至美国、日本、前苏联、英国、法国、德国等27个国家，形成了内地、特区、国际市场“三点一线”的贸易格局。

在兴办实业方面，坚持从公司的实际条件出发，认真选择合作对象，准确筛选合作项目，直接瞄准产品市场，注重引进、消化、吸收国外的资金和先进技术，制订发展实业的“投资、巩固、发展”三个周期规划。从1985年初办“鸿发”这第一家实业算起，而今已有生产性实业21家，1990年，实现工业产值2.14亿元，税利1715万元。其中鮀滨制药

厂被评为国家二级企业，成为汕头特区“质量、管理、技术、信息”四个领先的企业。兴办实业的成功，增强了公司的凝聚力，实现“先是以贸促工，后是以工促贸”，最终形成工贸并举的生产经营新格局。

拥有强烈的超前意识

在市场疲软的大环境中，公司却保持稳步、协调的发展速度，经济效益一直爬坡上升，令同行瞩目。1989年，公司营业额达6亿元，利润2030万元，工业产值1.04亿元，出口创汇1456万美元。1990年更是上了一层楼，全年公司营业额达6.5亿元，利润2200万元，工业产值2.14亿元，出口创汇2260万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8.3%、8.4%、106%和55%。取得这些骄人的成绩，靠的是五个有力武器：信誉、信息、人才、资本、广告宣传以及强烈的超前意识。

自企业创办之日起，领导者陈书燕便将信誉放在首要位置，在国内，从开展“重合同、守信用”活动以来，公司连续五年被国家、省、汕头特区评为“重合同、守信用”先进单位。在国外，金融界有陈书燕的签名，不但能够贷款，而且还能为别人担保。公司率先在企业内部设立“信息咨询部”，建立多层次的信息网络。率先在企业设立内部银行，公司内部资金统筹运用，集小钱办大事，企业能顺利渡过资金紧缩的难关。为提高公司全员的法律意识，经得起国际市场的风浪，又率先在企业内部设立“法律顾问室”。1990年被省委、省人民政府评为普法先进单位。公司对广告宣传的理解也是独有一格的，企业越好越要进行广告宣传。严峻的经济形势使前几年的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针对这种局面，企业如何求生存，谋发展？公司提出的口号是：审时度势，以变对变，采取措施，打主动战。针对近两年来市场疲软的新形势，拿出“四大”新招：

1. 改消极的“蜘蛛战术”为积极的“蜜蜂战术”。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组织人员象蜜蜂那样倾巢出动，主动出击。两年来共出动业务人员200多次，奔赴全国各地，搜集信息，疏通销售渠道，终于使公司变被动为主动。

2. 开展“优势结合”攻势。由于市场疲软，流通阻滞，陈书燕带领企业攀商亲，寻补充，找出路。他利用公司信誉好、资本厚、门路广等优势。在进口方面，与国家、省一级专业公司合作，使各自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赢得效益。出口方面，与国家、省、市外贸公司重点合作，利用他们的许可证、出口货源基地拓展出口贸易。1990年合作出口额占整个企业出口总额的70%。

3. 在工业生产上做文章。一方面巩固已投产的企业，另一方面，利用公司信息灵活的优势，为属下企业提供各种服务，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和营销策略，制止生产滑坡。还通过加强企业的内部管理，向管理要效益，使公司所属企业上水平、上等级。鮀滨制药厂由于建立健全生产、技术等17项管理制度，成为汕头特区首家国家先进企业。

4. 开拓苏东贸易和远洋贸易。公司早就瞄准苏东这个贸易窗口，1990年6月公司在哈尔滨的“苏东洽谈会”上顺利地签订了6000万瑞士法郎的进出口协议，为粤东地区对苏东贸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又积极进军国际市场，扩大贸易覆盖面，近两年

来，产品远销美国、英国、日本、意大利、前苏联、加拿大、印尼、比利时、荷兰、葡萄牙、德国、法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香港等27个国家和地区。

发挥群体力量

社会主义企业的职工是企业的主人，所以，企业能否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职工的力量。这一点，陈书燕有明确的认识和体会。

第一，充分调动公司8000多名职工群众的主人翁精神，使企业渡过一个一个难关。他说：“职工群众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熟悉情况，经验丰富，办法很多，领导向他们学习，就可以集小智为大智，制定出战胜困难的决策方略。”因此，他从上到下，层层发动，一方面组织座谈，寻找克服困难的良方；另一方面又建立健全职工提合理化建议的制度，发动职工出谋献策。1990年，物资公司碰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原经营的四大宗商品无法经营。公司领导班子集中了职工的24条合理建议，及时调整了经营策略，开发新产品、新渠道、新市场，共获得效益一千多万元。

第二，关心职工，急职工所急，想职工之所想，及时为职工排忧解难，创造一切条件，使职工各安其所，各展其长，充分实现自己的价值。为此，公司结合深化改革，率先在企业内部签订“共保合同”，变总经理承包为公司全员承包，努力培养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使职工真正以企业为家，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

第三，发展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深化企业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内可以弘扬企业精神，培养集体荣誉感，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外是企业的窗口，在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扩大社会影响方面，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这两年来公司不单组织了歌咏队，还成立一支男子专业篮球队，每年投入数十万元。篮球队在1990年广东省第八届运动会夺得金牌，歌咏队也在汕头市、特区的文艺竞赛中获表演一等奖。

作者单位：汕头特区物资进出口总公司

责任编辑：张 洁

梅州汽车工业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兼析梅州汽车配件厂的经营之道

曾超麟 曾小勇

地处粤东山区的梅州汽车配件厂，原是一间鲜为人知的、连年亏损的拖拉机厂，转产汽车配件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崛起、腾飞，已经发展成为广东省轻型汽车车桥重点厂、国内多家轻型汽车厂和集团公司的车桥专业生产定点厂家，成为中国汽车配件联合经销部的成员单位。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统计，1990年产值、销售收入、利润比1986年至1989年间的产值、销售收入和税利的年平均数翻一番多；1991年又超额完成全年生产计划和各项经济指标，年产值、销售收入、税利又比1990年翻一番多，成为梅州市机械行业中的创税利大户。本文试从该厂发展的成功之道，对梅州汽车工业发展作些思考。

一、科学决策是企业发展的腾飞之道

现代化的企业生产、经营和组织管理必须依靠科学决策。

社会主义的企业，要用经济规律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充分而有效地利用现有的人力、物力，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这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根本任务，也是企业经营决策的根本目的。面对复杂的客观世界，企业的科学经营决策，既依赖客观的情报信息和科学规律，也依赖企业内部的良好组织关系，以及组织者自身的认识水平、心理素质和精神因素。梅州汽车配件厂的成功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几年前，梅州汽车配件厂只生产北京212前、后桥总成等零件，单一的产品和市场使企业难于创造好的经济效益，经不起复杂的经济竞争和市场角逐。1987年工厂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后，企业从单一生产型向综合生产经营型转变。厂领导按照科学程序，作出了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实行

“三大转变”的决策：一是从生产维修配件为主转变为生产主机配套件为主的专业化生产方针；二是从生产民用汽车配件转变为生产军用、民用汽车配件的多向型经营策略；三是从单一的国内市场营销格局转变为向国内外市场拓展的多角化营销网络。在决策的同时，该厂领导提出“振兴汽配厂，三大转变求发展；开创新局面，质量信誉争市场”的口号，激励职工辛勤劳动；以厂为家，“厂兴我荣”，为企业多作贡献。在此基础上，作出了一系列加强企业管理的具体措施，从而保证了“三大转变”决策的顺利实施。

在企业内部生产经营上，坚持“三抓”、“三提高”。“三抓”即抓管理、抓队伍、抓科技进步；“三提高”即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经济效益、提高企业信誉。

抓管理就是强化统一指挥，严肃厂纪，树立新厂风。实行文明生产等8项规章制度；完善承包，落实内部经济责任制；改革分配制度，实行“产品工时工资含质量、产量包干责任制”；实行各项管理指标与经济责任制相挂钩、相结合，把厂长责任制与承包经营责任制及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相结合，体现从厂领导到车间、班组、个人都有责、权、利，确立职工是企业主人的地位，推动了企业管理达标上等级、上水平。

抓队伍就是加强职工队伍的管理，努力提高职工的思想和文化素质。厂里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创造条件让他们为企业发展发挥聪明才智。厂里组织形式多样的学习、培训活动，同时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培养和造就了一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队伍。全厂兴起了“爱国爱厂爱家”的新厂风。

抓科技进步就是抓好“科技兴厂”。厂里成立

了“技术协作委员会”，组织开展技术革新、技术改造、技术攻关，依靠科技进步，推动企业发展。厂领导认为，企业的经济发展，有赖于科技进步，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取决于产品的高质量，而产品的高质量又来自于生产、经营、管理的科学化。因此他们强化“全面质量管理办公室”的职能，加强质检队伍建设，健全质量管理制度，充实质量检测设备，坚持“一条龙”的产品质量管理，确保产品性能可靠，质量稳定，提高了企业信誉。

在对外经营上，坚持科学决策，搞活营销。实施“多路出击”、“借风扬帆”、“纵凤求凰”等适应市场变化的营销策略。

“多路出击”是确保“三大转变”经营决策实施的营销策略，也是产品营销中的事务性战术决策。几年来，企业产品、品种不断增加，他们同时组织力量，采取措施拓展市场，做到巩固老用户，发展新用户，扩大营销网络，发展新的营销关系。据统计，1988年以来，该厂为国内轻型汽车主机厂生产汽车配件的数量占销售总量70%以上，市场销售网点也大幅度增加。企业的产品由单一系列四个规格品种发展到四个系列二十多个品种，成为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汽车生产厂家的配套厂和全国20多个省、市100多个汽车配件公司的供货厂，形成了主供汽车厂和扩大销售网点的多向型市场营销格局。

“借风扬帆”是该厂实现“三大转变”的战术性决策。工厂身处梅州山区，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资金缺乏、技术设备落后，给企业发展造成诸多困难。针对这种情况，他们借助同行专业生产汽车的集团公司、厂家的威望、声誉以及知名度，借助他们的科技力量，发展和充实自身。通过开展横向经济联合，真诚合作，当好配角，成为主机厂的配套厂，为他们生产出优质廉价的汽车配件，从而树立自己产品的形象，提高企业声誉。为了保证质量，该厂特请南京汽车研究所对主要产品进行了台架试验检测；通过解放军7429军用汽车厂装车，对212前、后桥进行连续使用行程4.5万公里的路面越野性、质量性能检测试验，取得了产品质量合格证书，推动了产品质量提高。该厂生产的北京212前桥、后桥总成以性能稳定、质量优良而被评为“广东省优质产品”。

社会主义企业要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中争

取主动，就必须积极开发适销对路的新产品。做到生产一代、销售一代、预测一代、开发一代，做到手中一个、研制一个、开发另一个。梅州汽车配件厂领导为实现“三大转变”不断开发新产品，曾经果断地实行企业经营方向的战略转移，作出“纵凤求凰”的经营决策，那就是舍去暂时畅销的产品，开发未来的热门新产品，创造企业新的营销门路。

1988年，梅州汽车配件厂生产的北京212系列产品正处于营销高峰的热门时期。该厂领导了解和掌握国家对汽车产业的倾斜政策，得悉中央扶持农用汽车发展的信息后，认定农用汽车在我国有广阔的市场和良好的经营前景，便及时决策——开发农用汽车配套的新产品。几经周折和努力，争取了为湛江农用汽车集团公司配套生产12—A农用汽车后桥总成的任务。为了抢时间争用户，厂里集中人力、物力、技术力量以保证新产品的开发。一方面减少和压缩现有热门产品的生产任务，同时，不惜承担开发新产品试制、技术攻关等多项费用支出，承担新产品开发初期投入大、费用多、批量小而造成成本高带来的亏损。产品按时按质交付主机厂，赢得了主机厂的赞誉和信任。1990年该集团公司开发具有80年代先进水平的仿日五十铃轻型汽车，在挑选前、后桥总成配套定点生产厂时，参加争夺的众多厂家中，梅州汽车配件厂夺魁中选，双方发展成为紧密型的合作伙伴。

二、专业化生产是梅州汽车工业发展之路

在“质量、品种、效益年”中，梅州汽车配件厂又开发了五十铃新型汽车前、后桥总成系列新产品。他们靠科学管理，保证了产品开发“四当年”（当年设计、当年测试、当年投产、当年创效益），产品经省级技术鉴定，获得梅州市科技成果奖，获得专业汽车研究所的质量检测验收合格证书，仿日五十铃双排座载货汽车前轴后桥总成获广东省优秀新产品称号，后桥总成还获省优产品称号。目前，该厂又根据市场需要，按国家发展汽车工业“八五规划”的要求，着手开发仿日五十铃NKR型、进口面包车和国产新型车6450等新型汽车车桥。1991年该厂投资1330万元，分期完成技改项目，建成年产3万套轻型汽车车桥生产线，预计投产后，“八五”主要经济指标达标数比“七五”平均数翻三番，产品将行销国内外市

（下转第123页）

伦理思想发展史研究的新成果

郑维铭

章海山教授新作《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历程》(以下简称《历程》),最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继《西方伦理思想史》这部蜚声学界的著作之后,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的又一力作,具有拓荒性的意义。

《历程》遵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轨迹,从马克思、恩格斯到毛泽东、邓小平,一脉相承,一线贯穿,论述全面、系统,时间跨度大,给人以广阔的历史空间感,这是该书的特色之一。该书分三篇。第一篇系统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思想是如何完成从早期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如何在批判资产阶级各种错误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并发展起来的。第二篇总结介绍列宁如何在斗争中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强调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同时也介绍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贡献,阐述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理论实践。第三篇除了着重阐述毛泽东的伦理思想,强调他在中国革命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贡献和发展外,还介绍了刘少奇、邓小平的伦理思想,着眼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现实感极强。

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本身的情况和特点出发,精心建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框架,初步形成兼收各方面优点的理论体系,也是《历程》的一个特色。作为拓荒性的理论专著,如何建构它的理论体系,没有现成的样式,但又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的著作,浩若烟海,其伦理思想散见于数以千万字计的论著之中,要较全面、准确地概括、揭示他们的伦理思想发展历程,必须大胆探索,精心设计,找到能反映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本身的情况和特点的理论构架。作者比较了各种方法,取长补短,形成有自己特色的理论体系结构。首先,该书按

时间顺序,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划分为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列宁、斯大林伦理思想和毛泽东伦理思想三个发展时期,在每个发展时期中又按照伦理思想发展的线索和过程,从动态上把握,研究伦理思想的发展史。同时为了弥补按照时间顺序难以突出主要方面,难以反映各个时期有些较零散的问题的不足,在各个时期的伦理思想的阐述中都列出章节对一些重要的伦理思想作专门的概括介绍。例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爱情婚姻家庭道德、善与恶、自由与必然、动机与效果等问题的思想观点,就集中起来加以总体的阐述,能使读者较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些问题上的基本理论观点。其次,该书注意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哲学思想、经济思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间关系的分寸,既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其他各个领域的思想的密切关系,又突出伦理思想本身内容的特殊性和发展的规律性,防止把伦理思想发展为哲学化、政治化。

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所阐明的基本原理,结合现实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实践,正本清源,在一系列理论问题上,分清是非,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是该书的又一特点。该书作者潜心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历程的研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人性、人道主义、人的价值、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道德的社会基础及本质、利益与道德的关系、幸福、善恶、良心等一系列问题上,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对于我们分清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论界限,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它既需要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指导,又需要马克思主义提供批判各

(下转第105页)



越为“少康庶子”试析

殷伟仁

《史记·越世家》云：“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二千年以来，围绕着这一记述，学者展开了关于越人族源与越夏关系的长期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司马迁的记述流传有绪，且不断被考古发现所证实，比如马桥文化遗存中就含有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因此，越为少康庶子说信而有微。另一种意见认为，夏处北方，越居南方，两不相干。越为少康庶子，纯出后世附会。各执一辞，久讼未决。

我认为，上述两说对“少康庶子”这一关键词的理解似可商榷。

首先，所谓的“庶子”不应理解“庶出之子”，因为嫡庶之制始于商而为夏代所无。既无嫡庶之制，自无所谓“庶子”。这里的“庶”犹言庶姓、异姓。《诗·小雅·伐木》孔疏：“庶姓，与王无亲者。”《周礼·秋官·司仪职》郑注：“庶姓，无亲者也。”其次，所谓“子”也不应理解为子嗣，因为越夏在人种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在文化方面既有影响又各有特色。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史记·越世家》中的“越为少康庶子”，指的是越人加入了夏后少康为首的部族国家，其首领为少康之养子，其族为少康之异姓子部落。

上古三代收受养子或异姓子部落之例习见。比如，《左传·襄公四年》记夏代初年的寒浞，原是“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用之，以为己相。”夏商之际的伊尹，也是有佻氏的养子，《吕氏春秋·本味篇》云“有佻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其君令嬖人养之。”周原甲骨H₁₁·88片卜辞云：“曰今秋、楚子来告、父后口。”楚对周称“子”，“子”非子爵，而是养子或异姓子部落。《史记·楚世家》称“鬻熊子事文王”即其注脚。我认为，越之于夏同楚之于周之间的关系，应是类似的。

总之，从《史记·越世家》中的“越为少康庶子”一语看，于越先祖在夏后少康时代，曾为夏人之异姓子部落，于越人是越人中最先与夏人接触并受华夏文化影响的一支，于越族的兴起和发展，应与此有关。

《从广东实践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征文启事

广东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用事实向人们展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的正确性，同时也丰富了这一理论和路线的具体内涵。为了进一步正确总结和宣传广东人民的实践，加深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正确性的认识，鼓实劲，增信心，为党的十四大胜利召开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决定举办《从广东实践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型征文活动。

这次征文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牵头，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深圳特区报、现代人报、学术研究杂志、广东社会科学杂志联合主办，有关企业单位协办。人民日报理论部已研究决定，对此项活动给予大力支持，将选发一批优秀征文。请各地、各单位和社会各界给予关心、重视，并做好组织、发动和参与工作。具体方案如下：

征文时间和选题范围

征文从现在起至9月。

征文范围分三类：

一、总论：（1）广东坚定不移地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验；（2）广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3）广东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经验。

二、分论：（1）广东政府宏观决策行为改革的经验；（2）广东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经验；（3）广东国营大中型企业改革的经验；（4）广东乡镇企业发展的经验；（5）广东所有制改革的经验；（6）广东分配制度改革的经验；（7）广东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经验；（8）广东科技改革和发展的经验；（9）广东教育改革的经验；（10）广东农业改革的经验；（11）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12）广东加强党的建设的经验。

三、典型：（1）市、县的典型经验；（2）工矿企业的典型经验；（3）农村的典型经验；（4）教育、科技、文化的典型经验。

稿件要求和评奖办法

应征稿件，要求体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要讲清基本实践、基本经验，又要有较深刻的理论分析，从事实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每篇稿件字数在5000至8000字之间。本刊将辟专栏选登应征文章。来稿请寄：广州市越秀北路 222 号学术研究编辑部。邮政编码：510050

主办单位将聘请有关领导、专家和实际工作者组成评奖委员会，对应征文章进行评奖。拟设一、二、三等奖若干名。获奖文章的作者名单将在报刊上公布，将给予物质奖励。获奖文章将汇编成书，公开出版。

爲適應新的形勢和經濟發展的需要，懷集縣已籌建一系列工業開發區和一系列專業市場，有些開發區已破土動工。

食品工業開發區



專業市場工地



廣東懷集縣城鎮建設綜合開發公司
致以熱烈的祝賀

廣東懷集縣 城鎮建設綜合開發公司

新的形勢、新的機遇、新的需求帶來了懷集縣城鎮建設綜合開發公司的誕生。

懷集縣城鎮建設綜合開發公司是懷集縣地產開發類的全民所有制性質的公司。本公司通過各種渠道和各種方式吸引各方資金，具有雄厚的實力，近期擬投資1000多萬元和籌建工程隊專門開發地產，以優惠的政策、優質的服務為各界提供各種用地。

歡迎國內外實業界來懷集投資、購置地產



地址：廣東懷集縣懷城鎮
解放南路84號
電話：524899
郵碼：526400

經理：黃虹